

从老子的“史官理性”到庄子的“生存智慧”

邓联合¹, 王琴²

(1. 山东大学 哲学与发展学院, 济南 250100; 2.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400712)

摘要:受到老子用以把握“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史官理性的影响, 庄子提出了以无为用、循虚因顺之主张, 但其主张仅仅是险难时世中个体迫不得已的避祸存身术, 而不像在老子思想中那样, 是人主为维护其家国利益所采取的政治谋术。

关键词:老子; 史官; 庄子; 生存

中图分类号: B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3) 02-0001-04

From Laozi's "reason of official historians" to Zhuangzi's "wisdom of existence"

DENG Lian-he¹, WANG Qin²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Chongqing Youth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ongqing 400712,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Laozi's reason of official historians that is always used by the rulers to grasp the law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history and to benefit his country, Zhuangzi put forward his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that nothingness shall be used and emptiness followed. Yet, unlike what is in Laozi's thoughts, its proposition is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forsake their principles and conform to the reality in order to survive in perilous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Laozi; official historians; Zhuangzi; existence

老子作为史官的职责之一是记录历史并保藏历史政治文献。与此相应, 其思想中一些带有显著史官特色的理论观念对庄子也有深刻影响, 特别是在现实的个体生存论方面。

任继愈先生指出, 作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系统的开创者之一, 身为史官的老子通过概括当时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 发现“事物都向着它的相反的方向变去”; 鉴于此, 为“保存自己的利益”, 其辩证法思想落到社会实践即“术”的层面, 便具有了“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特点^[1]。事实上, 对于老子思想的辩证特点与其史官身份之间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已有揭示: “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官, 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 然后知乘要执本, 清虚以自守, 卑

弱以自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从“术”的角度把这种特点概括为“以虚无为本, 以因循为用”, “不为物先, 不为物后”。

针对老子基于历史经验的辩证思想, 朱熹在论及老子“反者, 道之动; 弱者, 道之用”一语时曾说: “老子说话都是这样意思。缘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 都于反处做起……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 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 便是杀人也不恤”(《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这里, 朱熹直接把老子的“反处做起”之术归因于其史官之知, 即所谓“缘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近代以来, 学者对于老子思想与其史官身份之间的关系仍多有注意。例如, 章太炎说: “老聃为柱下史, 多识故

收稿日期: 2013-04-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遗民士群之儒家庄学研究”(11BZX04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庄子》篇义题解辑要与研究”(12JJD72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邓联合(1969-), 男, 江苏徐州人,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道家哲学研究。

事……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2]傅斯年认为,老子“以其职业多识前言往行”,故“五千文非玄谈者,乃世事深刻归纳”,其所论者不外道术和权谋,而道术实为“权谋之扩充”^[3]。

循此阐释进路,1980年代李泽厚进一步提出,“《老子》哲学层的辩证法正只是他的政治层社会层的军事政治历史社会思想的提升罢了”,该书主张的尚柔、守雌、用弱从本质上说也“不是明晰思辨的概念辩证法,而是维护生存的生活辩证法”,其中的“二分法直观思维方式”虽根源于军事斗争,但当老子将其由军事辩证法扩展为政治辩证法之后,便毋宁说它“是在较为久远的历史把握中获得和应用,从而具有静观的外在特征,好像是冷眼旁观似的”^[4]。与此相通,陈来认为,由于通晓家国兴亡之变,春秋时期的史官逐渐发展出一种高度重视历史经验、“冷静旁观”的理性精神,其实质是“以国家功利主义为中心”,“完全现实的对历史辩证法的认可”^[5]在此意义上,老子的辩证思想可说是春秋时期形成的“史官理性”的集中体现。

综合以上学者所论,史官理性在老子思想中的表现是:以对人事吉凶之道的深彻认知为前提,以“反处做起”为政术,以达到避祸趋福、维护家国利益之目的。至于老子是否冰冷无情,学者们的批评又是否偏离了老子悬设的道的形上视域,疏略了其中的价值维度,而只涉及粗浅的“术”的层面,并非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显发为人主之政术的“史官理性”对庄子主张的个体“生存智慧”有何影响?

王夫之《庄子·外篇总解》云:“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以脱卸其矫激权诈之失。”也就是说,有无巧诈思想是区分老庄之学的重要依据,而纯正的庄学是绝不包含这类内容的。或许是王夫之太倾心并欲改铸庄学,“因以通君子之道”(《庄子通·叙》)了,事实上,即使在被他断定是庄子亲笔的内篇中,我们仍可发现老子式的巧诈之术,只是这些诈术已由人主的政术转换成了险恶境遇中个体的避祸存身之道。

在《庄子·养生主》篇的“庖丁解牛”寓言中,庖丁自述其诀窍是:

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结合庄子对士人命运的深切关注,在此寓言

中,牛的复杂身体结构实际喻示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庖丁所用的尖刀代指士人的生命,而刀游走在牛的筋骨肉之间则象征着士人身处险恶的庙堂政治中,与纷杂交错的各种人和事面对面打交道^[6]。由此,庖丁的存刀之道实即士人的存身之道。在庖丁看来,惟有“以无厚入有间”,方可在解牛时“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而丝毫不会伤及刀刃。这种以无为用、无为因顺的思想,老子早已提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无有人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四十三章)。显然,庄子提出的“以无厚入有间”的存身之道,是对老子以无为用之术的借鉴和转换。

从上下文来看,“庖丁解牛”寓言的本旨可以概括为《养生主》开篇的一段话: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何谓“缘督”?张默生云:“‘督’既有中空之义,则‘缘督以为经’,即是凡事当处之以虚,作为养生的常法。”^[7]这种处世方式,如果归结到老子思想中,即是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

何以“虚”?答案就在庖丁解牛完毕“善刀而藏之”这个似乎漫不经心的动作中。庄子借此表达的言外之意是:既然“今处昏上乱相之间”,“处势不便”(《山木》),所以个体不妨通过藏身而虚的方式以求避患自保,恰如《庚桑楚》篇所云:“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藏身不是灭身,而是指主动收敛自己外露的锋芒,顺应世事,让自己遁迹于他人或俗众之中,既不为大善,也不为大恶。在儒家眼中,这种机权保身之术无疑丧失了士君子应有的操守,所以朱熹骂曰:“(庄子)乃欲以其依违苟且之两间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愿之所及,是乃贼德之尤者”(《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养生主说》)。而对“缘督以为经”与老子“虚无为本”之术之间的关系,王夫之《老子衍·自序》云:

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是又庄之为老释矣。

在《周易内传·系辞上》中,他又说:“王弼、何晏师老庄之机械以避祸而瓦全之术,其与圣人知必极高明、礼必尽精微之道,天地悬隔。”船山显然是把庄子 and 老子一并视作机巧之徒了。

这种“循虚而行”的避祸术,用《山木》篇的话说便是“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或《列御

寇》篇所谓“虚而敖游”。从《庄子》全书看,最集中地反映庄子的处世思想的,当数《人间世》篇。该篇对主上之暴虐叵测、士人可能遭遇的种种险难,以及在不同境况下可采取的应对自保之方,皆有详述。其中近通于“以无厚入有间”和“缘督以为经”者,有如下几条:(1)在第一个故事中,孔子有“虚而待物”一语,此语在本体论层面乃指道或气之性,而用作处世之术,则是劝说颜回彻底放弃其心中的固有立场,把自己虚掉、忘掉,从而以全无特操、顺其自然的方式对付卫君,即所谓“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而接下来孔子所说的“绝迹易,无行地难”云云,又很像是《老子》二十七章“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一句的引申和发挥。(2)在第二个故事中,孔子告诫叶公子高为君主出使应“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处世应“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这两句话合起来的意思便是“虚而待物”、“虚己以游世”。(3)在第三个故事中,蘧伯玉建议颜阖与卫太子打交道应“彼且为婴儿,亦与之无为之;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无町畦……”。这种“随便到底”的“滑头主义”^[8]¹⁸⁸,其思想实质也正是毫无自我立场的“缘督以为经”或“虚而待物”。(4)该篇后半部分重点申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的生存智慧,并指出个体藉此可以“养其身,终其天年”,这种乱世自保之术,说到底同样是提醒士人务必自弃才智、自敛锋芒,藏身而虚,以“无用”的在世姿态求得自保之“大用”。由此分析可见,整个《人间世》篇所讨论的都是循虚因顺的处世术。

除《养生主》和《人间世》外,内篇的其他章节以及外杂篇对循虚因顺的处世术亦多有不同角度的阐说和发挥。例如,《德充符》篇哀骀它的“和而不唱”;《庚桑楚》篇老子所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至乐》篇之“忠谏不听,蹲循勿争”;《则阳》篇之“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外物》篇之“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处世问题时,外杂篇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借取或转述《老子》原文的说法。例如,《缮性》篇云:“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处显然袭取了《老子》五十九章的观点:“治人事天莫若嗇……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又

如《山木》篇:

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

再来看与此相通的《老子》的一些主张: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之长……舍后且先,死矣。(六十七章)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

功成而弗居。(二章)

功成身退,天之道。(九章)

功成不名有。(三十四章)

从二者的文本相似性可见,在先与后、功名与祸患、己身与众人等问题上,前引《山木》篇提出的避害自保之道直接借鉴并融汇了《老子》的理论观点,其主旨仍在申说循虚因顺。基于此,王夫之《庄子·外篇总解》的判断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即:“外篇则但为老子作训诂,而不能探化理于玄微。”

另可补充一点,庄子在处世问题上非常强调“戒”和“慎”,此二字尤多见于《人间世》篇:

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

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

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外,《达生》、《山木》、《徐无鬼》篇对戒慎处世之术亦有论及。而据刘向《说苑·敬慎》篇载:“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郑良树先生认为,老子与这篇《金人铭》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不仅引用其中的文字,在思想上还深受其影响^[9]。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金人铭》虽然篇幅简短,但“戒”、“慎”二字却多次出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安乐必戒,无行所悔……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戒之哉!戒之哉!”而在《老子》中,虽然“慎”仅一见(六十四章),“戒”字更未出现,但五千言却同样充彻着浓深的戒慎忧患意识,而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论,老子笔下得道者的一个重要容态特征也恰是“慎重、戒惕”^[10]。如果说《金人铭》是老子思想源头之一的话,那么我们就可看到,由《金人铭》而至于《老子》、《庄子》,其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戒慎意识,而庄子的“循虚而行”则是基于这种意识的避祸处身之术。

对于庄子“缘督以为经”、“虚己以游世”的生存智慧,王夫之在《庄子解》和《庄子通》之外的其他著述中多有批评。例如:

如庄子说许多汗漫道理,显与礼悖,而摆脱陷溺之迹,以自居于声色货利不到之境。到底推他意思,不过要潇洒活泛,到处讨便宜。缘他人欲落在淡泊一边……^{[11]376}。

庄子直恁说得轻爽快利,风流脱洒;总是一个“机”字,看著有难处便躲闪……看他说大鹏也不逍遥,斥鷃也不逍遥,则兵农礼乐、春风沂水了无著手处,谓之“不凝滞于物”^{[11]372}。

在庄子,所谓“有难处便躲闪”、“到处讨便宜”、“不凝滞于物”,亦即“以无厚入有间”的“虚而待物”、“虚而敖游”。从船山斥庄子以“机”字来看,老庄在其心目中实为“一路货色”。

但若撇开儒家偏见,客观审视老子和庄子的机巧之术,那么我们会发现,二者虽皆主张以无为用、循虚因顺,其背后的思想实质却大异:其一,老子之术的主体是高居上位的人君或为政者,庄子之术的施行者则是主上逼迫压制下的普通士人乃至微贱个体。其二,老子之术本质上是人主的政术,而庄子之术则是普通个体的乱世生存方式。其三,老子虽主张“致虚极”、“后其身”、“不敢为天下先”,但其术归根结底乃是人主为获致某种政治利益而主动采取的行为策略;相反,庄子之术则是个体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生存境况中,不得已而被迫采取的应世方式,其目的仅在于苟全性命于乱世。这一点,用前引王夫之的话说,便是庄子“自居于声色货利不到之境……人欲落在淡泊一边”。郭沫若对此亦有“同情的理解”,他认为庄子希望“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游戏人间”,“本来是悲愤的极端,然而却也成为了油滑的开始”,但其滑头处世哲学与老子之术的区别在于,庄子“并不想知雄守雌,先予后取,运用权谋诈术以企图损人利己”,因为“庄周书,无论《内篇》、《外篇》,都把术数的那一套是扬弃了的”,老子则相反^{[8]189}。

没有证据表明庄子曾具体参与过现实政治或深度卷入某种政治漩涡,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因此曾受到过什么严重的仕途挫折和身心伤害,然而,对于政治生活的复杂叵测以及士人生命可能遭遇的种种险难,庄子的认知和揭示却可谓深刻精准、洞若观火。结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庄子的这种生存理性极可能受到了老子用以把握“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史官理性的影响,但同时须知,庄子据此提出的以无为用、循虚因顺之主张,仅只是险难时世中个体不得已而为之的避祸存身术,而不像在老子思想中那样,是人主为维护其家国利益所采取的政治谋术。

参考文献:

- [1] 任继愈. 老子新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46-49,55.
- [2] 章太炎. 诂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0.
- [3]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286-287.
- [4]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85-96.
- [5] 陈来.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期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 北京:三联书店,2002:75-78.
- [6]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3.
- [7] 崔大华. 庄子歧解[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113.
- [8] 郭沫若. 十批判书[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88-189.
- [9] 郑良树. 《金人铭》与《老子》[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 [10]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32.
- [11] 王夫之. 读四书大全说(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76.

[责任编辑:范 君]

论《淮南子》的君道思想

林飞飞¹, 高旭^{1,2}

(1.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2.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所,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淮南子》一书综合百家之说, 试图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学说, 书中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详尽而独特的论述。它承袭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 但又反对其纯任自然的消极主张而用儒、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改造; 它吸收了儒家有关道德自律的思想, 用以改造法家关于君臣关系、重势等方面的学说, 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法家的苛酷, 从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主要从君道无为、君臣异道和修身正己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君道思想。

关键词:《淮南子》; 君道; 无为; 君臣; 修身正己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3) 02-0005-07

Thoughts on governing ways of the ruler in Huai Nanzi

LIN Fei-fei¹, GAO Xu^{1,2}

(1.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Culture Institute of ChuHuai,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Huai Nanzi, synthesizing thoughts of different schools and elaborating the governing ways of the ruler, trie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theory for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feudal states. Its inheritance of the thought of “following the nature” in Tao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gative thought of “indulging the nature” by the positiv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Legalism builds a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Its absorption of moral self-discipline thought in Confucianism to transform Legalism thought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uler and ministers and its emphasis on power relieves, to some extent, the harshness of Legalism. This thesis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the inaction of the ruler, disparate ways between the ruler and ministers in governing, and the ruler's self-cultivation.

Key words: Huai Nanzi; the governing way of the ruler; inaction; the ruler and ministers; self-cultivation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由西汉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方士编写而成，约成书于景帝中后期和武帝即位之初。该书总结了先秦汉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努力探寻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试图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种完备的理论学说。书中对为君之道有详尽而独到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各家思想对君道的论述并加以改造，可以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本文主要从君道无为、君臣异道和修身正己三

个方面对《淮南子》的君道思想进行论述。

一、君道无为

陈广忠先生在论及《淮南子》治国思想体系时指出：“国家走向大治和长治久安，最根本的就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1]144}在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言政治则必归于君道，“君道无为”可谓《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核心。

考诸史籍，先秦诸子如道、法、儒家都曾提出过

收稿日期: 2013-03-01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淮南子》与法家思想研究”(2011sk142); 安徽省社科联项目“《淮南子》与其成书背景的互动研究”(B2012001)

作者简介: 林飞飞(1986-), 女, 山东莒县人, 在读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无为而治”的治世理想。

老子关于“无为”之论述最多,诸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圣人无为故无败”,(分见《老子》第2、48、57、64章),主张尚自然黜人事,认为统治者只须遵循“无为”的原则就足以治国理民了。孙纪文先生认为“老子丰富了‘无为’的思想而使之进一步成为一种为政之术”,但他同时又指出“老子的‘无为’理论尽管丰富,但也只是宏观的把握而缺少微观的指向”^{[2]189},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老子的‘无为而治’仅是抽象的政治原则而非实际的统治术”^[3],在“无为”的具体实现途径上则语焉不详。庄子则将老子的无为思想发展到极端,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毫无作为,只能听任命运摆布,主张“与政治疏离”^{[2]170}。但他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出了无为之治术:“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相关之论述还有“古之畜天下者,……无为而万物化”(《天地》),“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强调对天地自然之因顺。梁启超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老庄道家统称为“无治主义”,即徐复观先生所谓“把整个政治机能消解到最低限度”^{[4]159}。可以说,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难以在政治层面上付诸实施,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安乐哲所言:“道家的‘无为’概念,作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论,它不可能形成任何可以付诸实践的周密的方案”^{[5]32}。

先秦儒家也提出了“无为”的治世原则,如孔子便曾言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主张君主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去影响人民从而实现至治。此外又有法家之“无为”:“明君无为之于上”(《韩非子·主道》),“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韩非子·扬权》),将法与术的思想输入“无为”的概念中,认为君主因任以授官、群臣安分而守职,各得其宜便是“上下无为”,强调的是君主如何掌权,其“无为”是一种“支撑强化的极权主义、消除对立面的手段”^{[5]355},最终是为君主的利益服务的。

《淮南子》总结了成败祸福的正反经验,尤其是秦王朝速亡和汉初依靠无为而治迅速复兴的现实,综合先秦诸家对“无为”之论述,对“君道无为”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述。据高诱所注:“主,君也。术,道也”,《主术训》为《淮南子》论述君道之重要

篇章,其开篇即云:“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政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又《原道训》论曰:“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诠言训》亦言道:“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无为矣。”此外,又有《修务训》之论述:“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吾以为不然。……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也。”

观以上论说,可以说都是“笼罩在道家的无为语境之下”^{[6]300},其主张遵循客观规律、不先物为、寂然清静便是对先秦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继承,然而,《淮南子》所论之“无为”相比老庄又带有强烈的进取精神,陈广忠先生即指出:“如果说,《老子》中的‘无为’还有某些消极顺应自然规律和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那么《淮南子》中的‘无为’论,则对《老子》的消极成分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赋予其崭新的内容”^{[1]46}。黄钊先生认为《淮南子》“把‘因’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而避免了早期道家只讲‘因’不讲‘为’的片面性,使认识前进了一步”^[7]。台湾学者林聪舜亦指出,“《淮南子》的‘无为’绝非单纯的‘无为’,而是‘无为’与‘有为’的调和”^{[8]117}。很明显,《淮南子》论“无为”是从道家出发,吸收了先秦法家“君逸臣劳”、“循名责实”的主张,以及儒家思想中的有益因素,而不仅仅是“在道家的话语系统下容纳儒家”^{[6]300},如此,便赋予了“无为”思想更切实、具体的内容,使之在政治上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从而造就了君人南面而王的“无为”新论。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淮南子》有在道家的立场上安顿全书的意图”^{[6]15},然而,道家之无为缺乏政治上之可操作性,故而《淮南子》欲实现其“务于治”的淑世情怀,便不得不对其他思想加以融合贯通。具体而言,为了解决“无为”思想实现的可能性问题,《淮南子》采纳了先秦法家的基本框架^{[5]355},用儒、道思想对其法、势、术的概念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调和与改造,把依法度、因君势、

用众能等纳入无为的实际内容中,从而实现了道家无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将“无为”具体化为“重法”、“乘势”和“用术”,使改造后的“无为”思想“放弃了道家原有的超越精神”^[9],不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成为有条件的“无为”。

(一)重法

为将“无为而治”的思想落实于现实政治,《淮南子》引进了先秦法家关于法的思想,强调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主术训》中说:“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对法的地位和功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其主张以法为天下之度量,“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主术训》),一切出于法而“莫出于己”,以法为衡量事物的唯一准绳,这样便排除了君主的主观意志和个人才智的干涉,君主由此便可实现“无为而治”。所以有学者说,“《淮南子》对‘无为’作了全新的解释,使‘无为’成为一种特定的‘有为’,使‘无为’和法治结合起来。”^[10]

《主术训》云:“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法之建立是为“禁君”,法高于君主的个人意志。法既制定,人主和臣民一样都要受法的约束。法的客观性决定了君主不能以个人意志恣意妄为,“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主术训》),法成为实行赏罚的唯一依据。可见,法与无为并不矛盾,由法治可以通向无为。这样,《淮南子》得以把道家消极的无为思想做了某种程度的改造,“无为”意味着“其言莫从己出”而从法出,即治国要依法而不任君主之意。以客观和公正的法为依据,故君主得以实现“无为”,正如安乐哲先生所言,“正是由于法制的自动和机械的职能,才使得君主能够处之无为”^{[2]128};“法律制度及其程序的运作,是君主无为而治的基础”^{[2]131}。对此,徐复观先生也有精辟之论述,他指出:“法家言法,对臣民的威吓性,大于法的客观性。《主术训》则完全消去其威吓性,仅注重法的客观性;以客观性代替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因而使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上有其实现的可能。”^{[4]155}由此,重法就成为君主实现“无为”而治的前提和重要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关于“法”的思想并非对先秦法家的简单继承,而是用道、儒思想进行改造过的产物。如《诠言训》中指出“法修自然,己

无所与”,强调法的产生应循乎自然,这里明显是“以道统法”,“‘法’对‘道’来说,处于从属的地位”^{[1]37},是被纳入道家体系之中的。又《主术训》中言“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主张法的制定应顺应民心,这便有带有一定的儒家色彩。此外,《泰族训》又言道:“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可知《淮南子》关于法的思想是兼摄儒道的。孙纪文先生进一步认为,《淮南子》是“吸收了儒家的仁义思想、墨家的平等思想和名家的辩证观,试图以较实用化的手段替代激进的法家法治理论,从而达到与各家兼善的目的”,由此“修正了秦以来法家设计的政治图式而构建较温和的法治‘理想国’”^{[2]88}。经过改造后的法的学说成为《淮南子》实现“无为而治”的重要保证。

(二)乘势

为了保证无为而治实现的可能性,《淮南子》还引进了先秦法家关于“势”的学说。“势”最初是兵家讨论战争中如何利用地势的一个概念,为“一种特殊有利的形势;由这种特殊有利的形势之自身,即可以发生力量”^{[4]158}。法家以之来言政治:“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有学者指出,法家的“势”指“最高统治者所特有的一种力量即权势,并把这种力量看作人君可以倚恃,能够不为而自成的优越条件”^[3]。法家强调势,主要是为了以势来加强君主对法的推行力量,是以为君主专制服务为根本原则的。

《淮南子》接受了法家“势”的思想,也反复强调“势”的观念,并把它看作是君主实现“无为”的力量凭借,它说:“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饔饩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主术训》);“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主术训》),都把权势比作君主的车舆,认为是国治邦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凭借。又“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主术训》),强调君主乘势便可以

收到政治上“事少功多”的实效。它还举历史上的例子加以说明,指出:“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主术训》),君主之所以能使勇者和智者为其所用,主要依靠权势的力量。

可以说,这里“势”的观念与法家之“势”并无太大的不同,完全是基于君主的想法和利益,主张君主凭借权势驾御人臣,把“势”看作是保证君主凌驾一切的手段。而一旦君主的“势”被剥夺,则被视为是衰落的征兆,《汜论训》中严厉批评齐简公放任大臣争权夺势的做法:“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儒所生也。”

然而,下面几段话中“势”的观念则更多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它肯定“势”是君主驾御群臣的重要手段,更强调君主凭借“势”可以在无形中影响民众,实现教化的功能。其曰:“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处便而势利也”(《俶真训》);“故灵王好细腰,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主术训》);“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主术训》)。

这里言“势”偏重于强调君主可以凭借其具有的权势来给臣民做出某种道德表率,从而进行更有效的“仁化”,使其德“施乎四海”,以此来移风易俗,影响并规范臣民的德行,“势”在这里似乎更是德治的一个辅助手段,而儒家的“化民”思想在此亦“被完美地融入了一个实际是法家的体系”^{[5]96},这与法家学说一味强调凭借“势”为君主利益服务显然是不同的。安乐哲先生在其书中以《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论述了《淮南子》中的“势”与先秦法家“势”的不同,他说:“在《韩非子》中,君主被建议掩藏他的权势之目的,以防止他的下臣迎合他的模式,并因而欺君罔上。然而《主术》主张,君主运用权势向其臣民推行某种合理的行为模式,并且推动他们去实现他的道德之理想。在《韩非子》中,下臣了解和效仿君主的模式只会是某种欺骗的手段;但在《主术》中,它却构成了教化的基本内容”^{[5]98}。

可见,《淮南子》中的“势”实际上已经成为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它“最终解决了法家势治思想

与儒家德治思想之间的矛盾”^{[5]99},而又被纳入了道家无为的体系,由此君主便可实现“无为而治”。

(三)用术

老子的无为思想强调“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47章),强调自身之内在体验,具有某种程度的神秘色彩,难以在政治层面上推行。《淮南子》则强调“知天下”、“见天道”必须转而外求,它以法家“术”的观念为基础对“无为”思想进行了改造。

《淮南子》意识到君主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限的:“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驽马而服馱駟;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之知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教,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伸钩,索铁歛金,椎移大牺,水杀鼃鼃,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禽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并由此得出结论:“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主术训》)。君主要做到“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就不能专恃一己之才,应当“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因为“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主术训》)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以求达到“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主术训》)的效果。因众人的智力而用之,人君便可实现无为,即不任一己之力而为。这也是对实现无为而治所提出的又一重要办法。

那么,君主如何才能做到因众人之智呢?这就是《淮南子》所谓的“术”。它在多篇中进行了论述:“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髻衔之际,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主术训》);“魏两用楼翟而吴起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汜论训》);《主术训》强调“术”的重要性:“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论言训》则更明确地指出:“无为制有为,术也”;“术”即君主用人之方法。《淮南子》强调因人授任,人尽其材,因任授官,循名责实,在融合诸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用人学说,以往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故不赘述。

由上,君主用“术”,使众人各得其宜、各尽其能,便成功地以众人之有为而实现君主之“无为”。由用术而达到无为,则无为已由老庄纯消极的内容转换为积极的内容。

综上,《淮南子》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理想政治为旨归,引进了先秦法家“法”、“势”、“术”的观念,并用儒道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改造,从而保证了“无为而治”实现的可能性。

二、君臣异道

君臣关系,是政治结构的主干^{[4]157}。《淮南子》在君臣关系上,调和了儒法两家的思想,提出君臣异道的观点,以作为君道无为的补充和无为而治实现的条件。

《主术训》中分别对君道和臣道进行了论述:“主道圆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主道圆即君主掌握总原则,臣道方,即臣下负责具体事务,君臣要各行其职,各处其位:“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它主张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要因而而不为,其主要职责为“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对臣下“循名责实”;臣则是统治体制中具体分工负责的成分,要“守职分明”。也就是说,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要做到君逸臣劳,分任责成,即“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君臣各安其位,君主便能如祭祀时替死者受祭的尸一样,轻松享受成功:“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主术训》);“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无害。……故位愈尊而身愈佚,官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絃虽急,大絃必缓”(《诠言训》)。

可以说,《淮南子》关于君臣关系的主张大体上因袭了先秦法家“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逸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为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慎子·民杂》)的君臣理论。然而,二者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先秦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绝对的尊卑关系^{[11]202},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性,认为“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韩非子·内储说下》);君臣“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扬权》),二者存在着对抗和永久的权力之争,其主张君主无为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臣下利用君主行为中所表露出来的好恶来揣度君主从而操纵国家权力的企图,是为至上的

君主利益服务的。而《淮南子》则吸收了儒家思想的因素,对法家的君臣关系进行了修正和改造,在爵禄奖赏的基础上,又注入了道德责任观念。它说:“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主术训》)。由此,“君臣对立的关系被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助的共生的关系所替代”^{[5]192},君臣之间不再是君主支配一切,而是君臣彼此之间负有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它还指出,“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主术训》),认为君臣之间保持和睦相处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由上,《淮南子》用儒家思想对先秦法家的君臣异道进行了调和与改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无为思想在政治上的可行性。

三、修身正己

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在论道中兼谈到治身的问题,老子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于天下”(《老子》第13章),认为君主只要贵其身,全其德,就能收到天下大治的效果;庄子亦提出“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的主张,所谓内圣即治身,而外王则指治国。他们都强调人君修身对于治国的重要。儒家则以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大学》中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正心,正心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都强调了一条由个人修身而治人治天下的路子。可以说,在治道问题上,道儒两家都主张以修身为本。

《淮南子》继承了儒道两家关于修身的学说,强调君主修身对治国的重要性。它说:“吾所谓有天下者,非此谓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原道训》)认为身与天下为一体,君主全其身就可以使天下臻于至治,这里主要因袭了道家的思想。其又曰:“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

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泰族训》),这里总结了前面所引的道家以“自得”为“得天下”的主张,但明显地已和儒家融合在一起。

《主术训》强调“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处在势位的君主的个人修养对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影响,其谓“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迹;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即是指国与身的关系。《诠言训》引詹何之言明确提出修身正己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又《齐俗训》云:“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都强调君主修身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有学者便指出,《淮南子》中治身的路径是通向经世治国的,“在《淮南子》看来,不仅治身与经世的方法相结合,而且治身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经世的过程。因为人们反性体道,舍欲归情,结果既强健了身体,又端正了处世的态度和行为,社会自然得到治理。特别是做为国家领导人,其心静身治,则为民众树立榜样,‘而天下自服’”(《精神训》)”^{[12][512]}如此,则君主应如何修身正己呢?《主术训》将其概括为“清静而不动”、“行为仪表于天下”,以此来“行不言之教”。

首先,君主要节欲反性。上述《泰族训》一段话中把“为治之本”由“宁民”最终归结于“反性”,《诠言训》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把“为治之本”由“安民”最终归结于“节欲”、“反性”、“去载”。《缪称训》说“性者,所受于天也”,即“人的性命秉自道与天地,先天上具有得自天、地之道的遗传特质。天地道之性清静、安宁,人之性也应该是清静、安宁”^[13],《淮南子》中有很多人性清静之论述:“清静恬愉,人之性也”(《人间训》);“人性安静”(《俶真训》)。对此,牟钟鉴先生解释道:“所谓人性清静,其含意有二:从意识上说,人的本性好内静,而不喜外动,不急噪、无偏见、平和清静乃是精神的理想状态;从情感上说,人的本性少欲寡求,自足自得,没有激动的情绪起伏,不沉湎于名利享乐,这是汉初道家的思想,源于《庄子》。《天道》篇就有这样的话:‘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道家认为,人性来自天道,天道自然无为,故人性亦应仿效之。”^{[14][221]}然而,《淮南子》又指出,无穷的嗜欲扰乱了人的清静恬愉的本性:“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俶真训》);“嗜欲者,性之累也”

(《原道训》);“人性欲平,嗜欲害之”(《齐俗训》)。所以它说,“至人之治也,……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原道训》)。君主只有节制自己的嗜欲,返回到恬淡无欲的素朴本性,才能达到治国理政的实效。

《淮南子》认为,国家昏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君主奢侈无度、挥霍浪费、横征暴敛、嗜欲无厌,它说:“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主术训》)。百姓不能安其性,国家就不会安定,政权也不会巩固。其曰:“夫水浊则鱼殒,政苛则民乱。……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匮,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絺绌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主术训》)。可见,正是君主的奢侈腐化,纵欲无度,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所以《缪称训》说:“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齐俗训》亦云:“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精神训》中则通过历史上人君因过于贪恋身外之物而不能有所节欲,最终导致国家残亡的例子来说明了节欲对治国的重要性:“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由此,《主术训》提出君主要“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并对尧的清静俭约大加赞美:“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毁”。

《诠言训》把治身养性归结为四条: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认为:“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认为“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

得矣。”可以说,这是《淮南子》关于君主“清静而不为”、节欲反性的概括总结,它把君主的品格修养纳入到了无知无欲、无为自然的体系中。

其次,在“清静而不为”的基础上,《淮南子》还对君主提出了儒家式的道德要求,以便能更好地“行为仪表于天下”(《主术训》)。

《淮南子》强调君主要贵正尚忠。君主握国家之柄,操生杀之机,贵正尚忠是至关重要的,《主术训》中说:“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矣。……故人主诚正,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君主贵正尚忠,才能保证忠直之士在上位,而避免奸佞之臣为非作乱:“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

此外,《主术训》还进而对君主提出澹薄、宁静、宽大、慈厚、平正等内在的修身要求,它说:“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这里显然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

《诠言训》中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道过程,它说:“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故广成子曰:慎守其内,周闭而外,多知为败,毋视毋听,抱身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这里明显融入了道家的内容,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由‘全性’而‘原心’而‘修身’,而‘治家’,而‘有国’,而‘有天下’的次序,在形式上与《大学》的政治纲领近似,不过《淮南子》中,‘修身’的内容是虚、平,亦即是‘无为’,由‘修身’而‘有天下’的过程是‘无为而无不为’,不是儒家由道德实践而来的德化政治。”^[8]^[16]又有学者指出:“《淮南鸿烈》的家国同构和儒家的家国同构在原则上有所不同,就是贯通家国的原则不同。儒家的家国同构,贯穿的原则是伦理原则,而《淮南鸿烈》贯穿的原则是自然原则。……家国同构只是说明自然原则不但可以用来修身,而且可以用来齐家治国。”^[15]

由此可见,道家和儒家关于君主治身与治国相

结合的思想在《淮南子》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正如陈丽桂先生所言:“由虚静自得、道我合一,而至于反己正身,此显见鸿烈之兼和道儒。”^[16]^[20]

综上,《淮南子》从道家立场出发,提出了君道无为的思想,其承袭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但又反对其纯任自然的消极主张而引入了法家关于法、势、术的思想并用儒、道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改造,对无为思想进行了详尽而独特的论述。此外,《淮南子》又提出“君臣异道”的思想,用以补充并保证君道无为之实现落实。它还强调君主之修身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并综合儒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修身正己的思想,以期为当时之国家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陈广忠. 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 [2] 孙纪文.《淮南子》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2004.
- [3] 雷健坤.论《淮南子》对道家无为观的创造性诠释[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2):16-18.
- [4]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 (美)安乐哲. 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M]. 滕复,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6] 陈静. 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 [7] 黄钊.《淮南子》——汉初黄老之治的理论总结[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45.
- [8] 林聪舜. 西汉前期法家思想与法家的关系[M]. 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 [9] (新加坡)刘笑敢. 无为思想的发展——由《老子》到《淮南子》[J]. 陈静,译. 中华文化论坛,1996(2):100.
- [10] 李国锋.《淮南子》的法律思想[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5):95.
- [11] 王云度. 刘安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12] 杨儒宾.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M].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
- [13] 陈丽桂. 淮南子论修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J]. 1987(1):49.
- [14]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 [15] 陆玉林.论《淮南子》儒道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J]. 1993(2):57.
- [16] 陈丽桂.《淮南鸿烈》思想研究[D]. 国立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1983.

[责任编辑:范 君]

论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刘善连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通过分析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优化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抑制公司董事等高层的恣意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性,提出了扩大股东派生诉讼原告的范围、简化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及合理收取诉讼费用等相关措施,以利于今后我国法治建设和公司立法的完善。

关键词: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公司法

中图分类号: DF41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12-04

On improving our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system

LIU Shan - lia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inan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China shareholders derivative litigation system to optimize our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suppress the willfulness of the directors and other seniors of the company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mall shareholders, the paper propose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plaintiff, simplifying the prepositional procedures of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and charging reasonable litigation fees and other related measur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perfection of our future construction of law and the legislation of companies.

Key words: shareholders; derivative litigation system; company Law

我国司法实践中凸显出的股东派生诉讼纠纷的尴尬局面,与我国公司法制定者和多数学者对引入股东派生诉讼的理想图景大相径庭。同临近的日本、韩国相似,这种情况在该制度初始引入本国时并不活跃,两国在开始的几十年间都少有股东派生诉讼的提起,台湾地区也大抵如此^[1]。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韩及台湾都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少有提起此类案件的情况大有改观。尤其是日本,动作幅度之大令人吃惊,甚至发生多起股东滥用诉权的案例。但无论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应该是利远大于弊的事情。

一、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起源于英美国家的股东派生诉讼被我国主要作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引入^[2],实际上,该制度在英美国家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并相继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效仿。由于该制度在两大法系许多国家成效显著,倘若我国对该制度善加利用,必有助于公司法的完善。

(一)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需要

英美等国是把股东派生诉讼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措施^[3],我国自亦可考虑借鉴之。一般认为,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应切实履行受信义务,这是公司治理的关键问题。如果公司董事、经理等

收稿日期:2013-04-20

作者简介:刘善连(1967-),男,安徽淮南人,法学硕士,讲师,律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

高管违反了受信义务,给公司造成了损害,公司限于其自身的错误而不去纠正,那么赋予公司股东追究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的责任的权利,便是立法技术的巧妙设计,也是完善公司治理之所需。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公司治理问题频出,若能妥善利用股东派生诉讼,可谓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一良策。

(二) 抑制董事等公司高层的恣意行为

董事、经理等公司高层掌握公司经营决策、执行的权力,责任重大,谨慎地行使这些权力是公司良好运转的必要保证。但现实中,公司的决策者们并不总是在理性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为谋取私利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某些高层恣意妄为,甚至不顾公司利益而将公司利益据为己有,大发不义之财。股东派生诉讼的建立,将公司高层的行为置于广大股东的监督制约之下,对其不法行为提起诉讼,从而达到相应的阻吓作用。

(三) 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债权人及公司员工的利益

公司是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结合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董事、经理甚至控股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害行为,不仅对广大中小股东的投资期待利益、债权人的交易期待利益造成了损害,而且众多的公司员工的岗位期待利益受损也无可避免。如果将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扩展,把债权人、公司员工也涵盖其中,那么公司中小股东、债权人及公司员工的利益必将得到有力的保护。

二、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为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所确立。然而,从《公司法》确立该制度至今,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称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案件寥寥无几^[4],这可能与立法者起初的设想差距甚大。笔者认为,除了我国《公司法》关于该制度的设计较为原则、缺乏配套规定外,更重要的是我国《公司法》关于该制度的强制性规定过多,难以为程序启动者所利用。

(一) 我国对原告股东资格限制过于严格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公司法》第152条的法条规定中。该条第一款将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范围规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于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股东有着不同的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原告股东资格没有限制,这能有效地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因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高度的人合性,中小股东滥用派生诉讼几乎不会发生。与之相对应的是,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如果是上市公司,其股本规模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股本,1%的股份也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股份有限公司强调了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时间,一般认为该处的“股东”仅指公司的现任股东,不包括公司曾经的股东。立法者如此规定,可能考虑的是西方传统公司法中的“同期所有权规则”与“公正并且充分代表公司利益要求”,也是“股东利益至上”理念的反映。反思我国公司法的立法理路及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我国立法的这种状况是不合时宜的,应该适时修正。

(二) 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难以操作

我国《公司法》借鉴其他国家《公司法》的立法,先诉请求作为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作为“穷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的体现。这种立法体例符合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其意旨在于给公司提供一个自行纠错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司自己的资源,以节约司法成本。《公司法》第152条对股东先诉请求时代表公司答复或者提起诉讼的机关未作统一规定。该条对不同的指控对象设置了不同的公司被请求机关,似乎规定很明确、具体,操作性较强。但是,监事会与董事会在股东派生诉讼中代表公司答复或者提起诉讼的地位孰轻孰重还是平起平坐?股东会有没有资格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立法中不明确甚至没有提起。同时,《公司法》第152条没有充分考量公司的自治权利。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基本内容涉及公司治理,也即其许多规定应当体现私权性质的自治特色。《公司法》第152条一方面规定了强制性的前置程序,另一方面又缺乏灵活的任意性规范,没有给公司自治留下一定的空间,令人惋惜。

(三) 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过高

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直接获益者是公司,股东只能在胜诉时得到间接收益,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时应该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股东派生诉讼案件

中请求财产金额都比较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财产性案件按照争议标的额的比例收取;非财产性案件则按件收取。如果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按照财产性案件收取受理费的话,诉讼费将十分巨大,而且无论胜败与否,都得预交,一般的小股东必定会无力负担。这样以来,可能会妨碍很大一部分股东提起派生诉讼。董事、控股股东实际掌控的公司的经营决策权的情况下,更容易侵害公司利益,而中小股东由于缺乏财力的支持,高额的诉讼费无疑会阻碍小股东提起派生诉讼。这从根本上背离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5]。反观我国,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上,均没有明确股东派生诉讼应按何种标准收费,各地法院的收费数额也各行其是。尤其是律师费用问题,通常情况下都是当事人自行承担,基本上不存在对方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加人承担己方律师费用的判决。

三、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应该是利远大于弊的事情。结合我国的实际,从扩大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原告的范围,简化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和合理收取诉讼费用等方面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扩大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原告的范围

从《公司法》确立该制度至今,在我国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称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案件之所以寥寥无几,主要是因为原告范围受到局限,致使持股时间很短的股东和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等想发起诉讼却不是适格的主体,借鉴日韩等国法律实践,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各个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对原告股东资格作一定限制,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原告股东滥用诉权。为使更多的股东愿意站出来维护公司利益,可以从宽理解同期所有权规则,赋予在股东派生诉讼中成为非股东的原告继续诉讼的权利,日本公司法可以作为参考^[6]。其次,在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的中小股东的股份额很难达到1%。就把一大批中小股东排除在股东派生诉讼的门槛之外了。为使持股数量很少或者持股时间很

短的股东也能够维护公司的利益,可以将股东的持股数量或者持股时间降低到合理的底线,日本、韩国的公司法都在这样操作^[7],我们为何不借鉴呢?建议增设原告股东持股数额的限制。通过对外国立法例的考察,比如德国就规定持股数达到10万欧元的就符合原告股东资格。第三,为使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也能够维护公司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还可以将公司债权人、公司员工亦纳入原告范围,以适应现代公司发展的潮流。进入二十一世纪,“利益相关者”理念在和“股东利益至上”理念的交锋中逐渐占据上风,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加拿大,就率先在其《公司法》中把公司债权人规定为派生诉讼的主体,在判例中将公司员工甚至同公司利益攸关又被法院认可的人都作为派生诉讼的主体^[8]。我国欲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拔得先机,这种先进的理念进入公司法中应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二) 简化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我国《公司法》的前置程序的设置上不仅较为繁琐,而且某些方面存在着逻辑矛盾。所以,简化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就成了当务之急。

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公司法传统,建立以监事会为主体的股东派生诉讼的追诉机关,辅之以股东会作为监事被追究责任的情形^[9];同时允许公司章程自主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应对机关,以适用股东对不同对象的指控。其次,完善前置程序例外中的“紧急情况”的规定。公司法中没有进一步对“紧急情况”做出明确的解释,参考美国的立法例,美国规定前置程序的例外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 董事否认发生了起诉的过错行为;(2) 董事曾批准了所诉过错行为;(3) 董事是原告股东所诉的过错行为人;(4) 董事在原告股东所诉的过错行为人的控制之下。此外,侵害行为人正在销毁证据等等都可以作为前置程序的例外规定的“紧急情况”。第三,完善前置程序中原告股东的书面请求内容。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在法院胜诉后,公司还要承担败诉的相关费用。公司法对原告股东提出的书面请求的内容未做具体规定。这样公司作出的答复可能不准确。建议参考一下美国的立法例,美国有关公司法就详细规定股东提出的书面请求的内容^[10]。例如,相关的证据材料的原件,侵害行为的事实,明确的诉讼请求,起诉的

理由等等。

(三) 合理收取诉讼费用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框架下,创新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的承担)的合理收取与补偿机制,不仅是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采取按照统一标准的数额按件收费。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费用收取方式有二种情况,按财产案件收费或者以统一标准的数额按件收费。第一种方式由于诉讼费用数额很可能较大,导致股东提起诉讼的积极性降低,现在不少国家逐渐废弃第一种做法而采取第二种收费方式。其次,建立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因为原告股东提起诉讼主要的是也维护了公司的利益,然后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关键的是,胜诉的收益也归公司所有,原告股东只能再间接在公司分红时分得利益,所以给其一定补偿并不为过。这里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原告的律师费用。股东派生诉讼的复杂性为律师索取高昂的代理费用提供了借口,也为原告股东提起诉讼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些国家,比如美国,为获胜的原告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其中也包含律师费用。第三,建立报酬奖励制度。针对中小股东诉讼动力不足的现状,建议建立报酬奖励制度以激励其提起派生诉讼。从理论上来说,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其胜诉的成果归公司所有,原告股东只能从股份中获得间接的利益。但是,原告股东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美国法律规定原告股东直接受偿的情形主要有三个:(1)公司不再是持续运营的兴旺企业时。(2)在派生诉讼中恶意股东和善意股东并存时。(3)派生诉讼是对肆意处分公司财产的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提出的。当原告胜诉时,如果这三种情形,则可以按持股份额直接受偿,而不是间接的依照股份从公司分得利益^[11]。

综上所述,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并没有发挥出保护中小股东和制约公司高层及控股股东的应有作用。跟同样作为法律移植的独立董事制度类似,派生诉讼实施效果的低微发人深思。起源于英美国家的股东派生诉讼被我国主要作为保护中小股东

利益而引入,实际上,该制度在英美国家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并相继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效仿。由于该制度在两大法系许多国家表现出来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抑制董事等公司高层的恣意行为和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债权人及公司员工的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倘若我国对该制度善加利用,必有助于公司法的完善。当务之急是要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立法上降低提起诉讼的门槛,在司法上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使其实实在在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凯湘. 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M]//顾功耘. 公司法律评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6、140.
- [2] 张穹. 新公司法修订研究报告 [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 [3] 施天涛. 公司法论(第二版)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 [4] 朱芸阳. 股东派生诉讼的引入与实现 [M]//王保树. 商事法论集(总第20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7.
- [5] 姜壹春,朱娇蕾.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结构和有关问题研究 [M]//王保树. 实践中的公司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52.
- [6] 山田泰弘. 日本法围绕股东代表诉讼之原告适格的发展 [M]//顾功耘. 公司法律评论. 刘姝,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7] 王顺模. 韩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及其运用 [M]//顾功耘. 公司法律评论. 金晓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8] 杨奕. 论公司利益结构下派生诉讼的原告扩张 [M]//王保树. 实践中的公司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9] 沈贵明.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适格主体 [J]. 法学研究,2008(2):55-66.
- [10] 乔欣. 公司纠纷的司法救济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3-64.
- [11] 刘俊海. 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 [M]//王保树. 商事法论集(第1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47-354.

[责任编辑:吴晓红]

享乐购物动机测量及其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研究

王建国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 文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阿诺德和雷诺兹(2003)编制的享乐购物动机量表进行了修订, 严谨的开发了针对我国消费者的享乐购物动机测量量表, 并系统的研究了其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研究发现享乐购物动机的六个维度, 即新奇、乐趣、认同、价值、社会交往和时尚都与冲动购买正相关。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系统的开发了享乐购物动机的量表, 从而实现了对我国消费者享乐购物动机的定量测量, 并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其对冲动购买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 SOR 模型; 享乐购物动机; 热情感-冷认知处理机制; 冲动购买行为

中图分类号: F7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16-07

The measurement of hedonic shopping motiv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impulse buying

WANG Jian - gu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Arnold & Reynolds' hedonic shopping motivation theory (2003), revises and develops a quantitative hedonic shopping motivation scale for Chinese consumers, and explores systematically its influence on their impulse buying.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 six aspects of Chinese consumers' hedonic shopping motivation: novelty, fun, self - identity, value, social, and fashion,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mpulse buying.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scale that helps quantitatively measure consumers' hedonic shopping motivation and in the further systematical study on its influence on impulse buying.

Key words: Stimulus - Organism - Response model; hedonic shopping motivation; hot emotion - cool cognition processing system; impulse buying

从实践来看, 冲动购买在西方的零售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超市中的某些商品的冲动购买甚至占其销售总额的80%^[1]。随着我国消费者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享乐购物作为一种零售策略也变的越来越重要^{[2]77}, 由此导致冲动购买在我国的零售业中将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与此同时, 中国人的消费文化也正在发生变迁^{[3]105}, 导致冲动购买在中国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4]。从理论来看, 冲动购买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汗牛充栋的程度, 但是, 很少有学者系统的研究多维的享乐购物动机对

冲动购买行为的影响。同时, 冲动性购买心理和行为过程非常复杂, 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消费行为。因此, 本文突破性的以SOR模型为框架, 系统的研究了基于零售店铺环境刺激的享乐购物动机对冲动购买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冲动购买

冲动购买是一种突然发生的、难以抵抗的和带有享乐性的复杂购买过程^{[5]170}。学者们最初从产

品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发现对同一产品某些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倾向更强,后来的研究证明冲动购买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我控制的失败导致的^{[6]277},Rook和Fisher认为消费者的个性特征和冲动购买行为受到规范评估的调节^{[7]305}。而零售环境因素对冲动购买的影响也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如Chang,Eckman & Yan研究指出享乐购物动机对零售环境中消费者的情绪和冲动购买行为具有调节作用^[8]。

虽然有关冲动购买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过去多数学者仅探讨个别因素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单就某一因素研究,无法全面深入的理解冲动购买行为过程。例如,零售环境中消费者冲动购买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消费者是如何感知零售环境要素的?零售环境中冲动购买发生、发展和实施的的心理机制是怎样的?文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阿诺德和雷诺兹编制的享乐购物动机量表进行了修订,严谨的开发了针对我国消费者的享乐购物动机测量量表,并系统的研究了其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研究发现享乐购物动机的六个维度,即新奇、乐趣、认同、价值、社会交往和时尚都与冲动购买正相关。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系统的开发了享乐购物动机的量表,从而实现了对我国消费者享乐购物动机的定量测量,并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其对冲动购买行为的影响。

(二) 享乐购物动机

Arnold和Reynolds指出享乐购物动机是在商品购买之外,消费者进行购物的享乐性需要,由冒险、满意、角色、价值、社交和概念六个维度组成。其中冒险是指消费者购物是为了刺激、探险和感受另一个世界;社交是指享受与朋友和家人一起购物,消费者通过购物加强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满意是指消费者通过购物释放压力、缓和负面情绪和对自我的特别款待;概念是指消费者购物是为了与新的时尚趋势保持一致和接触新产品、新发明;角色是指由于消费者替别人购买而使购物者感到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价值是指消费者享受追求购买折扣品、便宜货和促销品的过程^{[2]80-81}。于春玲和Bastin提出享乐购物价值包括新奇、乐趣、别人的赞扬、逃避现实和社会交往五个维度^{[3]110}。Tauber认为除了购买商品或服务,从购物活动中获得满足感也是购物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9]。Hirschman和Holbrook从产品属性的角度探讨商品的享乐性价值,她们提出了“享乐性消费”与“体验性消费”

两个概念,认为在购买过程中,享乐动机比实用动机更具决定意义^[10]。Babin,Darden和Griffin认为消费者可以从购物活动中获得享乐性价值,这种价值反映了购物活动的娱乐性收益^[11]。本文在以上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研究需要对享乐购物动机的维度进行了修订和拓展,享乐购物动机的新量表包括新奇、乐趣、认同、价值、社交环境和时尚六个维度。

(三) 享乐购物动机与冲动购买

动机是推动人们从事某种活动,并朝某个方向前进的内部动力。引起动机的内在条件是需要,外部环境条件是诱因。偏享乐型的购物环境有利于唤醒消费者积极的情感反应和享乐购物动机。消费者面对零售环境的刺激,首先产生享乐购物动机,随着刺激强度的提高,多维的享乐购物动机逐渐变的清晰并指向具体的购买意向,最终引起冲动购买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H1:消费者对零售店铺环境正向的感知将唤醒其享乐购物动机。

冲动购买是未经过深思熟虑的享乐性质的购物行为^[12],冲动性的消费者往往更关心心理感受而非功能利益,具有享乐购物动机的消费者可能更关心购物的消遣和享受方面。在中国,享乐购物价值与冲动购买行为是紧密关联的。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H2:零售店铺环境诱发的享乐购物动机将会正向地、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

消费者的欲望挣脱我控制的束缚时,就会进行冲动购买。然而,消费者实施自我控制与否取决于规范评估。如果规范评估支持冲动购买意向,消费者将放弃自我控制实施冲动购买行为。相反,如果规范评估不支持冲动购买意向,消费者将实施自我控制并最终限制其冲动购买行为。更加之,冲动购买在我国零售业中越来越普遍,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H3:零售店铺环境诱发的享乐购物动机将会正向地、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

享乐购物动机源于消费对零售环境的积极的感知,具有享乐动机的消费者可能因为新奇、乐趣、认同、价值、社会交往或时尚等而诱发购买行为。享乐购物动机是多维的,而冲动购买意向是单维的。随着外部环境刺激强度的增加,多维的享乐购物动机会变的更加明确而单一。消费者会以享乐购物动机的某一维度支撑其冲动购买意向。所以,

享乐购物动机是冲动购买意向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冲动购买意向是冲动购买行为产生的最直接的前导变量。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H3a: 零售店铺环境诱发的享乐购物动机将会正向地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意向。

除此之外,冲动购买行为是购买欲望和自我控制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规范评估和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冲动购买行为可以相继协调或不协调发生。消费者是否实施自我控制依赖于规范评估。在某些文化环境下,规范评估也许鼓励冲动购买行为,因此冲动购买意向将直接导致冲动购买行为产生,反之亦反之。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H3b: 如果规范评估与冲动购买意向正相关,冲动购买意向与自我控制将负相关,零售店铺环境诱发的享乐购物动机将会引发冲动购买行为并不会触发自我控制。

H3c: 如果规范评估与冲动购买意向正相关,冲动购买意向与自我控制将负相关,零售店铺环境诱发的享乐购物动机将会引发冲动购买行为并触发自我控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冲动购买是一种具有享乐性质的购买行为。同时,享乐购物动机也是激发冲动购买行为的最直接的原因^{[3]106}。当处于正向零售环境信息刺激下时,消费者的享乐购物动机被唤醒,并为冲动购买意向的产生提供了具体的动因和方向,但是冲动购买行为发生与否还会受到规范评估和自我控制的影响。当冲动购买意向被社会规范支持时,享乐购物动机将在不触发自我控制的情况下,导致冲动行为;相反当冲动购买意向被社会规范否定时,享乐购物动机将在触发自我控制的情况下,导致冲动行为。综上所述,享乐购物动机对冲动购买影响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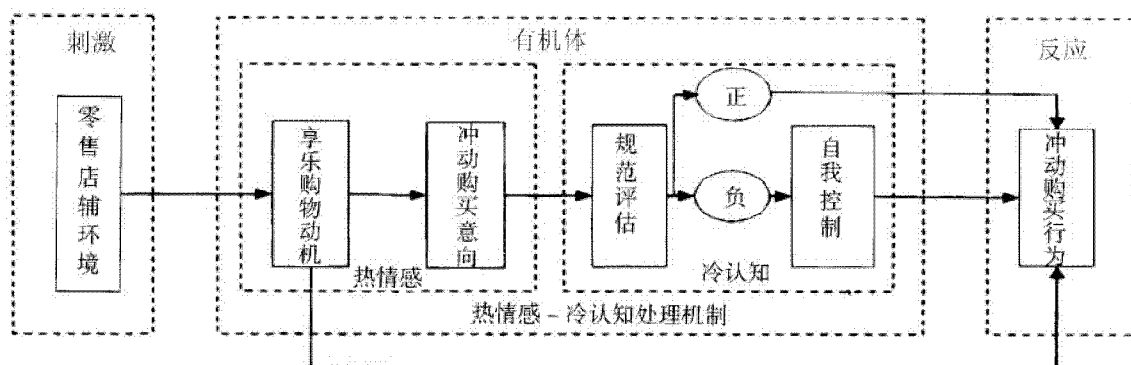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二、实证研究

(一) 构建测量量表

Mehrabian & Russell 指出物理环境营造出的氛围,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心理状态,而且还会影响其决策行为,即环境心理学中的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SOR)理论模型^[13]。Donovan 将 SOR 模型应用到零售业中,并指出具有享乐动机的顾客对购买的目的和体验并重^[14]。Metcalfe & Mischel 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过程同时存在两种决策处理体系:热的情感系统和冷的认知系统^[15]。实际上,冲动购买正是一个感性和理性交织的过程。本文将零售店铺环境诱发的享乐购物动机对冲动购买的影响比作一个热情感-冷认知处理过程和刺激-有机体-反应的过程。其中,关于零售店铺环境特征方面,Baker 将环境要素分为:背景、设计和社交,这一分类的特点是操作性强但过于简单^[16]。Turley & Milliman 对 1997 之前 33 年的文献进行了整

理,把零售环境刺激分为 58 类^[17],这一分类太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实现。有关冲动购买意向方面,Beatty & Ferrell 认为冲动购买意向是指消费者可能做出非计划、立即和不经仔细思考购买的程度^{[5]184}。本文中冲动购买意向是指基于零售环境的享乐购物动机的影响,消费者感到冲动购买某种产品的强烈欲望。Dholkaia 认为消费者产生购买意愿后会进行一定的认知评估再做出购买行为决策^[18]。Rook 和 Fisher 认为规范评估是指消费者在特定购买情境下对冲动购买适当性的判断^{[7]306}。Baumeister 等学者指出自我控制是指消费者为了实现长期利益,而选择牺牲即时快乐。当社会规范支持冲动购买意向时,消费者的自我控制将会失效,并导致冲动购买行为^{[6]1288}。

本文对零售环境测量以 Baker, Turley & Milliman 和 Dickson & Albaum 的研究为基础;对享乐购物动机的测量以 Arnold and Reynolds 和 Yu & Bastin 的研究为基础;对冲动购买意向和冲动购买

行为测量以 Beatty & Ferrell 的研究为基础;对规范评估的测量以 Rook & Fisher 的研究为基础;对自我控制的测量以 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的研究为基础,并以焦点小组访谈法,根据研究需要对上述量表做了进一步修订和拓展,见表 1。

(二) 模型构建

我们以 SOR 模型为框架构建了享乐购物动机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的心理机制模型,如图 2 所示。

零售店铺环境 (F_1)、享乐购物动机 (F_2)、冲动购买意向 (F_3)、规范评估 (F_4) 和自我控制 (F_5) 作为对冲动购买行为 (F_0) 影响的潜变量,“这个店铺是干净的” (X_1) 等 53 个二级指标作为冲动购买各影响因素的显变量,“我这次购买了我本来没计划购买的产品” (X_{54}) 等 3 个二级指标作为测量冲动购买行为的结果变量。

表 1 冲动购买影响因素的测量量表

学者及量表名称	维度	问题
Baker; Turley & Milliman Dickson & Albaum 零售环境特征量表	氛围/设计	这个店铺是干净的/在这个店铺购物是令人轻松的/在这个店铺购物是令人愉快的/这个店铺的内部设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个店铺的颜色是鲜明的
	销售现场	这个店铺经常有新颖的促销活动(限量购买或突发性价格折扣等)/这个店铺能在第一时间展销新产品/这个店铺鼓励顾客触摸或试穿产品
	社交环境	这个店铺的员工是热情、友好和富有感染力的/这个店铺的员工能为顾客提供专业建议或提醒,所以是值得信赖的
	形象	这个店铺总体印象是满意的/这个店铺的总体印象是值得肯定的
Arnold and Reynolds; Yu & Bastin 享乐购物动机量表	新奇	对于我来说,购物是一种探险体验/我发现购物是刺激的/购物使我进入一个视觉、气味和声音完全不同的令人兴奋的世界
	乐趣	当我心情低落时,购物会缓和我的负面情绪/对于我来说,购物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当我想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去购物
	认同	我喜欢为别人购物,因为别人感觉好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好/我喜欢别人的恭维和赞扬我购买的产品/我经常为护面子或争面子而购物
	价值	我多半在减价销售的时候去购物/当我购物时,我享受寻找优惠产品的过程/当我购物时,我享受搜寻特价产品的过程
	社会交往	我陪家人或朋友购物是为了社会交往/我通过购买产品来炫耀我的财产、地位或身份/和别人购物是一种很好的提升友谊的方式
时尚	我是个时髦的人/我购物是为了与新时尚同步/我购物是为了浏览新产品	
(Beatty & Ferrell) 冲动购买意向	-	我体验到多次突然想买东西的强烈欲望,而这些东西是没计划购买的/这次我看到了很多想买的东西即使他们不在我的购物清单上/这次购物我感受到了一种突然想买东西的欲望
Rook & Fisher 规范评估量表	-	冲动购买是好的/冲动购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冲动购买是明智的/冲动购买是可以接受的/冲动购买是慷慨的/冲动购买是清醒的/冲动购买是成熟的/冲动购买是对的
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自我控制量表	-	我善于抵制诱惑/我能改变自己的坏习惯/我是勤快的/我的行为是得体的/我做一些对我好的事情,即使他们是乏味的/我拒绝对我有害的东西/人家说我的自律能力很强/娱乐一般不会妨碍我完成工作/我做事能够全神贯注/我能有效地朝着长期目标工作/如果我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我能克制自己不去做/我经常考虑了所有的备选方案后再行动
Beatty and Ferrell 冲动购买行为	-	我这次购买了我本来没计划购买的产品/我这次感到了突然想买某东西的欲望,而且我购买了它/这次购物让我感到了搜寻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Bush & Hair 建议购物中心拦截调查的方法^[19]。我们选择上海近年来销售额排前三位的购物中心,即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上海新

世界城和上海久光百货有限公司进行问卷调查^[20]。调查人员随机的拦截已购买了服装的消费者并邀请其填写调查问卷。经过为期两周的问卷调查,共发送 570 份调查问卷,成功回收有效调查

问卷 532 份,回收率为 93%。样本的男女比例是 42%:58%。参与者的年龄 38% 在 18 - 25 岁之间,54% 在 26 - 35 岁,5% 在 36 - 45 岁,3% 在 46 - 60 岁。被试的年龄 90% 以上在 35 岁以下,说明年轻消费者比年长消费者更频繁的光顾购物中心。被调查对象的学历 1% 为初中及其以下,8% 为高中及中专,66% 为大专及本科,25% 为硕士及以上。从收入来看,16% 的被调查对象人均月收入在

2 000 元以下,20% 的被调查对象人均月收入在 2 000 - 3 000 元,29% 的被调查对象人均月收入在 3 001 - 5 000 元,35% 的被调查对象人均月收入在 5 000 元以上。服装购买的数量 32% 为 1 件,41% 为 2 - 3 件,18% 为 4 - 5 件,9% 为 5 件以上。平均购买金额 35% 为 800 元以下,26% 为 800 - 1 500 元,23% 为 1 501 - 2 000 元,16% 为 2 000 元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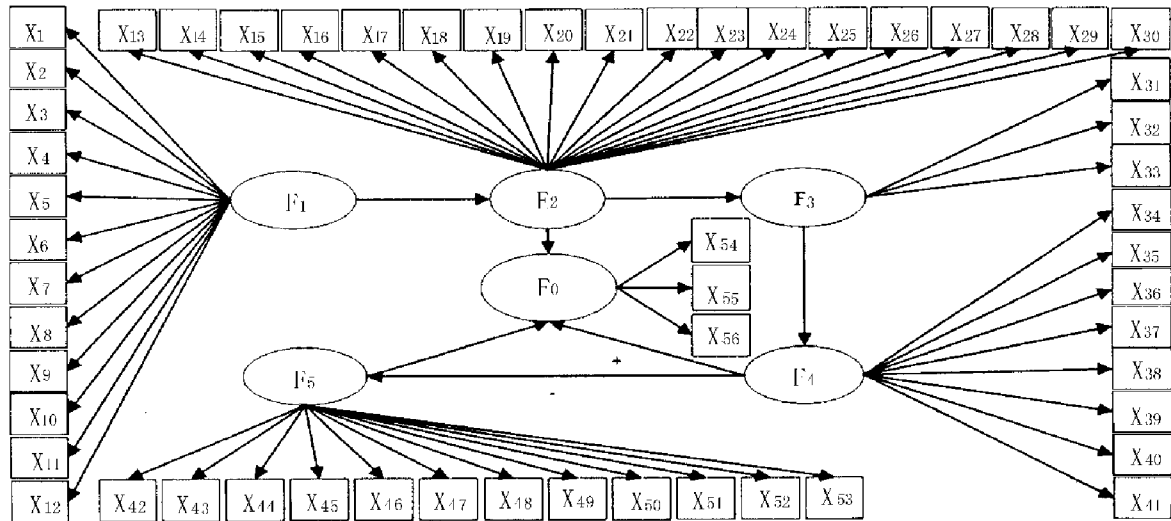


图 2 享乐购物动机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的心理机制模型

(四) 数据检验

1. 信度检验。信度是指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本调查采用使用 SPSS16.0 进行计算,克朗巴哈 α 信度系数进行信度分析。问卷中总量表和分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都介于 0.802 ~ 0.909 之间,均大于建议标准值 0.7,所以,表明该调查问卷的信度较高。

2. 效度检验。效度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调查问卷问题的设计主要以 Dickson & Alba, Baker, Rook & Fisher, Beatty & Ferrell, Turley & Miliman, Arnold and Reynolds, 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Yu & Bastin 的已有研究为基础,所以,调查问卷的内容效度有保证的。统计结果显示,量表的

第一主成分特征值都大于 1,各个变量的因子负荷都大于,表明模型具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证明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比较吻合,调查问卷的效度比较高。

3. 拟合检验。拟合度检验是对已制作好的预测模型进行检验,主要是通过拟合指标的参数来检验理论模型。通过 AMOS7.0 软件的统计得到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参数,如表 2 所示。其中,(1)卡方检验,即 $CMIN/DF=2.702$,小于 3,符合一般良好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标准;(2)比较拟合指数为 0.925,说明可以接受;(3)均方根残差(RMR)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分别为 0.058 和 0.063 说明拟合情况也可以接受;(4)拟合优度指数(GFI)和修正拟合优度指数(AGFI)都大于 0.9,说明拟合情况非常好。

表 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结果

Model	CMIN	DF	CMIN/DF	CFI	RMR	GFI	AGFI	RMSEA
Default model	9 394.142	3477	2.702	0.925	0.058	0.939	0.901	0.063

(五) 结构方程的路径图分析

通过 AMOS7.0 计算得到各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据此可以判别各变量的相互关系强度。如图 3 所示,研究表明享乐购物动机的六个维度都与冲动购买正相关,这强烈的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1. 结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结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是指一个结构变量变动引起另一个结构变量变动的程度。如图 3 所示,零售店铺环境与享乐购物动机之间的系数为 0.222,表示零售店铺环境提高 1 个百分点将直接使享乐购物动机提高

0.222 个百分点,这验证了 H1,即消费者对零售店铺环境积极的感知将激发其享乐购物动机。由于享乐购物动机的激发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只分析了外部环境的诱发,所以二者关系并不显著。享乐购物动机与冲动购买行为之间的系数为 0.026 个百分点,说明基于零售店铺环境的享乐购物动机唤醒还会受到规范评估和自我控制的影响,所以享乐购物动机对冲动购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享乐购物动机与冲动购买意向之间的系数为 0.508,这验证了 H3a,即享乐购物动机唤醒将正向显著的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意向。冲动购买意向与规范评估、规范评估和冲动购买行为之

间的系数分别是 0.312 和 0.165,验证了 H3b,即如果规范评估与冲动购买意向正相关,冲动购买意向与自我控制将不显著负相关,基于零售店铺环境的享乐购物动机唤醒将引发冲动购买行为并不会触发自我控制。同时,规范评估与自我控制、自我控制与冲动购买行为之间的系数分别是 0.078 和 0.047,这反证了 H3c,即如果规范评估与冲动购买意向正相关,冲动购买意向与自我控制将显著负相关,基于零售店铺环境的享乐购物动机唤醒将引发冲动购买行为并触发自我控制。综上所述可以,基于零售店铺环境的享乐购物动机唤醒将积极的间接的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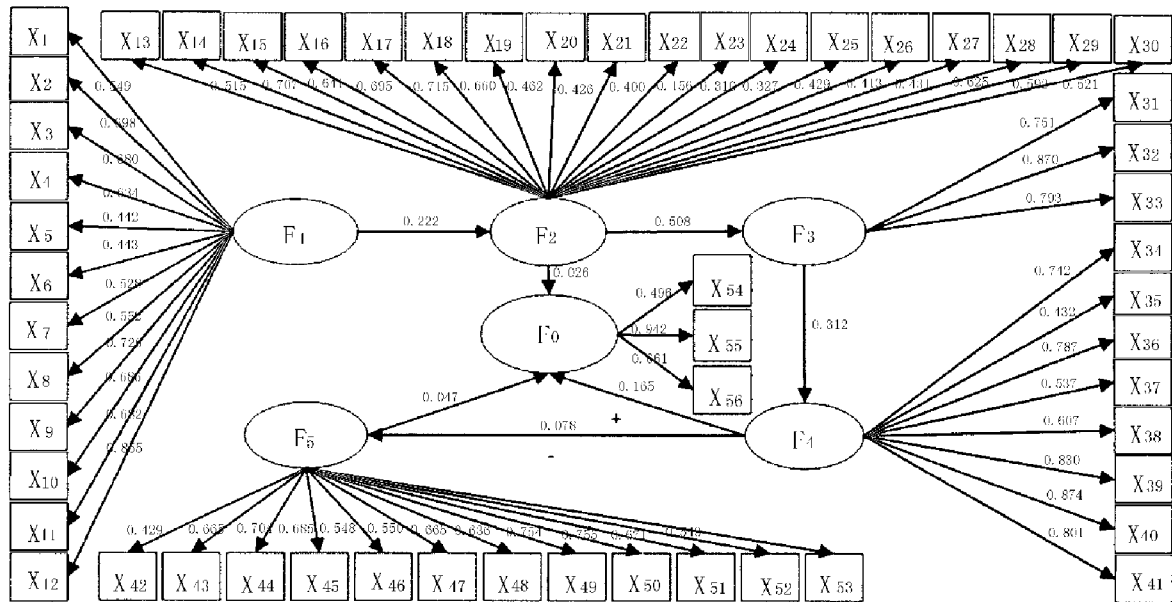


图 3 路径系数图

2. 结构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它既能揭示二者之间关系的强弱程度,又可以进行观测变量之间的比较。(1)零售店铺环境与观测变量之间的系数在 0.433 - 0.862 之间,结果表明与单个店铺属性相较,店铺整体形象更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零售环境的感知。(2)享乐购物动机与其观测变量的系数,除了“我多半在减价销售的时候去购物”是 0.156 之外,其他都在 0.310 - 0.707 之间,说明在新的享乐购物动机测量表中观察变量较好的测量了结构变量。(3)冲动购买意向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系数分别是 0.751、0.870 和 0.793,说明 Beatty 和 Ferrell 的冲动购买意向量表很好的诠释了被试的冲动购买意向。(4)规范评估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系数都在 0.432 - 0.874 之间,说明 Rook 和 Fisher 的量表很好的诠释了被试的规范评估。(5)自我控制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系数从 0.429 - 0.755 之间,说明 Tangney, Baumeister 和 Boone 的量表很好的诠释了被试的自我控

制。(6)冲动购买行为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系数分别是 0.496、0.661 和 0.942,说明 Beatty 和 Ferrell 的冲动购买行为量表很好的诠释了被试的冲动购买行为。

三、结论

(一)享乐购物动机诱发的冲动购买在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很多年以来,营销学者和实践者都已经承认了冲动购买的重要性。近年来零售商越来越注重零售购物环境的享乐性。本文研究显示,虽然享乐购物动机具有内源性,但消费者对零售店铺环境积极的感知将激发其享乐购物动机。享乐购物动机、冲动购买意向和规范评估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由于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享乐购物已逐渐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冲动购买往往受享乐动机的驱动,享乐购物动机间接、显著和正向影响了冲动购买行为。但是,享乐购物动机在被零售店铺环境唤醒后,同时又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所以导致其对冲动购买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规范评估与冲动购买意向显著正相关,说明消费者对冲动购买的认同度较高,也证明了冲动购买在中国正在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二)享乐购物动机对冲动购买影响的评价。与西方国家相较,我们更多强调冲动购买的负面结果。事实上,消费者短期内可能会因为冲动购买而后悔,但是过度的自我控制会使消费者在长期产生更大的后悔^[21]。所以,享乐购物动机和冲动购买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过度自我控制水平,提高消费者购物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最终起到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的目标。政府部门应对消费者的享乐购物动机因势利导,通过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等趋利避害,才能最终提高消费在拉动经济中的比重。对零售企业来说,以享乐购物动机为基础进行零售环境设计,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三)启发零售商进行零售策略的制定和实施。零售商不仅可以通过创建偏享乐型的零售环境,吸引享乐动机强烈的消费者进行冲动购买,而且可以根据多维的享乐购物动机为基础进行顾客细分,进而建立相应的营销沟通和零售环境设计策略,最终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和重购意向。这将进一步丰富、完善冲动购买相关的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 [1] Abrahams, B. It's all in the mind [J]. *Marketing*, 1997, 27: 31 - 33.
- [2] Arnold M. J. & K. E. Reynolds. Hedonic shopping motivations [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03, 79: 77 - 95.
- [3] Chunling Yu & Mike Bastin. Hedonic shopping value and impulse buying behavior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 symbiosis in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place [J].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2010, 18 (2): 105 - 114.
- [4] 王建国,王向前,王建民. 消费文化变迁测量及其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研究 [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2, 248 (6): 62 - 70.
- [5] Beatty, S. E. & Ferrell, M. E. Impulse buying: Modeling its Precursors [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8, 74 (2): 169 - 191.
- [6] Tangney, J. P., Baumeister, R. F. & Boone, A. L. High self-control predicts good adjustment, less pathology, better grades, and interpersonal succes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4, 72 (2): 271 - 324.
- [7] Rook, D. W. & Fisher, R. Normative influence on impulsive buying behavior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5, 22 (3): 305 - 313.
- [8] Hyo Jung Chang, Molly Eckman & Ruoh Nan Yan. Application of the Stimulus - Organism - Response model to the retail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hedonic motivation in impulse buying behavior [J].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 2011, 21 (3): 233 - 249.
- [9] Tauber, Edward M. Why do people shop?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2, 36 (10): 46 - 49.
- [10] Hirschman, Elizabeth C. & Holbrook, Morris B. Hedonic consumption: Emerging concept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2, 46 (Summer): 92 - 101.
- [11] Babin, Barry J., Darden, William R. & Griffin, Mitch. Work and/or fun: Measuring hedonic and utilitarian shopping value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4, 20 (3): 644 - 656.
- [12] Ramanathan, S. & Menon, G. Time - varying effects of chronic Hedonic goals on impulsive behaviour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6, 43 (4): 628 - 641.
- [13] Mehrabian, A. & J. A. Russell.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M]. Cambridge: M. I. T. Press, 1974.
- [14] Donovan, R. J. & Rossiter, J. R. Store Atmosphere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4, 70 (3): 283 - 294.
- [15] Metcalfe & Mischel. A Hot/Cool - 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Dynamics of Willpower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 (1): 3 - 19.
- [16] Baker, J., Parasuraman A. & Grewal, D.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Store Environment Cues on Perceived Merchandise Value and Patronage Intent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2, 66 (4): 120 - 141.
- [17] Turley, L. W. & Miliman, R. E. Atmospheric Effects on Shopping Behavior: A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J]. *Jouur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0, 49: 193 - 211.
- [18] Dholakia, U. M. Temptation and resistance: an integrated model of consumption impulse formation and enactment [J].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2000, 17 (11): 955 - 982.
- [19] Bush, A. J. & Hair, J. F. An assessment of the mall intercept as a data collection method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5, 22 (2): 158 - 67.
- [20] 申万研究. 上海商业强者恒强——从上海单体百货20强排名变化看上海商业演变趋势 [EB/OL]. <http://www.swsresearch.com/cn/Default.aspx>, 2011: 9.
- [21] Kivetz & Keinan. Repenting Hyperopia: An Analysis of Self - Control Regrets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6, 33 (9): 273 - 282.

[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论当前重大工程专家论证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宋开文, 王义保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专家论证制度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面对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 专家论证制度不能再作为单一的环节发挥作用, 而是逐渐演变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完整、独立的辅助系统, 通过运用系统理论的观点、公共管理学的知识, 并结合重大工程的特点分析专家论证制度, 以促使其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

关键词: 重大工程; 公共政策; 专家论证; 问题与策略

中图分类号: D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3) 02-0023-04

On the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of experts' demonstration system in current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s

SONG Kai - wen, WANG Yi - b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Experts' demonstra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process of public policy. Fac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xperts' demonstration system can no longer function as a single step, but gradually evolves into a complete and independent auxiliary system in the constituting process of public policy. By using the viewpoint of system theory and the knowledge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of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paper analyzes experts' demonstration system so as to make it scientific, legitimized and democratized.

Key words: major projects; public policy; expert's demonstration system;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专家论证系统是现代科学决策系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公共决策制定者的参谋机构, 该系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 也被成为公共决策的“智囊团”、“思想库”或“智库”。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就非常重视专家论证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完善专家咨询制度, 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 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的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 政府决策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专家论证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并且, 我国的专家论

证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 越来越趋向于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但是, 任何理论的健全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 专家论证制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 比如, 因行政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 专家咨询意见往往被行政官员所左右, 他们的作用如形同虚设, 因此决策权就都集中在了政治精英手中, 在公共决策中, “精英理论认为, 人民对于公共政策不感兴趣, 而且缺乏了解, 精英集团通常能够在政策问题上塑造大众舆论, 而不是大众来塑造精英对政策的看法和观点。”^[1]公共政策不是反映大众的需求, 而是反映精英的主导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官员认为自己的意见或目的就是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想法, 以个人偏好代替集体的选择, 导致公共决策

收稿日期: 2013 - 02 - 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矿难应急管理行政体制改革研究”(10YJC810048)和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煤矿安全监察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0G091199)的阶段性理论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宋开文(1986 -), 男, 安徽砀山人, 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

的失误。而且对官员在决策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也不完善,致使一些官员随意行使手中的公共权力,盲目建设“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公共权力行使的异化。一些重大工程建设前,只经过相关利益群体的讨论,而没有专家的论证,这些“伪专家”更造成了错误的决策,最为著名的当属合肥的亿元垃圾处理场,错误的决策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伤害了民众的感情,失去了政府的公信力,失去了对专家咨询制度的信任。

专家咨询系统的作用不可小视,能够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完善专家论证系统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一、专家论证制度在我国重大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三峡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虽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从专家论证在重大工程建设中的作用来讲,是很成功的。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了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但由于争论的比较激烈以及其他原因,暂缓实施三峡工程,文革结束后,三峡工程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从1986年到1988年,国务院召集412位专业人士,分十四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1992年4月3日该议案获得通过,标志着三峡工程正式进入建设期,10次大规模的论证会,着实见证了“专家论证”在重大工程项目中的作用。同样,在历次我国矿难发生之后,对于矿难的缘起、过程、责任认定、善后处理等一系列问题,专家论证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重大工程项目的地位和特点

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会有重大工程的立项与建设,因为若干重大工程的建设才能构成该国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才能提高国家的地位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如建国初期的长春第一汽车厂、鞍山钢铁、武汉长江大桥等一系列国家重点项目。一项重大工程的建设,要么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长久的促进效用,要么给国家造成极大的人财物损失。这两种结果与重大工程的特点密切相连,重大工程本身的特点如下:

1. 复杂性。重大工程的建设涉及的地域范围广,牵连的利益主体比较多,一个项目的建设就可能成为一个独自的系统,必须考虑到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的因素,系统内部主要包括人财物的调配和

控制,系统外部主要是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

2. 风险大。重大项目的建设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还面临着不断变换的环境,对此难以进行准确的预测,和一般工程相比,就意味着它的风险加大,在建设过程中困难加大。所以,重大工程的建设要留有余地。

3. 长期性。重大工程建设的长期性不仅表现在建设的长期过程,还表现在影响的长远性。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周围大环境的变化,使其与整个大环境的发展相调适,也可以说,重大工程的建设具有动态性。而且,重大工程的效益短期内无法实现,所以要坚定建设者的信心,要具有长远的眼光和利益。

正是因为重大工程项目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在建设之前,需要经过相关专家的反复论证,需要更多、更专业的专家。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专业化,才能够做出正确、科学的决策。

(二) 专家论证制度的作用

“所谓政府专家咨询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决策过程中,为了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水平而通过一定程序寻求专家知识帮助和技术支持的活动”^{[2][35]}。专家咨询作为科学决策程序中的一部分,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各级政府制定正确决策的重要参考,在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引进专家论证制度,就是让大批学者、专家参加到公共政策论证的过程。专家和学者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在某一领域具备专业知识,在决策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综合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倾向,可以促进政策的科学化;并且专家身处各行各业,在经过实地调查后,比较了解民意和公民的动态,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促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专家论证经过长期实行以后,会形成一种制度和程序,我们只需要把这种好的制度和程序法制化,并把这种法制化的制度应用在实践中,就可以推进行政决策的法制化。

2. 传播科学决策思想,为国家培养人才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传播途径的发展,使得专家在参与决策过程中和决策后,可以适时的通过网络或出版物传播他们的科学决策过程和思想,“思想库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出版渠道和各种会议,及时传播其观点和主张,影响公众和政府,形成主流政策思想”^[3]。这对公众有两方面的教育意义:“一是进行了广泛持久的政策科学知识普及教育;二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各项政策进行了宣传教

育”^[4]。专家组在进行政策论证过程中,无形中培养了许多决策方面的专家,能为政府输送优秀的公职人员,促进公务人员素质的提高。

3. 影响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

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一方面与政府职能的发挥、政府效率的高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发展。专家参与政府决策的论证,都是与当地乃至全国发展方向密切相连的政策,每一个政策都很重要,而且,专家的意见能够影响到政府最终的政策。决策正确就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否则,反之。特别是关乎全国的重大工程项目的政策,中央政府在实施决策之前,都是经过智囊团反复论证地,可以说,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上,专家论证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专家论证制度中的问题和发展障碍

专家论证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我国其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专家论证在某些地方还是出现了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伪专家”论证的出现

专家论证制度在许多地方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变质”。有些部门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小集体的政绩目标,专家论证过程不请研究领域里的专家,而是找与部门利益有关联的“专家”,这些专家被“雇佣”了,请来的他们只会说“是”,这样的专家论证只是走个形式而已,目的都是使政策能够顺利的通过。正如合肥亿元垃圾工程的建设,在审批合肥垃圾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邀请了许多的所谓专家,有很多都是市里各相关部门的官员,像市计委、市环保局、市规划局的主任、局长、处长等等,他们对垃圾处理,有经验吗?所谓的专家论证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盲目追求超前的思想

某些重大工程政策的决定,是地方部门为了建设“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决策讲求快而不讲求实,政策制定严重脱离了实际情况,盲目追求超前,盲目上马工程,不计后果,没有考虑重大工程的建设涉及到长远的利益,在不考虑周全的情况下,不利影响将会被放大。在专家论证前,合肥市提出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建一座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的大型垃圾处理厂。在市政府的会议纪要,计委的立项审批里已经明确提出这个项目已采用堆肥工艺,既然市里已经定了调子,所谓的专家论证也就不言自明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垃圾场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设计不符合合肥市情,

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政策制定过程的封闭性

“对于决策的咨询过程公众无知情权,咨询过程中异己声音的被封杀,解密往往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前人决策的不利后果后人承担”^{[2]36}。某些部门在制定关乎群众利益的政策中,本应获取群众的支持,但是现在却关起门来搞决策,群众没被邀请参加,偏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思想,这样做出的政策很难符合人民的利益需求。

(四)论证程序缺少法律规范

我们国家目前缺乏一部完整的专门规范专家咨询制度的法规和监察制度,对专家的责任缺乏明确的规范,论证过程缺少相应的监督,导致专家行为的随意性。当政策出现失误时,没有办法追究专家相应的责任,专家论证制度缺少了严肃性以及法制保障。合肥垃圾处理项目,从项目的立项到初步设计到开工,整个程序从表面上看是合乎规定的,而这些程序恰恰是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显然这些程序并没有起到他应该起到的作用。这说明我国的政策制定中缺少对政策制定程序的法律规范,缺乏严厉的监督监察制度。

三、完善我国重大工程专家论证制度的有效措施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社会各项建设的力度也都在加强,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大建设、做决策的同时,专家论证制度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且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做到决策科学、正确。所以,针对重大工程专家论证中出现的劣势和困境,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一)建设重大工程专家论证的系统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就是在解决或处理系统的基本问题时,按照系统思想理论,应用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在确定或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全部问题,找出其合理目标和各种可行方案,从而帮助决策者就复杂问题进行最佳抉择。”“系统分析最早是由美国兰德公司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来并使用的”^[5]。专家在论证重大工程时,因其本身具有的复杂性、风险性等特征,更应综合考虑当时的内外部环境,按照提出问题和设定目标、收集资料和分析问题、拟定方案和选择方案的系统步骤,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和模型构造,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而且,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系统分析存在于整个过程,因为内外部环境是变幻莫测的,系统分析方法也要灵活多变。“系统分析和运

筹学不采用标准的方法去对付标准的情况,而是灵活地使用若干种研究方法来寻求非标准问题的解决方案。总之,最佳效果的取得乃是不断努力的结果,而不是通过一次研究就取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分析和运筹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6]。

(二) 力求专家专业化、中立化,加强监督

审议关于重大工程的公共政策时,论证评估环节是必备的,专家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要保证专家的专业化、中立化。首先,论证环节邀请的专家,必须要保证其在政策问题领域具有一定建树,对问题有足够的认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专家;专家在讨论重大工程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态度和意见的中立性,不唯领导是从,不受领导意志的影响,从政策问题本身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发表意见和建议。其次,还要加强监察监督,正如林德布鲁姆所指出:“极端的推崇冷静、不带感情因素的分析达到极限,而且又独断所有的决定权,这才是非理性的”^{[4]304},对于这类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其活动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人为因素的影响,以保证政策制定的客观性和科学化。

(三) 提高公民参与程度,发挥民间智库作用

综观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报告精神,公共政策只有人民群众拥护了、答应了、高兴了,才可以贯彻执行,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公民的利益。在论证中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过程的方法很多,比如可以举行听证会,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建立民间智库,它是一个长效稳定的机制,是对政府智囊机构的有机补充,能够始终发挥群众的伟大创造力,能够使政府的决策更加体现民主的精神。特别是重大工程的建设,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专家论证过程中始终本着开放、透明的原则,主动咨询群众的意见,发挥专家与群众的合力,做到民主决策。

(四) 建立重大工程决策的问责制度和追责机制

权责相对是保证权力不会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责任机制直接推动了政府决策体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随着对决策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们加快建立公共决策的追责机制。专家对重大工程决策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只是作为参考意见而已,它是政府对公共政策作为和不作为的重要依据,一旦采用,将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和政府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专家在论证中的责任不可忽视。重大工程的建设责任重大,政府部门及专家应遵循权责相对的原则,握住手中权力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应负的责任。所以,建立公共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将会改变专家无所谓的心态和无责任风险的现状。

为了实现上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目标,法制是重要的保障,所以要努力完善关于重大工程专家论证制度的法律法规。例如,2008年4月9日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规定》里面明确了重大决策的事项,并规定重大决策要建立和健全下列制度一重大行政决策公示和听证制度、建立专家咨询制度、集体决策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只有完善相关的决策法律法规,才能保证决策的法制化,进而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改革与完善重大工程公共政策决策制度,推进重大工程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专家论证的系统分析理论综合了多样化、复杂化的信息,考虑了内部的、外部的环境变化,使得重大工程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化;其次,在重大工程公共政策的论证过程中只有发挥公民的力量、提高公民的参与度,才能尊重公民的意愿,使论证过程体现民主化。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由“碎片化”到“整体化”,加强社会整体合作的理念,能够实现重大工程公共政策制定的正确性。严格公共决策过程,发挥专家论证作用,能够高效、科学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 [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孙彩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
- [2] 张俊.关于我国政府专家咨询制度的法理思考[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4):35-36.
- [3]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53.
- [4]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7.
- [5] 张文焕.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现代管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204.
- [6] 国际科学技术发展局.系统分析和运筹学——发展中国家制订政策和计划的工具[M].徐禾夫,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1.
- [7] 张永桃.行政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8] 李允杰,丘昌泰.政策执行与评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9] 杨成虎.我国政策评估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初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0-64.
- [10] 黄健荣.公共管理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范君]

新媒体视域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

刘利敏¹, 秦国伟²

(1. 安徽行政学院 研究咨询部, 合肥 230059; 2. 安徽省林业厅, 合肥 230001)

摘要: 当前,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 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系统在创新和演化过程中所需信息的重要来源。新媒体作为社会管理系统的外在环境, 对社会管理创新需求、社会管理主体完善、社会管理创新动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 新媒体重塑了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形态; 本文在深刻把握新媒体特征的基础上, 全面分析了新媒体视阈下社会共治的可能性, 系统阐述了社会共治的实现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 新媒体; 社会管理; 社会共识; 社会共治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3) 02-0027-06

Research on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ng soci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LIU Li - min¹, QIN Guo - wei²

(1. Research Advisory Department, Anhu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Hefei 230059, China; 2. Forestry Department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0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new media are gradually becom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s of the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and evolution process. A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new media have made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 needs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management subjects and the momentum of social management. To some extent, new media have remodeled the current politics, econo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by profoundly grasping the features of new media,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mutual administr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methods and ways of realizing such social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social management; social consensus; social mutual administration

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媒体带来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革命, 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数字化、即时化、网格化, 社会行为更加趋向科技推动、虚实相间, 社会更加丰富多元, 深刻改变着全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 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多变。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要加强和创新新媒体条

件下的社会管理。

一、新媒体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影响机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黄金发展期”

收稿日期: 2012 - 12 - 05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兴媒体舆论管理与引导问题研究”(AHSK11 - 12D168) 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利敏 (1973 -), 男, 河北邢台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社会管理、中西文化比较。

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当下,新媒体在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力量方面发挥了积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刻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不断丰富着社会管理的实践和内涵。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从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从推进社会管理最薄弱的环节着力,探索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关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

(一)新媒体使得生活方式“信息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透明。新媒体以其独特的开放性、高效的便捷性和相对的廉价性,极大突破了传统媒体信息发布与传播的垄断和特权、低效和同质、单一和贫乏,使综合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即时发布和自由传播由想象成为现实。信息快速传播,信息了解及时,信息量大,信息传播范围广,影响大、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空前,实现了信息共享和资源全球化。人们通过新媒体可以更快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发生的大事,了解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大环境。信息公开透明,社会透明度提高,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新媒体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们知识生产、信息生成、传播和共享上的平等,改变了某些阶层和群体垄断知识生产和文化资源的现实,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受地域、时间限制的情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理走入死胡同,管理者企图通过信息不对称来实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不可能,从而带来了传统社会管理的危机。

(二)新媒体使得社会参与“平等化”,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社会和谐。要实现社会管理效果最大化,就要最大程度、最广泛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而这离不开广大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但是由于过去受到客观物质条件(主要是技术条件)和公众素质的制约,传统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以半直接民主为主,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不太尽如人意。

新媒体为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各种身份的普通民众提供了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平台和渠道,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个人见解,打破了少数社会精英的话语垄断,为广大公众提供了参与管理的平台,大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广度,改变了间接民主一统天下的局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给了全民参政议政的机会,人民在更大程度或者说全民参与决策、政府管理及社会管理各项事务,使得直接民主和半直接民主成为可能。社会沟通方式从过去的由上到下、一对多转变为平等的

互动式的交流,可以使上层领导和政府部门听到基层和普通民众的声音,有利于政府和民间的沟通和对话,化解分歧和合作。新媒体所裹挟的民主、民生、民权理念也极大地增强了公民的身份意识、主体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公平和正义的意识、民主和监督的意识,参与和改变的意识等,使得权利意识大爆发。网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献计献策、扩大渠道、集思广益,汇总最全面的社会生活发展现状,发现问题,有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三)新媒体使得舆论监督“网格化”,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会公平。传统社会,由于信息不对称,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者不敢、不会、不能监督。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由于自身特性所形成的虚拟空间衍生为一种集中的、广阔的、影响力巨大的、针对公共问题聚焦的社会公共领域。在这里,我国的数亿网民,涵盖社会每一阶层,上至中央下至基层,都是网络的参与者和运用者。党计国策、专家宏论,政府行为、百姓心声都置于其间。任何公共事件、公共人物、公共问题都会成为网络“网聚力量、监督传播”的目标,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无处不在,政府和社会管理者受到社会公众来自四面八方的监督,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监督,舆论监督更有力。新媒体使得监督体制更加完善,有利于政务公开和政府依法行政,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法治、克服社会不公正,促进社会进步。社会格局也因此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更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对现有社会管理模式中公权、民权、舆权的地位和份量,而这份监督又是纵横交错的网格,难以单一地应对。

(四)新媒体使得动员手段“社会化”,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力量。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动员主要有三种形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运动,但这几种方式社会成本巨大,而且会造成大的社会波动。而新媒体成本低、及时、便捷的特点使得人们之间沟通交流更加便捷,缩小了地域差距、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更好地发挥沟通交流、服务社会的功能。在虚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并不认识,也没有传统社会基于信任基础上的相互关系,但是网络把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民众由集体无意识变为有意识联合,把全国各地不认识、不相识、不熟悉的人在网上瞬间集合起来,形成合力。传统社会,社会基本处在碎片化的无序状态,每个声音无足轻重乃至被淹没。互联网通过其特有的聚集功能,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网民的声音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从而产生巨大的蚁群效应——一大群蚂蚁可以战胜任何庞然大物。微博

的传播效应把这种作用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网民的声音聚集到一块可以改变一项制度,一项判决,使一项决议搁浅,如沈阳刘涌案、广州孙志刚案的处理都受到网络舆论的极大影响。

新媒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发挥自身优势,助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自觉或自发地推动了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的创新,协调了社会关系、保持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二、新媒体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挑战

作为新兴事物,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发展的不完善,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也对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严峻考验和挑战。主要体现在:

(一)新媒体带来的监管难。新媒体在给人们带来信息爆炸、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过剩、信息泛滥,信息太杂太乱、垃圾信息、虚假信息、不良信息的传播,有时反而导致效率降低。利用网络违法犯罪,网络上高科技犯罪层出不穷,利用网络进行病毒攻击,窃取秘密文件,信息安全和信息泄露问题凸显。加上中国巨大的网民数量,使得网络的隐蔽性和虚拟性成几何数级的增加,监管难度大大增加。

(二)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分化。新媒体对人们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显著:一些人沉溺于虚拟世界而脱离现实,压缩了人们的业余时间,许多时间和精力无形中浪费在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真实距离被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直接沟通少了,人际关系疏远,多数人只关注聊天和电子科技带来的方便而忽视了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人们思想懒散,忽视了思考的重要性;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大量传播使得人们之间缺乏信任,对社会缺乏信任感,甚至产生信任危机。还有一些不良分子恶意利用网络:传播网络谣言,谣言的大规模传播造成恐慌、影响社会稳定;不良信息的传播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许多人不辨是非、盲目跟风,产生群体不良反映。一些人利用网络进行恶意炒作,控制舆论导向,掩盖事情真相,欺骗群众感情或把个别问题扩大化、过分放大消极事件,把负面影响集中到某一段时间,过度的曝光率产生聚集效应,使公众产生悲观想法,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下降;鼓动煽动群众反社会情绪,导致部分群众偏激、片面地看问题,激发民众矛盾,分裂社会共识,瓦解既有社会认同,分化不同群体认知,造成社会对立,

不利于人民团结和社会和谐。

(三)新媒体带来的无序政治参与。新媒体政治参与中的无序状态。新媒体为人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大大提高了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广度,但是政治参与的深度不够。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是青年人,由于知识年龄社会阅历的关系,对社会认知辨别能力差,容易感情用事,使网民参政的水平在深度上存在欠缺。突出表现为:网民滥用言论自由权,不负责任,网络暴力,如人肉搜索,侵犯个人隐私,进行地域人格攻击;网上舆论对司法的过度干预,阻碍司法公正,司法自身的规律性和科学性遭到破坏;网上有知者(意见领袖)与无知者(普通民众)的分化,对网络政治参与产生了不利的直接影响。调查和心理学都显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容易受到教育程度高的人意见左右,从而增加了普通人被操纵利用的可能性。

(四)新媒体带来的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出现价值观的多元化,互联网已经成为多元价值观的表达空间和交汇地,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场。网上辩论、“盖楼”、对话,对骂甚至掐架都成为常态。互联网价值观的多元化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和比较集中的反映。各种声音混杂,非主流价值观泛滥,其核心价值体系异于传统社会构成,大量良莠不齐的资讯影响人的价值观,不断冲击道德底线,影响人们对社会事务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后导致权威消解,主流价值观无力。负面文化的传播,对传统文化形成巨大冲击。新媒体带来的便利和各种炒作使年轻人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新媒体让社会组织能力加强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引领和控制事态的能力削弱,前一段时间发生在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还有英国的骚乱事件,俄罗斯反对派反普京的集会风潮,都有被有目的利用,有组织控制、有手段传播的社交网站兴风作浪、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影子。

三、新媒体条件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

在新媒体时代,由于新媒体的获取信息平等性和去中心化,人们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使得草根阶层可以与精英阶层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变成可能,也成为有效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因此,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管理,如果政府还是大包大揽,抱着过去的传统思维不放,靠单兵作战,唱独角

戏,往往会顾此失彼,事倍功半。新媒体条件下,政府应该积极转变社会管理的理念,加快职能转变,在党委政府主导下,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多元参与,共同治理。

(一) 共治前提——社会共识

社会共治的前提是社会共识。现在有一种说法,政府面临着公信力危机,不管政府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这就是所谓的塔西陀陷阱。仔细分析显然不是这样。从近几年的网上舆论可以看出,政府大力反腐和有效的民生举措都获得网上舆论的称赞;在关系我们国家领土安全问题,如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关系我国的荣誉和尊严,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网民与政府在舆论上几乎保持高度一致。比如在7月份的新疆劫机事件中,网民对政府和机上人员采取的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

应该看到,公平正义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是国人的共同目标。无论是在新兴媒体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大家的最大公约数,这就为达成社会共识,提供社会共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二) 新媒体空间共治需要包容

新媒体空间并不是完全的虚拟社会,而是另外一种现实世界,是真实社会的反映。众声喧哗是网络上的常态,没有杂音、一团和气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网络能使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在社会共治中要排除“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网络世界中须知“异乎我者未必即非,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非未必即非”,在这方面我们要向胡适先生学习,秉持“包容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摒弃“必以吾辈所主张者绝对为是”的武断态度。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都不要忘记“多数人应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在互联网的讨论中应该成为常态。对网络上的不同声音进行鉴别,除了敌对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的信息要进行应有的处理外,对其他信息应该最大限度的包容。在网络世界中,只有最大程度的包容不同声音,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三) 共治优势——小成本、大收益

近代西方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运行规则,那就是通过协商、谈判来处理利益分歧,这种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建立在参与者共识基础上的行为规则,洗岩称之为“软规则”。洗岩认为,在舆论相对开放

透明的社会环境下,对待利益冲突更易采取谈判妥协的方式而不是强权压制。不断冲突、不断谈判妥协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协商、谈判的程序机制之中,享受民主权利的范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认同协商、谈判、妥协的人也越来越多,赞成激烈对抗的人越来越少,法律制度所赖以运行的软规则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接纳与认可。软规则与硬制度相比较而言,它虽未形成法律制度,却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软规则对制度的效果有改正和促进作用,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社会舆论变得越来越开放,社会运行更加透明公开,各阶层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们多渠道、多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和实现政治参与,使社会具有自发演进的空间。不仅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而且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自由开放透明的舆论环境下,人们对待利益冲突采取谈判、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将会越来越多,赞成对抗的人将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社会共治成为可能。在新媒体普及的情况下,公共决策不再仅仅由掌握强权的少数人所垄断,社会各阶层都可以通过参与协商、谈判的、共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构建了多赢的社会格局,有助于打破过去那种非赢即输的局面,有助于降低社会成本,减少社会动荡。

四、新媒体条件下实现社会共治的具体思路

(一) 政府层面——提升公信力

1. 信息公开透明

政府信息应最大程度的及时公开,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同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对冲谣言和各种不良信息。针对公众质疑应实事求是地及时适时回应,一些不能立刻得出结论或给予回答的应该向公众讲清楚,最大程度地消除“塔西托陷阱”。

2. 网络问政,积极互动

保持一个和谐的网络环境,最重要的是尊重和维护广大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和监督权,保证民意渠道畅通。为此官员要主动、积极、建设性地对待网络,最大程度吸纳民智。对待网络,政府多做的应该是疏而不是堵。要加强社会互动,保证网络问政渠道畅通。通过网络问政要坦诚务实地听取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对网民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保证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实。要通过网络问政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发现基层问题,有利于凝聚最大程度的民意,避免政府失误,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人

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3. 通过深化改革重塑政府权威和公信力

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寻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社会治理上不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疲于应付,政府各部门不能只满足于与网民对话,解决几个网上热点问题,就以为万事大吉。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被网络关注、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只是社会生活中的很小一部分。政府只有解决好大量水面下隐藏的问题,才能真正处理社会隐患,从根子上解决社会矛盾。

对待网上舆论监督和曝光产生的负面信息,政府不应只是亡羊补牢、被动的事后管控,而应注重事前预防和源头治理,要建立长效机制,真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其每次腐败官员被曝光后再进行查处,导致被动和政府公信力下降,何不如在制度上突破、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问题,加强对官员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避免使政府负面新闻成为网上热点。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要畅通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渠道,政府与民众要加强互动,政府和公众之间要建立完善的多渠道沟通协调机制,使老百姓能通过多种途径畅通地去反映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地寄希望于互联网,在网络上发泄。单一的互联网沟通导致的直接后果可能是民众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与好感。

(二) 发挥传统主流媒体与意见领袖的作用——思想引领

主流媒体影响力取决于政府作为,主流媒体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取决于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位置,所以说党委政府做得怎么样直接影响着传统主流媒体地位。此外,传统主流媒体应该加快改革,加强舆论监督、深度报道,增加人民群众的声音,更加切近实际,切近群众,及时回应社会热点,真正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夺取舆论的主导权。

民国时期有许多意见领袖,如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当今中国社会的治理应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特别是他们中的精英和思想者。因为他们的中立性,他们的意见和声音对网民更具有吸引力。而这取决于意见领袖的价值观和责任担当。公共知识分子在网络上应该发挥救火队员的作用,不是放火,更不是趁火打劫。所以要对自己的发言应做到客观理性、实事求是,不隐美不虚恶,而不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道听途说,以曝光负面信息、唱衰政府为能

事。公共知识分子应该秉持“负责任”的敬慎态度,正如胡适先生在谈到《独立评论》的态度时所说“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和“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个人思考的结果”。

(三) 充分发挥新媒体下的群众工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创新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如何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最大程度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其核心是如何引导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

1. 社会协同

要充分发挥虚拟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作用,逐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虚拟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和手段。要推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管理虚拟社会的部分管理职能,充分发挥网民的主动性、积极性作用,最大程度避免其破坏性、消极性,使之真正成为新媒体社会建设中的一支建设性力量。网络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本身具有自净功能,要善于运用网络上的对冲和自净机制,帮助政府来处理网络问题。例如如果壳网,就是由一群拥有不同学科背景,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士组织而成的民间辟谣联盟。他们针对谣言快速传播容易带来负面影响引发社会恐慌的问题,对各种谣言进行求证,分析和普及谣言背后的科学知识。

网络社会中存在重建秩序的正面力量,对于网络上特别是微博上出现的质疑和批评,绝大多数网友都是出于关注党和政府工作的,都是出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诚意。正是这样的善意和诚意,使网络可以成为一个回应关切的最好平台。如果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地做好舆论沟通和引导,积极通过网络了解民意,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及早地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完全可以构建一个广泛参与的网络舆论的良好环境。作为政府应该相信,主导互联网发展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绝大多数网民和社会公众都希望国家越来越好。任何社会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可能经历挫折和磨难。互联网虽然是迅速发展的事物,是一个新兴事物,但是它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同样社会公众对网络的认识也有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成熟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加理性的运用互联网,网络上的正面力量会不断增长。

2. 公众参与

新媒体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关键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各级党委和政府利用新媒体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

新媒体时代,网络党建成为党建工作新课题。继2011年首次网上投票推荐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后,2012年上半年又开展了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网上投票推荐活动,得到几千万网民的响应。这是以网络为平台发扬党内民主的具体实践,是一次深化党务公开的突破性尝试,让社会公众了解党内活动、决策等方面的信息,让群众监督和支持党的工作,方便了群众参与党内事务,增强群众参与党内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党内活动的生命力,体现了组织工作对民意的尊重和回应。网上投票推荐促进了党务公开,拓展了广大党员群众了解和参与党内生活的渠道,为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党内事务开辟了一条捷径,有助于提高党务工作透明度、公信度和满意度。利用新媒体发动群众,打击违法犯罪、寻找破案线索已经成为公安部和各地公安部门的工作常态。这些都是新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运用的典范。利用微博从事微公益,降低了从事公益活动的成本,降低了从事公益活动的门槛,为其他社会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平台,创新新媒体时代的群众工作,将新媒体作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手段,将新媒体变成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

(四) 新媒体条件下社会管理各种力量的优化和整合——创新体制机制

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对象”的新媒体,启示我们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新媒体有关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对新媒体出现的问题,要区别对待,分类管理。新媒体涉及领域千头万绪,但从宏观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公共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一些反动势力在网上的西化、分化言论;暴力、色情、诈骗等一些违法犯罪活动,还有一些危害国家信息安全和网络运行的问题;二是网络上个人空

间和个人生活的问题。对于前一种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这是治理的重点,后者主要靠引导,而不应过多干预。只有做到重其重者,轻其轻者,重点突出,才能有效应对新媒体带来的破坏性力量。还要整合新媒体管理部门的职能。长期以来,在应对新媒体方面,各个部门职责重叠,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商,在网络事件中缺乏有效应对。为了有效应对新媒体对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单靠一个部门孤军作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吸取各方面意见,进行顶层设计,制定一套完善完整的新媒体管理制度。另外还应对新媒体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进行综合统筹,以避免政策重叠或冲突,造成资源浪费。彻底改变以前各部门各自为战甚至互相扯皮的局面,增强各种力量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性。

新媒体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动态调整和改进过程中逐步走向完善。就要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期望的表达、监督与约束形式,在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公共空间,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习惯“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做到趋利避害、因势利导、科学管控、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 [1] 沈卫威. 胡适论人生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260.
- [2] 潘光哲. 容忍与自由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75.
- [3] 冼岩. 衡量制度优劣的关键性指标 [EB/O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643.html>.
- [4]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291.
- [5] 姚鹏,范桥. 胡适散文(第四集) [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226.

[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领导者在组织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作用

孙 玮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济南 250100)

摘 要:组织文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建立阶段、中期发展阶段和后期成熟阶段,在组织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组织领导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初期建立阶段,组织文化形成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组织的领导者或创始人;在中期发展阶段,组织文化逐渐多样化,领导者需要鉴别仍然有效的文化,并对组织文化进行干预;在后期成熟阶段,组织文化逐渐僵化,此时的领导者应该重新审视组织文化,并承担变革组织文化的重任。

关键词:组织文化;文化发展阶段;组织领导者

中图分类号:C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33-04

The function of leader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UN 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building stage, developing stage and mature stag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leaders play a vital role. During the initial building stage, the power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mainly originates from the leaders or founders. In the middle stage of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s gradually diversified; the leaders need to identify the effective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adjust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the late mature stag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s gradually ossified and leaders shall re-examine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reforming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culture; leaders of organization

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其成员所认可、接受和共同遵守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指导思想、道德风尚、管理制度、行为规范等的总和。每一个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体现着组织的个性和特点。同时,同一个组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文化也是不同的。组织文化是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已经证明,组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其中,组织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Schein指出,领导者的唯一职能就是文化的创造和管理,

组织领导者或创始人的个人假设,以及领导者和成员之间在感情上相互作用的方式都能决定组织文化的风格^[1]。在组织文化的建立、发展和变革过程中,组织领导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组织文化的发展与组织自身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是相对应的。根据组织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将组织文化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建立阶段、中期发展阶段和后期成熟阶段,进而深入探讨组织领导者在组织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组织文化初期建立阶段领导者的作用

组织文化建立时期,组织刚刚成立,规模比较小,主要由组织创始人和为数不多的成员组成。此时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寻找“市场空白”,并且将生存作为首要目标。这一时期组织的大多数事情都需要组织领导者亲自参与,组织的管理处于粗放和不规范的状态,组织管理中人治成份比较浓重。此时的领导者在组织文化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缔造者、示范者和传播者和组织文化“制度化”的推动者的角色。

1.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缔造者

在组织文化建立时期,促成组织文化形成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组织的创始人,并且反映了创始人的愿景和使命。组织创始人通过描述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建立早期的文化^[2]。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结合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对组织文化进行构想、提炼升华和设计。由于此时的组织规模较小,创始人可以非常容易的向组织成员灌输他的愿景。尤其是组织创始人在其塑造的文化的指导下,带领组织成员获得成功时,这种文化会更加迅速地被组织成员接受,并在组织中贯彻和发展下去。

2.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示范者

组织文化要发挥功效,就必须被组织成员所接受,并且内化为组织成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这个内化过程中,领导者的示范效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领导,就是带领和引导之意,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即领导者能够身体力行、树立榜样。组织中不存在脱离文化的管理思想,领导者在组织中的各项职能都会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领导者在组织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又决定了他的言谈举止能够对组织及其成员发挥重要的示范效应。因此,组织文化通过领导者在制定目标、计划、组织和控制过程中所树立的榜样和形成的示范效应,展示给组织成员,进而被组织成员认同、接受和内化吸收。

3.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传播者

组织文化是从组织创始人的愿景和使命发展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创始人首先需要对自己的愿景和使命进行阐释,使组织成员相信他的假设与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且能够促进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当这些假设被证明有效时,就会被组织成员所接受,并转化为组织文化,进而保留下来。

此外,领导者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组织文化,他的言行举止、处事方式等都在向组织成员传达着某种组织文化。而组织成员在与领导者的日常接触过程中,会逐渐地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

4.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制度化”的促进者

组织文化是组织内部一种虚化的元素,这种虚化的元素要发挥功效,除了被组织成员接受之外,还必须落地生根,也就是实现“制度化”。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制度化”的推动者,他首先对组织文化进行条目化解释,使其转化为组织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然后带领组织成员共同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因为只有领导者率先践行,其他组织成员才会自觉遵守。因此,可以说,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制度化”的第一关键要素。

案例1:张瑞敏与海尔初创时期的企业文化

1984年,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拉开了海尔创业的序幕。张瑞敏深知产品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为了唤醒员工的质量意识,他带头砸毁了所有质量不合格的冰箱。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张瑞敏给全体员工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即“如何从我做起,提高产品质量”。这一系列措施使全体员工感受到了企业领导者对产品质量的重视,追求产品的高质量由此成为海尔的一项“硬制度”,并且在1988年,海尔率先获得国内冰箱行业国家质量金奖。此后,尽管海尔产品的种类不断增加,产量不断攀升,不变的是产品质量始终在高水平上保持稳定。张瑞敏与海尔初创时期企业文化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领导者对组织文化建立的重要意义。张瑞敏本身有着非常强烈的产品质量意识,他通过带头砸毁质量不合格的冰箱向员工作出示范,并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将这一文化“制度化”,进而在全员员工中传播,使员工认同、接受和遵守。

二、组织文化中期发展阶段领导者的作用

组织文化中期发展阶段,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组织开始由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此时的组织文化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方面,由于之前的实践已经证明领导者所建立的组织文化是正确的,能够促进组织发展的,因此这种组织文化已经被成员所认同和接受,在组织中逐渐稳定下来,并且通过制度维持着在组织中的地位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组织规模

的扩大,分支机构的增多,服务范围的更加广泛,原有的高度一致性的组织文化已经无法保证在组织所有分支机构、所有地区和所有服务对象中都普遍适应。各个分支机构、各个部门为了适应自己所处地区的环境和特定服务对象的特征,会在原有文化之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我们称为“亚文化”。组织初期建立起来的高度一致性的整体文化此时正面临着“亚文化”的冲击。此时的领导者应该是组织文化发挥作用的“催化剂”,是组织文化的鉴别者和干预者。

1.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发挥作用的“催化剂”

如果说在组织建立初期,组织领导者的主要工作是建立组织文化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是促进组织文化发挥功效的时候了。此时的组织文化通过影响组织的战略、结构、员工工作方式和人际关系等,成为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源泉。组织领导者主要通过以下种方法进一步增强组织文化,并促进组织文化发挥作用:(1)领导者重视、调节和控制组织文化;(2)领导者对重大事件和组织危机作出反应;(3)完善成员招聘、选择、培训、提升、退休和解雇等各项组织标准;(4)领导者对组织结构、组织体系的运作程序进行调整;(5)对组织宗旨、纲领和章程的正式说明^[3]。

2.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鉴别者

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所提供的服务的日益多样化,组织成立初期建立的那一套被证明有效的文化,此时未必仍然是一种好的指导准则,因为组织的内外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文化需要不断的更新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这就需要组织领导者对组织文化进行诊断和鉴别。仍然有效的文化成分需要巩固和强化,已经无效甚至阻碍组织发展的文化成分应该剔除和更新。

3.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干预者

在组织发展中期,组织的服务范围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小的地区,而是扩大到不同的地区,组织的分支机构也随之延伸。为了适应当地环境和服务对象的特点,在各分支机构内部都会形成与自己业务特点相适应的“亚文化”。组织内部“亚文化”的产生和壮大,会削弱组织整体文化的一体性,增强组织文化的多样性。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组织文化的多样性是与组织的发展相适应的,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应该被鼓励的。但是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对整个过程进行控制,以协调组织中各种“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减少和消除

组织内部整体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以及各种“亚文化”之间的冲突,维持组织文化的统一性。

案例2:马云与阿里巴巴企业文化发展

如果说经营设施、生产能力,甚至包括资本这些“硬实力”比较容易被复制和替代,那么“软实力”所表现出的某些“文化”特征,则很难被复制。在马云带领下并经过多年打拼的阿里巴巴储备最为丰富的,就是这种“软实力”。马云非常重视阿里巴巴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2000年公司推出了名为“独孤九剑”的价值观体系,随后又将其精炼成目前仍在使用的“六脉神剑”,即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4]。在阿里巴巴公司内部,每一名员工都非常认同和支持企业的文化,并且在日常工作中深受企业文化的影响。当然,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马云曾经意识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简单的利用互联网解决信息不对称已经不能满足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基于此,马云在“宁愿有一个不完美的变革,也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理念的指导下,对阿里巴巴的业务、工作流程和企业文化进行了升级和完善。通过马云在阿里巴巴企业文化发展和完善中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发挥作用、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关键。

三、组织文化后期成熟阶段领导者的作用

在组织文化后期成熟阶段,组织规模已经达到最大程度甚至显得有些臃肿,“市场”已经饱和,组织提供的服务也很难再更新,组织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和竞争压力。此时的组织要想维持其竞争力并继续发展,就必须进行变革和创新,而已经僵化的、保守的组织文化在这场变革中首当其冲。

我们假定组织发展后期的文化处于一种保守的、僵化的状态,事实也确实如此。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走到这一步的组织,其组织文化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此时的组织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组织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个方面,大家都愿意坚持这种文化并加以固守,因为经过历史检验的组织文化已经成为组织成员骄傲和自尊的根源。哪怕组织或领导者对组织文化作出很小的变革,也会面临较大的阻力,组织文化逐渐变得保守和僵化。在组织文化变革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组织领导者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变革的推动者

推动组织文化变革是组织领导者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组织文化的变革离不开组织领导者的参与,因为领导者的地位决定了他是组织中唯一一个能够对组织文化变革进程进行整体把握的人。领导者是一个组织的灵魂人物,只有领导者支持组织文化变革,并且起到带头作用,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才会参与。在组织文化变革过程中,组织领导者通过率先示范、与组织员工进行沟通和提供激励等手段可以提高组织成员对组织文化变革的支持度。组织领导者的素质、能力、个人魅力和在组织中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推动组织文化的变革。

2.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变革的焦虑消除者

组织成员反对变革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并不了解用来替代现有文化的新文化是否适合组织,是否能够像现有文化曾经做的那样也能给组织带来成功。组织文化变革效果的不确定性会使组织成员产生焦虑和担忧,这些焦虑和担忧如果不及时消除,就会进一步恶化并产生不良的后果。在这个时候,领导者可以发挥其在组织成员中的影响力,成为焦虑的消除者。一方面,组织领导者可以向组织成员说明现有文化的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并且阐释新组织文化的优点,使组织成员认识到变革现有组织文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组织领导者通过发扬奉献精神,主动承担义务,并且与组织成员共渡难关,使组织成员相信领导者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整个组织从而可以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组织文化的变革。

3. 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重塑者

当组织文化的大部分或全部已经变得无效,并严重阻碍组织的发展时,小修小补式的改革已经意义不大,此时需要的是重塑组织文化。这种情形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当组织面临巨大的危机时,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在重塑组织文化时,领导者的作用在于他首先可以使组织成员认识到之前的文化已经功能失调,文化重塑是唯一的出路,从而坚定组织成员放弃原有文化的决心。之后,领导者要做的就是重复组织文化建立初期的那些工作,用一种新文化替代旧文化,并在随后的实践中对新文化与组织发展的关系进行调试,使两者相互适应。在重塑组织文化的过程中,领导者可以采取各种保障和激励措施,消除组织成员的焦虑,提高他们对领导者决策的支持度,从而减少领导者在组织文化重塑过程中的阻力。

案例3: 乔布斯与苹果公司企业文化变革

1997年,苹果公司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已经连续亏损5个季度,僵化的企业文化严重阻碍着公司的改革。在改革举步维艰之际,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的乔布斯重新执掌苹果大权,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苹果公司内部逐渐形成。重回苹果后,乔布斯采用了高度聚焦的产品战略、严格的过程控制、突破式的创新和持续的市场营销等方法对公司进行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削减苹果产品线;裁员;远离低端产品市场;发扬苹果特色,开拓销售渠道;调整结盟力量;将苹果从单一的电脑硬件生产厂商转变为集音乐、电影和科技于一体数字化公司。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苹果公司逐渐走出困境,股票价格持续飙升,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公司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组织文化改革陷入困难的时候,组织领导人或者创始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乔布斯是苹果的缔造者,但是在苹果公司发展中期,由于经营理念与其他管理者产生分歧,乔布斯曾被迫离开公司。然而新的领导层经营不善,加之企业文化无法适应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变得僵化保守,苹果公司的发展和改革陷入困境。重返苹果后,乔布斯借助其创始人的身份和在公司中的地位及影响力,对公司及其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苹果公司上下重新获得精神支撑,通过共同努力,改革获得了成功。

组织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和灵魂,组织成员只有在领导者的带领下,才能凝聚力量,使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领导者的价值和职能在于确定组织的目标,制定组织的制度和规范,为组织成员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撑,从而使组织形成统一的力量。因此,领导者在组织文化建设、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 [1] 埃德加·沙因. 企业文化与领导[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 189.
- [2] 斯蒂芬·P·罗宾斯. 管理学(第七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5.
- [3] Edgar H.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Third Edition) [M].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2004: 246.
- [4] 刘洋, 马云. 没有什么能挖走我的团队[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070623/00013717590.shtml>.

[责任编辑: 范 君]

学习的路径指向、原则要求和成效转化

——基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视角

黄志高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 合肥 230039)

摘要: 建设学习型政党,重在把握学习的规律和要求。学习型政党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在这三者的统一中解决“向何处学”的问题。同时,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学习,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前人、他人的学习中开拓创新,以学习制度建设保证学习的持久性。遵循这些原则要求才能解决“怎样学”的问题。此外,还要将学习成效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转化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等思维能力,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学习型政党;路径指向;原则要求;成效转化

中图分类号: D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37-05

The path orientation, principles & requirements and effect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a learning - typed party

HUANG Zhi - gao

(Institute of Marxism, Research Center of Scientific Concept on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 typed party should grasp the rules and requirements of learning. A party of learning needs to learn from books, practice, and the masses, as well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here to learn it” in the integrity of the three sources. Meanwhile, it also needs to conduct learning by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to set up the learning style of linking theory to practice, and to initiate innovations in the predecessors’ study and the previous study to ensure the persistence of learning via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ystem. Yet, to follow these principles involve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how to learn it” and learning how to transform the learning effect into the political ideals & belief and value pursuit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into the thinking abilities of strategic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into the capability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a learning - typed party; path orientation; principles & requirements; transformation of effects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战略部署,其目的是通过自觉、持久、稳定、规范的学习活动,以保持和发

展党自身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好地实现党的宗旨,履行党的执政使命。能否把握学习的规律和要求,直接关系到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成败。

收稿日期:2013 - 12 - 13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工程省级立项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与安徽党政人才素质能力的提升”(20122013SZKJSGC7 - 12);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学研究”(2011sk695zd)

作者简介:黄志高(1977 -),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从路径指向、原则要求和成效转化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切实有效地开展学习活动,从而扎实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

一

建设学习型政党首先要解决“向何处学”的问题。明确了学习的路径指向,才能行之有效的开展学习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而言,学习的路径指向,既有任何个体和社会组织开展学习活动的一般性要求,又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质所规定的特殊性要求。

首先,向书本学习。这是学习的普遍性和经常性的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学习活动的首要途径。书本知识,是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的认识积淀和经验积累,也是继续前进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向书本学习,大体上包括学习以下内容:一是党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在各个时期都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书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的武装起来了^{[1]47}。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二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知识。包括党和国家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这些知识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担负起执政兴国重任所必须具备的。胡锦涛强调,“要自觉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从领导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不断丰富做好领导工作的知识武装和知识储备”^{[2]873}。

三是修养素质层面的知识。包括哲学、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等。毛泽东高度重视学习哲学,延安时期他曾三次向陈云讲过要学哲学。陈云深切感受到,“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3]362}陈云的意见也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尊重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强调的。毛泽东曾经指

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533-534}。

其次,向实践学习。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唯物史观,基于对知与行的深刻把握而提出的。其一,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一部蕴涵和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其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习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要在学中干,干中学。“在实践中掌握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良性循环”^{[5]267}。习近平指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领导干部提高执政本领的最好课堂”。各级领导干部“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熟悉社会、了解国情、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开阔眼界、提高本领”^{[6]215}。其三,“理论知识、历史知识可以通过书本学习来获得,品格、意志的锻炼主要靠在艰苦的实践中去解决。”^{[7]50}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应该勇于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

再次,向群众学习。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群众观而提出的。习近平概括了向群众学习的三个方面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求智于民,做群众的学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寻求智慧的不竭源泉;要善于问计于民,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做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从群众中来、办法到群众中找,使作出的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充分体现民意;要善于取德于民,真诚学习人民群众的优良品德,从人民群众身上汲取丰富的道德滋养,真正把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力量植根于人民群众的高尚美德之中^{[6]215}。

向群众学习首先要树立群众观点,相信群众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8]933}其次要亲近群众,“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能“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9]223}。再次,学习态度要端正,“要恭恭敬敬地向人民群众学习”^{[10]623}。最后,要把群众的经验综合起来,“成

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8]933}。

这种学习路径实质是统一的。书本上的知识说到底还是既往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而实践则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所创造和记录的丰富经验,才是智慧的源泉。建设学习型政党要善于在这三者的统一中开展学习。

一

建设学习型政党,还要善于学习,搞清楚“怎样学”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学习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否则就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功。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问题是要善于学习。学得好,就搞得快一点,也搞得好一点。”^{[11]389}为此,需要遵循以下原则要求。

其一,要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中心开展学习。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也随之变化,党所要学习的内容和要求也相应调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所进行的学习活动主要是围绕夺取政权、提高领导革命能力而展开的。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党,党的学习任务也随之变化。建国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2]1428}邓小平评价说,“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后来“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邓小平向全党提出,“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3]153}

邓小平指出,搞建设,行业非常多,每一项都需要有专门知识,还要不断增加新知识。但是,学习专业知识并不妨碍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以为搞建设就不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他殷切希望“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4]146-147}

其二,学习要切实端正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历史一再证明,学风问题至关重要。学风不正,教条盛行,不仅不能带来好的学习效果,反而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就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5]111-112}他主张,我们不仅要学习经典作家“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4]533}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用极具个性色彩的语言说,“不要提倡本本”,“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14]382}。江泽民也指出,“学习不应该是经院式的,而要有的放矢、学以致用。”^{[16]304}胡锦涛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只有同指导实践相结合才能把理论学深学透”,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17]374}。要“紧密联系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开展学习”^{[5]170}。

其三,学习既要海纳百川,善于向前人、向他人学习,又要消化吸收,勇于开拓创新。学习首先要尊重前人,汲取前人的智慧。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534}同时学习又是开放的,是面向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毛泽东指出,“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18]77}。“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8]41}邓小平主张“实行‘拿来主义’”,“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11]211}。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和管理方法。”^{[16]308}

我们必须向前人、向他人学习,但绝不能亦步

亦趋、照搬照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8]382}为此，必须做到：一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8]41}二是立足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的特点，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学习的基本立足点。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学习就没有意义。”^{[16]308}三是要发展创新。邓小平主张要说些“新话”，说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14]51}。又说，我们“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11]250}。

其四，学习要持久而稳定，注重学习制度建设。唯有如此，学习型政党建设才能成“型”。这里所谓的“型”，是指一种状态。学习型政党，意味着学习成为政党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成为广大党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习不是偶然的、临时的，而是常态化、制度化的。延安时期，为了推动全党有组织地开展学习，中共中央特意设立干部教育部。毛泽东指出，“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19]179-180}

在知识更新异常迅速的今天，学习的持久性尤为重要。胡锦涛指出，“我们正处在知识创新的时代、终身学习的时代，不懂得和不熟悉的东西很多，即便是过去懂得和熟悉的知识也有一个不断更新的问题”^{[20]622}，“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2]3872}。为了保证学习的稳定持久，建设学习型政党要求建立健全学习制度。习近平强调，“建立健全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对于促进党员、干部学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5]268}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健全和落实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制度，着力加强学习考勤、档案、通报、督查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促进学习、保障学习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和考核机制。

三

建设学习型政党，最重要的是求真务实。求真，就是通过学习求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实，是务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之实。由学习求

得的“真”，要转化为我们所要务的“实”，这中间还有个学习成效的转化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学习成效的转化直接关系到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效果。因此，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重视学习成效的转化。

首先，学习成效要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学习型组织的根本点，在于学习主体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学习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应有的一种特点、秉性和品质，但并不是其本质属性。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勤于学习、不断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就会偏离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正确方向。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执政党来说，必须通过学习，使全党同志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把党的政治理想、政治路线、政治主张内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陶冶道德情操的自觉行动。换言之，学习成效必须转化为全党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转化为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前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理想，后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和价值理想根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学习成效要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理解判断、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推理论证等能力的综合。思维能力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我们认识事物、处理问题能力的高低。对于执政党而言，提升思维能力，直接关系到其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党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陈云就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3]285}。江泽民也说，“要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干部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是涉及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问题”^{[10]145}。

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的提升。战略思维表现在抓全局、抓宏观、抓根本。邓小平反复讲的“大局”，就是战略思维的表现。他强调，“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

必须服从大局”^{[14]298}。陈云也强调,“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3]377} 创新思维则是表现为勇于根据时代发展、实践发展,突破旧思想、旧经验的束缚,突破教条主义束缚,提出符合实际、合乎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点,不断以新的认识、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7]337}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创新思维的结果。辩证思维则是辩证法在思维方式上的体现。“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说的,也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赞扬。毛泽东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18]200}

再次,学习成效要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6]1808}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在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任务尤为必要。党需要通过学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领导干部要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带头探索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的能力。

归根到底,学习的成效要转化为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领。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我们的本领提出了新的要求。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21]

参考文献:

- [1]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97.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3]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2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3(2).

[责任编辑:范君]

提升和优化学校文化,提高学校竞争软实力

冯正平,王小蕊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提升和优化学校文化,搞好学校文化建设,可以实现和提高学校的科学管理水平,提高学校竞争实力,对于学校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简述了文化及学校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提出文化变革、文化提升、文化优化三个学校文化发展基本阶段。指出学校文化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基本问题。只有掌握了现代教育技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学校,才具有真正的竞争优势和实力。

关键词:学校;学校文化;竞争实力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42-06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school culture and promoting school's soft power

FENG Zheng - ping, WANG Xiao - rui

(North Anhu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Suzhou, Anhui 234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schoo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culture can promote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the augmentation of school's competi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Based on the brief narration of school culture and cultural role and func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culture revolution, culture promotion and culture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several basic problems to be cared about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school culture. Only by grasping the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ith distinc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can the school have genuin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power.

Key words: school; school culture; competitive power

学校作为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知识和文化传承专门组织机构,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全面落实教育目标,领导必须运用和掌握实现科学管理的策略及方法,实现学校的科学管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高学校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如何提高学校在社会的竞争实力,是摆在学校领导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提升和优化学校文化,搞好学校文化建设,可以实现学校的科学管理,提高学校竞争软实力,对于学校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学校文化建设是关系学校竞争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一)学校文化

文化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化的话题,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严格、精确、公认和令人满意的定义。所谓文化,《辞海》里的定义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

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而学校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指一所学校,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并为其成员所认识和遵循的价值观念体系、行为规范准则和物化环境风貌的一种整合和结晶,表现为学校的“综合个性”。

(二) 学校文化的组成

学校文化一般由物质文化(表层文化)、制度文化(中层文化)、精神文化(深层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物质文化是支撑学校文化的外壳,包括学校的自然环境和各类设施,如学校名称、建筑设计、园林绿化美化、校标校徽、文化长廊、图书馆、各种教学、科研和实验设施等。学校的物质文化既体现了设计者文化素养,又反映了使用者的文化品位。制度文化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和支柱,包括组织的管理章程、教学科研的规章制度、学生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礼仪、工作传统等,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摸索、积淀下来的管理理念和思想。体现了一所学校的文化标准。对师生具有导向、约束和规范作用,有力的保障了学校正常的运转。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是学校的灵魂,它包括学校价值观、精神、宗旨、办学理念、校训、校歌、各种文化活动等。精神文化对内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感、人格塑造、思维方式和所作所为等,同时对外彰显着学校的人文素养、个性特色、华彩风貌和独特的魅力。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的动力。

(三) 学校文化的功能

学校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它不但有组织文化的一般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它独有的功能。

1. 传续功能 文化为上一代共享,并为下一代认同,因此,文化就有了传续功能。学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学校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传续文化是学校的基本功能,所以传承祖国的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让历经岁月淘洗的传统文化经典滋养师生心灵,熏陶学校的氛围,是学校文化义不容辞负载的历史重任。

2. 导向功能 学校文化是在长期的教学、科研

与管理实践中凝炼成的,蕴含着较深的价值体系。特别是校园中不同特定的文化区间内涌现出来的正面典型,集中地反映出学校优秀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素质和生活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和被教育者规定了一种目标模式,对身在其中的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指导其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个人行为引导到集体目标上来。因而,学校文化对推动校园文化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

3. 约束功能 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就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这也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形成。这样,秩序就会被维持下去。学校文化的约束功能,是通过“学校人”自身感受而产生的认同心理过程实现的。它不同于各种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如学生不能迟到,老师不能脱岗,更强调软约束,其执行情况依赖于每个个体通过内省过程产生自律意识,自觉遵守学校规定。自律比强制的效果好得多,强制易使师生产生对抗或逆反心理,使制度的执行力打折扣,自律则是师生从心理上自觉地接受约束和规范,并按价值观进行自我管理和控制。

4. 凝聚功能。这是指学校的文化氛围能激发“学校人”对学校目标、准则的认同感,将个人和集体有机联系起来,上下共甘苦,同命运。主要表现为:激发员工士气,使每个师生产生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归属感,并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感受到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休戚与共;集体对个人有很强的吸引力;个人对集体有很强的认同感。每个成员都在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中,最大限度地挖掘内在潜力。

5. 辐射功能。学校文化一旦成型,就会形成一种场域,产生一种磁性,它具有一种可以纵横辐射的魅力,不但对身在其中的人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还通过“学校人”将学校的形象、经营理念和学校精神昭示于社会,有的还会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树立了良好的学校形象。

6. 激励功能 通过学校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工作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满足“学校人”的各种需求,从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学校文化的激励不仅仅一种手段,而是一种艺术。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于眼前的作用,而更着眼于人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的因果循环。

由此可见,学校文化对学校的发展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它的功能和作用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

不能比拟的。

(四) 学校文化是学校竞争的软实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学校建设中逐渐引入了市场力量,学校之间的竞争也在逐渐地加剧。学校要在竞争中胜出,必须具备某种核心能力,才能提升学校效能。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学校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是学校的综合实力。一个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靠的就是学校的综合实力。硬实力反映了学校的办学现状和规模,它是学校发展的物质基础。软实力是学校品牌、形象、服务、文化、价值观、团队精神、影响力的总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反映学校精神,是学校文化中核心。它是一种“无形资产”,最终反映在学校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提升,学校才能发展。近几年,很多学校经过规模的快速扩张,学校硬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但软实力的提升却参差不齐。有的学校甚至出现了软、硬实力发展的严重失衡。由于软实力的不足,如教师队伍人心涣散、价值观扭曲,而难以形成教育的合力;新的培养模式改革,由于教师缺乏改革理念而难以实现等。可以说,没有相应的软实力做支撑,硬实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因此,软实力在学校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当今社会,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长期立足,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有体现学校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的软实力,形成学校真正的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学校文化。

二、学校文化建设的目标和追求

学校管理分三个层次:由最低层次的人管人,经历第二层次的制度管理,发展到最高层次的文化管理学校。三个层次的特征是:第一阶段是经验型管理,校长个人的经验、意志和人格魅力起作用,即人治——“行政管理”;第二阶段是法治,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即依法依制度管理——“科学管理”;第三阶段是文化引领,以“以人为本”,形成集体信念和价值观,即用文化统一思想,凝聚人心——“自主管理”,是学校核心精神和核心能力。学校管理经历经验、制度、科学阶段后,文化管理时代已经到来。文化管理已成为教育改革新的增长点,成为学校发展的新境界、新趋势及新阶段。学校文化建设是实行学校文化管理、推动学校发展的动力。

学校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形成“文化力”^[1],

使学校文化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原动力,最终实现学校的文化管理。学校文化和文化力并非同等概念。学校文化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经过自身努力、外部影响、历史积淀而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东西,它主要凝聚在学校所拥有的理念、制度、管理、行为、校风、教风、学风等深厚底蕴之中,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和综合力量。这种能够为学校和个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和支持力就是学校的文化力。

实践证明,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建立健全各种文化形式本身,而在于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和效能,在于努力提升学校的文化力,使文化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巨大力量。优秀学校的发展表明:强大的学校文化力决定着学校战略及相应的制度策略的制定,决定着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校发展的速度,影响着校内各种资源的开发与组合,塑造着学校的社会形象。

要在不断提升完善中打造形成学校文化力,塑造形成学校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创造性地、有效地运作学校文化要素,对学校文化进行系统的战略规划、系统的整合优化、系统的个性强化和规范运作,从而逐步形成学校的文化力,最终形成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实行文化管理,使学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在学校文化力建设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 提升学校执行力^[2]

学校执行力其实就是指把办学理念、思路、规划和部署付诸实施的能力。其实质包括学校的六种能力,即分析形势、把握大局、服务大局的能力;依法治校、规范行政行为的能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能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能力;做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带好队伍、激发积极性的能力;经得起各种考验的能力。

学校执行力直接践行和展示学校的精神理念,健全、优化执行力系统对学校文化整体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提升执行力文化时,要通过制定完善的监督措施和奖惩制度,激发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形成服从大局、目标明确、简单高效、执行有力、追求卓越、大气谋事、精细做事、踏实干事的执行力文化。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每个成员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大家共同前进指南。要提高对政策的理解力和操作力,保障政令畅通。完成任务追求圆满,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学校领导一定要率先垂范,选

拔和形成优秀的工作团队。

(二) 增强学校凝聚力

学校的凝聚力来自于每位教职员工,领导者通过文化建设形成。领导者全面了解教师,熟悉教师,尊重教职工;知人善任,各尽其才;培育教师的主人翁精神。教师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能使教师体会到学校是自己的学校,自己是学校真正的主人。倡导和形成敬业奉献精神 and 主人翁精神,领导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用自己正直无私、一心为公、敬业进取的思想言行和刻苦钻研的学术风范去影响、感化教师。使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学校中充分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三) 激活学校创造力

创造力是学校精神的基本特征。学校文化建设是由不断创造出来新的文化元素推动的。学校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长期立足,持续发展,创建品牌,就必须下功夫培育创造力。首先采取各种措施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强化他们的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氛围,提高师生的创新能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开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新局面。其次学校必须适应新形势,及时调整和探索办学的新思路,彻底改变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要了解社会,加强学习,开阔视野,更新观念,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培育创新精神、创建学校品牌的实践之中。

(四) 强化学校个性^[3]

不同的学校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办学理念办学宗旨不同,培养目标不同,管理理念不同,凝炼各自学校的传统,形成了学校特色文化,也就是所谓文化个性。不同的学校具有不同的学校文化,有的具有古老深厚的底蕴,有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的讲究科学、严谨,有的讲究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不同的学校文化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有的学校学生热情奔放、个性张扬、喜欢交际、善于交流沟通。有的学校学生含蓄稳重、勤奋严谨,团结协作精神强。这与学校的概况,学校的历史渊源、学校的精神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如提到百年名校,我们自然会回想起它的校训,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师大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等,校训恰恰反映了这些名校的发展的历史渊源,独特的理念以及发展的特色与个性。

在当今相互竞争的态势中,一所好的学校,能成为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校园、校舍

等表面的因素吸引人,更主要是由于她的传统、氛围等内在因素所散发出的魅力令人钦佩。学校的文化性格是否鲜明,生命力是否旺盛,学校文化是否能成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就直接决定了学校的成败。这时候,在注重凝炼学校的传统的基础上注重开发自我的特有能力和学校品牌引入竞争,建立起学校文化的战略个性,才能提升学校文化力。

三、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升学校软实力,提高学校社会竞争能力^{[4][5]}

当今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表面上看是质量的竞争,深究是人才的竞争,本质上则是文化的竞争。正所谓“一流的学校靠文化,二流的学校靠制度,三流学校靠物质。”只有优秀的学校文化才能孕育出优秀的学校教育,从而提升学校发展的软实力。

提升学校发展的软实力,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提炼办学理念,形成现代学校文化灵魂

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建立在对教育规律和时代特征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它是沉淀了学校的历史传统,反映了学校的社会背景,是学校生存理由、生存动力、生存期望的有机构成,是学校领导人和广大教师共同愿景的一整套教育思想体系的结晶。科学合理地表述办学理念,表达丰富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实践中检验办学理念的科学合理性,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提炼办学理念,形成现代学校文化灵魂。

(二) 坚持以人为本,实施科学管理

人是管理的核心,管理的目的在于发挥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以人为本科学管理,首先是提升个人素质,包括教师、学生、干部和一般职工。要增强团结和谐、诚信待人、互相切磋的人际素质。学校成员,不论是领导,还是员工,都是有独立人格的有着自我尊严的主体。应相互之间良性互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塑造、相互激励。形成强大的团队合力,围绕着学校的发展,大家献计献策。人人都是学校的管理者。

(三) 加强学校品牌建设,弘扬特色,扩大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

社会越成熟,品牌效应越明显。教育,已经进入品牌竞争时代。学校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必须倡导某种文化,与办学特色相辉映,在学习、研究和

践行学校主导文化中,打造学校办学特色,形成品牌。学校品牌是学校文化的一种体现,更是一种软实力。

建设学校品牌时,首先要在市场中遵循和充分考虑社会的客观要求、学校的客观基础、办学的客观条件和教育的客观规律,准确给学校品牌定位。努力培养一流的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有品牌校长和品牌教师。稳定的培养模式、扎实的课程体系下提升教学质量。以各种形式宣传学校品牌并社会广泛认可。全体成员珍惜学校创造的品牌并精心的品牌维护。品牌一旦诞生,品牌的维护、发展工程就应启动。维护的关键在于创新,品牌一旦声誉受损,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可能很快会失去优势并很难恢复。

学校品牌一定要通过扩大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形式来塑造。要向企业一样,注重社会形象的打造。通过各种媒体,对学校进行高起点、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道。注重师生形象的塑造。要求教师以敬业、乐业、专业的职业形象,学生以团结、向上、乐学、对社会尽责的自身形象,展示和树立起学校的良好形象。校园形象也是一种品牌形象。通过以上多种形式树立学校品牌。

四、学校文化在学校管理中的实践

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导引^[6]。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自身就蕴含着相当多的文化要素,它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学校文化是学校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具有独特凝聚力的学校面貌、制度规范和精神信念等。每个学校的文化不完全相同。每个学校管理者在管理自己学校的时候,都有一套独到的管理心得。它是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和移植的。要结合自身学校的实际,结合自身学校教职员工的素质和结合自身学校的历史和现实,有针对性的设计自己的学校文化。把学校文化纳入到管理的范畴。把对学校文化的理解,渗透到学校的管理实践当中,并与学校日常管理很好的衔接在一起。学校文化应该成为一种管理、一种学校环境和风气。这使得学校在管理理念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学校管理者要通过文化变革、文化提升、文化优化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才能把学校文化做优做强。

(一)文化变革

首先是学校招生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招生制度历来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和教

育制度,对人才资源配置、素质教育的导向和社会公平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中国教育已完成了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跨越,办学类型多样化、入学标准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毕业生就业形式多样化等,以适应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这也使得同类学校甚至不同类学校,对生源的竞争十分激烈。招生工作推向了社会,甚至推向市场。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学生的就业率的高低、社会和就业单位所认可等等,都需要学校领导重新定位和认真思考。学校的管理甚至可以说立校战略必须要变革。要提高学校的竞争力,首先就是革除掉那些和学校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思想观念。把学校文化做为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来定位。

(二)文化提升

学校文化,首先是要学校的人有文化。学校领导者首先要帮助学校的教职员工,特别是新教师,真正实现由一个社会人向学校人的角色转变,这也是学校文化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学校人就是全身心融入到学校的员工。不能人到校到岗,但是心没到岗,没有把心交给学校。不能有那种挖学校墙角、吃里爬外的员工。要对这个学校文化的认同。不能和学校离心离德。所以说学校文化的中心是要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里面就出现了价值观、学校的精神、学校愿景等等,它不仅仅是学校领导的愿景,它应该是全体教职员工甚至是学生的愿景。要逐步把教职员工培养成:

1. 能够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要求做好工作的合格员工;
2. 全身心融入到学校投入开展工作的员工;
3. 围绕着所从事的工作,不但能够保质保量,不但是合格,而且超出了管理者的期望值,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员工。
4. 真正把全身心交予学校的忘我投入的员工。在学校文化塑造学校人的过程中,要一步一步的把教职员工从合格提升到忘我。

(三)文化优化

学校文化建设永无止境,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自己管理的学校已经成为优秀、卓越的学校了。一个学校的文化建设是“永无止境”的,学校文化需要不断的变革、提升和优化。不断发现问题,不停地完善,常议常新。

学校文化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学校文化启动比较慢,不能操之过急

学校文化要解决文化认同问题。学校文化的核心是塑心,让大家真正把心交给学校,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需要时间。一项规章制度在学校推行比较容易,但是如果让一个员工发自内心认同学校文化、认同学校精神、学校价值观,就不是短期能做到的事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了。

2. 立足实践,认同学校文化,包括:

(1) 形象文化。如学校的标志、学校的标准字、学校标准色等等。目的是让大家尽可能的广为传颂。把这些相关的要素组合到一起,就是学校形象文化的最基本内容。

(2) 行为文化。广义的学校行为文化既有制度,又有职业道德。前者是必须做的,后者是应当做的。必须做的靠制度维护,应当做的靠职业道德。学校的制度维护靠的是惩罚,学校的道德维护靠的是正面引导和激励。职业道德可以通过树典型、树模范人物正面激励,让大家学有榜样,干有目标。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有严格的纪律、制度,纪律、制度要求大家不打折的执行。违反纪律、制度要受到惩罚。

(3) 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也就是心态文化,是学校,是学校文化建设最核心的内容。学校精神是一个学校灵魂;学校的价值观把学校精神具体化的环节,学校价值观可以结合学校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把学校精神落到实处。

对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学校教职员工,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并且具体的要求。要分出职业道德规范层次。

(四) 价值人的塑造

学校文化建设追求的目标就是价值人的塑造,让我们每个教职员工有自尊、自强、自爱、自立。学校文化建设要关注学校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最主要的就是三类人:优秀的校长、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五) 充分认识学校管理者在引领学校文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学校管理者是学校教职员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学校领导虽然是管理者,但不在于如何去“管”人,而在于如何去“影响”人。学校领导的职责应定位在“引领”和“倡导”上,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通过学校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才能“引领”和“倡导”。学校领导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

引领者。学校领导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一种习惯,一个爱好,都对校园文化产生严重的影响。学校领导要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引领”教职员工努力工作、用心工作、快乐工作,并“倡导”教职员工科学工作、用脑工作、有效工作,从而打造智慧型的管理团队、教师团队,构建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学校文化一定是融入了历任优秀校长的教育教学风格和管理个性的。当我们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时,就承认了学校管理者在学校发展进程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文科背景比如爱好儒学的校长,他的管理就会显示出平和中庸、沉稳持重的个人风格;相反,一个理科背景比如学数学出身的校长,他的管理就会或多或少地显示出严谨、精细,喜欢量化的特点。这些不同个性的校长在管理中显示出来的不同的工作重点和管理个性对学校文化尤其是校风的影响是巨大的。

传统的教育经验告诉我们,学校仅靠传统的资源优势已经不能在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中取胜。只有掌握了现代教育技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学校,才具有真正的竞争优势。

学校文化的实践证明:文化因素对人才的培养,已远远超过经济和物质投入的影响;缺失文化的学校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资源总是有限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1] 沈曙红. 文化力: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概念[J]. 人民教育,2006(2):20-21.
- [2] 熊晓武. 提升学校软实力打造学校硬品牌[J]. 江西教育,2007(11):23-25.
- [3] 徐白蓉. 增强高校创新文化建设提升学校软实力[J]. 中国商界(上半月),2010(3):1-2.
- [4] 李永生. 下一个竞争——学校“软实力”竞争[J]. 职业,2013(3):7-10.
- [5] 石中英. 新时期学校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EB/OL]. <http://wenku.baidu.com/view/e3f4282ab4daa58da0114ad9.html>.
- [6] 顾建德,喻志杰. 关于学校文化建设的思考[J]. 中小学校长,2011(11):11-14.

[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与把握

张世忠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人事部, 安徽 淮南 232007)

摘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指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的高低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优劣程度,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表现。科学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以学生为本”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实现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投入与产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把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48-05

On the connotations and grasp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lity ZHANG Shi - zhong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Anhui College of Industry & Trade, Huainan, Anhui 232007,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key embodiment for higher education, which measures the working level and educational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 grasping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lity must rely on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s of "students-oriented" and "overall quality management"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standard and individual standard, input and output,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quality; connotations; grasping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表现,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必然要求提高包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内的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为此,必须树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观,合理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切实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研究的现状

高校工作,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近年来,党中

收稿日期:2013-03-01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模式研究”(SK2012B07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世忠(1975-),男,安徽铜陵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取了各种举措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但是,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方面的研究却很少,在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或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为题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进行搜索,获得的学术论文只有8篇,即使是以“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为题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进行搜索,获得的学术论文合计也只有41篇,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甚至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研究的学术论文就更没有了。

另外,从课题立项情况来看,笔者在对近年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题指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课题指南和批准立项的课题目录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梳理时发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模式研究”在2011年开始进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课题指南中的一类课题。同时,教育部近期启动实施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工程”,并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作为2011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这一现象表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研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

从已有的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试图通过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方面从部分或者整体上去探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途径。从总体上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并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些对策,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有益的启示。但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实践经验总结的角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进行的笼统论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等同于其实效性,并没有从理论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进而树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观,为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升奠定理论基础。

二、科学界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

全面提高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和“生命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表现。树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观,把握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标准,是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科学界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必须首先掌握教育质量的内涵。目前,关于教育质量的解释,最权威的当属《教育大辞典》对教育质量的定义了。它将教育质量定义为“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衡量的标准是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前者规定受培养者的一般质量要求,也是教育的根本质量要求;后者规定受培养者的具体质量要求,是衡量人才是否合格的质量规格。”可见,教育质量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衡量人才质量的统一质量标准,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是指在统一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教育大辞典》同时指出,教育质量是“对教育工作及学生质量的根本看法,主要着眼于对学生质量的评价,因学生质量取决于教育工作质量。”由此看出,教育质量的内涵,内在的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者开展教育工作的质量,也就是教育的水平高低;二是教育的客体,即教育活动的对象——学生的质量,也就是教育效果的优劣。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就是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因此,对于教育质量内涵的理解,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教育毕竟是培养人的工程,必须把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教育质量内涵的核心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一方面,教育质量内在的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教育质量标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内容角度上看,它是包含了学校

的教育条件、教育过程、学校发展、学生发展、教师发展等在的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社会服务质量、文化传承创新质量等多方面的有机统一,其重点是人才培养质量,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关系到教育按照什么方向,以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去育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教育质量的重要表现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及其广泛,不仅包含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较高的思想觉悟,保证教育质量的方向,而且包含人文素质的教育,培养当代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康的个人心态、积极的竞争意识、正确的价值取向等等,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对于高校来说,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观。为此,必须确立科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标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规格,引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基于对教育质量内涵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的研究分析,笔者尝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作出如下定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指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优劣程度。其内在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这主要体现在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质量,包括学校在人财物等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投入,学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组织领导、队伍建设状况,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外思想政治教育等的开展情况,学校的学风校风情况等等。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优劣程度。这主要体现在两种效果中:一是对学生个体的教育效果。主要包括学生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道德品质、基本素质等情况,表现在:学生是否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学生是否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否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学生是否知行统一,

举止文明;学生是否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民主法制意识、科学文化素质、人文素养、健康状况如何等等。二是对学校的教育效果。主要是指学校的校风班风、校园的精神风貌、学生的学习风气、校园文化、学校就业质量、社会声誉等,表现在:学生是否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校园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参加各种知识和技能竞赛成绩如何;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以及整体就业质量如何;用人单位、家长和社会对毕业生总体评价如何;学校是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文化育人效果如何等等。

三、全面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

近年来,高校都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工作的开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何正确评价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科学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得失,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已摆在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笔者认为,在全面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中,要做到“三个坚持”、实现“三个结合”。

(一)坚持“以学生为本”,实现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相结合

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实施对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提高大学生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的着力点,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观。过去,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教育的立足点不是学生,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着眼点在于“教育”学生、“管理”学生,学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客体,是教育和管理的对象。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必须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将时代发展和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诉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聚焦学生的全面发展,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标准的核心。

社会本位,强调的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个人本位则强调的是为了满足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实现社会发展与大学生自身成才成长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结合,就是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这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有力保障。

(二)坚持“全面质量管理”,实现供给(投入、过程)与需求(产出、结果)相结合

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英文缩写为TQM)最早是由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菲根堡姆(Feigenbaum)和质量管理专家朱兰(Juran)提出的,是企业界应用的一种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其特点是不只管产品的质量,还要管产品赖以形成的工作质量,具备管理的全面性、全员性和全程性。TQM是一个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目的的理论。

严格意义上说,高校也是一个企业,其基本环节和企业的生产流程类似,包括:招生(原材料采购)——在校教育(加工生产)——毕业考核(产品检验)——就业创业(出厂)——毕业生跟踪调查(产品售后反馈)。相对于企业来说,高校毕业生相当于企业的产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教育教学过程也就是产品的生产过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内在的包含于其产品(学生)质量当中。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衡量其质量,不仅要看产品(学生)的质量,还要看产品赖以形成的工作过程(教育教学过程)的质量。也就是说,考量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应该坚持双层质量标准,一是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过程的质量,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投入(供给);二是教育产品(学生)的质量,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产出(学生所获)。为此,科学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应该做到以下三个统一:一是投入(供给)和产出(需求)的统一,不仅要关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而且更要关注其培养的对象——学生所获,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学生、用人单位的需求和满意度;二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不仅要关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质量,而且更要关注其教育的结果是否满足社会发展和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三是知、情、意、行的统一。由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反映具有滞后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不能立马显现出来,因此,考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不仅要关注学生在校接受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更要关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否内化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进而外化为学生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行为。

长期以来,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各学校,往往注重学校系统质量评价,弱化学生主体的质量评价;更多关注办学水平的提高,教育投入的增加,忽视学生的发展;更多关注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教学情况进行质量监控,缺少对学校教育活动是否对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行评估。学生的发展结果在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中,比重仅仅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为数极少的学生标准,也多体现在认知水平以及对知识的掌握方面。例如,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工程”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于2012年印发了《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试行)》,在其中的高校版中,分别从组织领导、队伍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外思想政治教育、条件保障、育人环境等六个一级指标方面测试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展及成效,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主体——学生发展却很少直接涉及,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毕竟,学校的发展,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最终都要通过学生的发展来判断,学生发展应该是学校发展,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尺。学校的价值,就在于能否把自己的学生塑造成一个全面发展的、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在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时,若忽视了学生的发展,客观上会造成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导,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应该坚持“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既要考量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投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更要考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的效果,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符合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三)坚持科学发展,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指导

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然具有指导意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也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把握。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以学生为本,围绕满足学生的需要、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能否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满足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坚持全面发展,就是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涵的把握中,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标准,包括对大学生的知识、思想、情感、理想、信念、品行等各方面的发展进行综合考查。不仅要重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掌握,而且要看其掌握的知识能否升华为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最终外化为具体的行动;不仅要看学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机态度、具体措施,而且要关心教育活动的实施效果;不仅要注重学生在校的思想道德行为表现,而且要重视学生在校外的思想道德行为表现;不仅要注重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知的考量,而且要注重对学生个性、情感、态度、价值观、行为的考量,充分体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考量时,要统筹考查学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效果,要从学生个人、学校、社会等多个维度综合评估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不仅要考查教育主体教育任务的完成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情况,也要考查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更要考查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满意度、用人单位以及社会对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满意度,真正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学生、社会方面的协调发展。

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考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时,既要看学生的现实表现,又要看学生的未来发展;既要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即时效果,又要看其对学校校风学风、校园文化形成的长期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反映也具有滞后性,不可能立竿见影的得以显现。因此,需要用动态的眼光,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全面提高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表现。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以学生为本”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科学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内涵,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推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Z]. 2004.
- [2]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2-11-18(1).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4] 胡锦涛.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1-4-25(2).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试行)的通知》[Z]. 2012.
- [6] 北京教育编辑部. 2011年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处长论坛召开[J]. 北京教育(德育), 2011(3): 15-17.
- [7] 王建伟, 关海军, 沈成恩.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效益的探讨[J]. 北方经贸, 2011(5): 36-37.
- [8] 李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建设的思考与探索[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31): 52-54.
- [9] 刘晓笋. “以人为本”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J].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6): 55-57.
- [10] 高艳. 大力加强学风建设 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J]. 北京教育(德育), 2012(z1): 37-39.
- [11] 周中之, 石书臣.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探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上)[K].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798.
- [13] 孙超. 基于“质量工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1): 188-192.
- [14] 王毅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问题研究[J]. 现代教育科学, 2005(6): 89-90.

[责任编辑: 范君李丽]

论严歌苓与张翎小说的历史与人性书写

刘云

(安徽大学 学报编辑部, 合肥 230039)

摘要: 严歌苓的小说经常在一段特定的、非常态的历史时空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张翎的小说没有特定的历史时空,也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感受、一种陪衬人物的时隐时现的背景。在表现人性时,严歌苓常将弱势与强势这一二元对立的关系置于同一时空中,把强势对弱势的侵略、挤压、控制和弱势对强势的反抗、退让、屈从等等非正常关系中人性的扭曲、变异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翎的小说却不存在弱势与强势的尖锐对立,她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和普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情理。严歌苓与张翎也分别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严歌苓的语言干净、利落、灵动、跳跃,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敏感,充满感性的色彩;张翎的文字平淡柔和、清新典雅、细腻温馨,具有一种古典神韵。

关键词: 严歌苓;张翎;历史;人性;语言风格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53-04

Different writings about the history and human natures in Yan Geling's and Zhang Ling's novels LIU Yun

(Editorial Section of Journal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 unveiling of history and molding of characters in Yan Geling's novels are usually set in specific and unusual historical space and time. Different from Yan's novels, the history in Zhang Ling's novels is merely a kind of atmosphere, feeling or a subtle background as the foil to characters. When embodying human natures, Yan often plac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in the same space, displaying to the readers the distorted human natures in the abnormal relationships of aggression, extrusion, control and resistance, concession, yielding, and so on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Opposite to the sharp opposition in Yan's novels, Zhang exhibits ordinary social lives with general emotions and common human natures. Both have also created their own language styles: Yan's language is clean, swift, agile, jumping with slightly exaggerated sensitivity and perceptual color; Zhang's language is simple, soft, elegant and delicate with a kind of classical charm.

Key words: Yan Geling; Zhang Ling; history; human nature; language style

—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大量学子负笈海外,生活的巨变、情感的考验、文化的冲突等等,都在这一代留学生和新移民的心灵上产生了剧烈的震动,一批反映留学生和新移民生活和心态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但是这些早期作品大都没有走出个人经验的狭小世界,要么是记叙传奇色彩的个人奋斗经历,要么是抒发身处异质文化环境中内心的孤独和

郁闷,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对生活的体验日渐丰富和深刻,有些海外新移民作家逐渐跳出个人经验的浅层表达和传奇经历的肤浅叙述,开始由眼前向过去、由外在向内心深处开掘,对历史与人性进行深入地表现和思考,其中最具个性的两位作家就是美国的严歌苓和加拿大的张翎。

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最有

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她在出国以前就创作了长篇小说《绿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并在1986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使她在1989年赴美后就比同时期的新移民作家有了更高的起点。在美国，她又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深造英文写作，从而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营养，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应该说，严歌苓这次远离故土的“生命的移植”大大激发了她的创作才情。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将严歌苓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题名《海那边》。此后，严歌苓又推出《扶桑》、《人寰》、《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多部中长篇小说，一直在海外新移民小说领域独领风骚。

与严歌苓相比，张翎的小说创作起步较晚，她于1991年才推出第一部中篇小说《梦里不知身是客》，9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作品才渐成气候，《丁香街》、《寻》、《女人四十》、《盲约》、《团圆》、《警探理查逊》等一批中短篇小说陆续见诸各大文学期刊，到1997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海外版名为《上海小姐》）出版，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她的作品便一部接一部地问世，她的名字也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悉。虽然张翎的小说创作起步较晚，但是她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比较成熟，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这显然与她深厚的文学功底分不开。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又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长期的文学修养为她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严歌苓与张翎这一南一北两位作家，虽相隔万里，却都用自己独特的文字阐释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且风格迥异，为我们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提供了范例。

二

虽然都是写过去、写历史，但严歌苓笔下的历史与张翎笔下的历史却有很大不同。这首先表现为对历史的选择上。严歌苓的小说经常在一段特定的、非常态的历史时空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在长篇小说《扶桑》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一百多年前被贩卖到美国金山做妓女的青年女子扶桑。扶桑的一生是坎坷的，或者说是充满传奇的，但她独特的经历却是与在美华工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部《扶桑》不仅塑造了一个在苦难中得以升华的妓女形象，也再现了一百多年前在美华工的辛酸血泪史。严歌苓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人寰》以中国大陆的反右倾运动和随即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领导的贺一骑保护了作为右派分子的“我”父亲，父亲为了报答贺一骑的恩情，日日夜夜替他写书，他们也因此成了“好朋友”。贺一骑成了名作家，“我”父亲却始终默默无闻。文革中，贺一骑受到批判，“我”父亲长久积压的郁闷终于爆发，在一次批判

贺一骑时，他狠狠打了贺一记耳光，但生性善良的父亲却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文革结束后，贺一骑大度地原谅了父亲对他的背叛，父亲在愧疚之下更加勤奋地为他写作。应该说，是特殊的历史造成了贺一骑与“我”父亲之间这种貌似友情的保护与被保护、利用与被利用的畸形关系，没有那段历史，贺一骑与“我”父亲将是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各自书写各自的人生。可见，严歌苓笔下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人物，人物的特殊遭遇又强化了历史的残酷性和荒谬性。

而在张翎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张翎的小说没有特定的历史时空，也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感受、一种陪衬人物的时隐时现的背景。比如在《交错的彼岸》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女性形象——阿九。阿九聪明能干、胆识过人。她从死去的主母体内抢救出飞云，从而为威震江南的金三元绸缎庄延续了“香火”。又是她，果断地卖掉了田产，把大布庄改为小作坊经营，从而保住了家业，甚至在若干年后那场历史大变动的年月里，曾经富甲一方的金家能够以小业主之名得以逃脱灭顶之灾。在文革中，她又以自己的机智使黄尔顾免遭造反派的迫害。阿九的人生旅程贯穿着中国从旧到新发展的历史，也正是在这种纷乱的历史面前，阿九的性格才能够如此鲜明动人。阿九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以自己的坚强和忍耐照拂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从阿九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大家族兴衰成败的过程，感受到那一种由盛而衰的没落气息，以及由此而生的浓重的怀旧气氛，而历史，就是为塑造阿九的形象而服务的。

三

尽管严歌苓与张翎的小说对历史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书写，但是在不同的历史书写中她们却将关注的目光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人性。无论是严歌苓还是张翎，都注重在小说中深入挖掘人物的隐秘心理，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凸现出最真实丰富的人性。

严歌苓在她的小说中常将弱势与强势这一二元对立的关系置于同一时空中，把强势对弱势的侵略、挤压、控制和弱势对强势的反抗、退让、屈从等等非正常关系中人性的扭曲、变异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扶桑》以妓女扶桑的遭遇为窗口，让我们看到一百多年以前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的种种歧视乃至仇恨。让人遗憾的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一对强弱对立的平等关系、这种强者对弱者的歧视与欺凌至今也没有改变。种族歧视虽然没有公开张扬，但是“它形色如幻，一时无所不在，一时无所不在……周围的白面孔千篇一律在微笑，那笑怎么都比追打进化许多。于是我们如此迷失”^{[1]126}。再如长篇小说《人寰》。出身贫寒、自小

就参加革命、现身居高位的贺一骑与资本家出身、被打成右派的“我”爸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构成强势与弱勢的明显对比。一场政治运动造成了他们终生解不开的情结。这看似两袖清风的友谊,实则是含而不露的控制与利用。人性的自私、阴暗被掩盖在这种奇特的朋友关系之中。而身为导师的舒茨教授与“我”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强势与弱勢的关系。舒茨教授试图利用他对“我”的恩典控制“我”,在他对“我”恩典式的爱情中,“我”清楚地看到隐藏于其中的讹诈与奴役——对于“我”青春的讹诈和对于良知的奴役。严歌苓的短篇小说集《海那边》中对这种非正常关系中人性的变异和扭曲,也有诸多表现,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严歌苓善于袒露人性的阴暗面,暴露人性的丑恶,她用自己的笔坚决地挑开蒙在人脸上的那一层伪善的面纱。使人性最真实、最阴暗、最不敢被人正视的层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比如在《扶桑》中,严歌苓就以冷峻的语言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性不被承认的扭曲和异化:“出卖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人们认为你在出卖,而并不认为我周围这些女人在出卖。我的时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这么多的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偷换了,变成婚嫁。这些女人每个晚上出卖给一个男人,她们的肉体货物一样聋哑,无动于衷。这份出卖为她们换来无忧无虑的三餐、几柜子衣服和首饰。不止这一种出卖,有人卖自己给权势,有人卖给名望。有人可以卖自己给一个城市户口或美国绿卡。”^{[1]181}严歌苓用最清醒的理智直面惨淡的人生,对社会的冷酷无情和人性深处的种种丑陋状态做出最深刻的揭示,让人不得不反思和警醒。

张翎的小说却完全不同,在她的小说中,不存在弱勢与强势的尖锐对立。张翎以其开放的文化眼光和胸襟营造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小说世界。在长篇小说《望月》中,张翎叙述了孙家和颜家两个家族兴衰交替的过程。孙家由名震上海的富贵之家逐渐走向没落,而颜家却从江北逃荒的苦力一跃成为上海暴发的新贵;被孙家姆妈鄙视的颜开平成为孙家的衣食父母,而曾经怜悯颜开平的望月也靠了开平的力量在画坛成名。就像小说中所述:“孙家的精致和颜家的简朴,其实是一块玻璃的两面,反射的都是同一个光源,那个光源便是钱,离开了那个光源,剩下的没有本质的差异。”^{[2]198}人与人之间如此,文化与文化也是如此。在张翎的小说中,东西方文化处于平等、交流、融合的状态之中,她拆除了人物之间的语言障碍,使东西方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张翎试图“跳出移民文学的槽臼,不去探讨移民过程中常常遇见的文化种族差异,而是去努力寻找跨越种族文化的人类共性,在这个前提下,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国人,还是洋人,故事场景发生在中国还是外国,小说的作者住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已经不重要了。”^[3]

另外,张翎也善于表现和揭示人物的隐秘心理,表现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与严歌苓小说不同的是,张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和普通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情理,而不是严歌苓小说中那种非正常状态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在张翎的小说中,虽然人性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并没有严歌苓小说中所展示的那种美与丑、善与恶、伟大与渺小等等界限鲜明对立。

《望月》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并且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表现出微妙、复杂的人性特征。作者并没有刻意彰显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弱点。比如,作者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了李方舟对踏青的痴情,但与这同时,却没有否认李方舟曾经出现的自私与犹豫:“若想拥有她,他需要打碎他过去的一切。他的过去是已知的,他和她的将来却是未知的。在已知和未知中间,未知的恐惧便显得更为恐惧。哈姆雷特为了这个理由选择了生,他为了同样的理由选择了拖延——因为他吃准了她的死心塌地。然而,时不时地,他会提醒她,她的死心塌地绝对是她一厢情愿。他在其中,原本是清白无辜的。”^{[2]125}李方舟对踏青的爱是真的,但他的自私和软弱也是真的,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之处。

张翎善于描写生活中的人性美、人情美。如果说严歌苓的小说是以“审丑”作为主要的美学旨趣,张翎的小说就是着重于“审美”。她的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人物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善良的、充满正常人性的,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以中国传统的“仁爱”精神为内核的人际关系。创造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温馨的艺术世界。彼得不是黄明安的亲生儿子,但是黄明安仍然待如己出,也没有因此对卷帘改变态度。卷帘虽然对羊羊十分不满意,到羊羊遇到困难时,卷帘却没有冷眼旁观。刘晰与星子平时更是互相照顾。望月住院了,世昌尽管被别人误会,还是精心地照顾她。即使是牙口,也领养了两个孤儿,表现出人性的美与良善。小说还善于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关怀。那种琐碎的、细微的、甚至是不经意的关怀往往更让人感动。望月买房事先没有通知卷帘和黄明安,搬进新居后黄明安亲自送来一个电饭煲,以缓和望月与姐姐卷帘的矛盾。虽是一件小东西,但礼轻情意重,如此用心良苦,岂有不让人感动之理?小说中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性美的张扬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价值取向与人文关怀。其实无论生活中存在着怎样的美,也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善于感受美的心灵。张翎用她的文字把对美的感受传达给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始终都能感觉到作者用她温情脉脉的眼睛关注着小说中每个人物、每件

事情,即使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残酷场面作者也用她那特有的女性温柔将沉重和血腥过滤,从而荡尽生活本身的浮躁,使小说归于平和、宁静。

同样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呈现,严歌苓与张翎这两位作家却创造出冷酷与温暖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或致力于“审丑”,或执着于“审美”。其实,无论是“审丑”还是“审美”,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表现生活。生活中既存在着丑陋的一面,也存在着美好的一面,就像无论一个城市多么流光溢彩,也总有破乱肮脏的角落。美好与丑陋本来就是生活中同时存在的现象,因此,无论是暴露丑,还是赞扬美,都有其无法替代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否认,审丑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唤起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让人们正视丑陋从而得以改变并除去丑陋,使生活变得更美。就如严歌苓所说:“高一层的审美,恰是审丑。”^[4]从这一点来看,严歌苓与张翎的小说在根本的主题指向上仍然是一致的。如果说严歌苓是“冷秋”,张翎就是“暖春”,她们以其各自独特的文学作品为读者展示出一个全面的人生。

四

与小说的思想内容相适应,严歌苓与张翎分别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严歌苓的语言干净、利落、灵动、跳跃,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敏感,充满感性的色彩,像毕加索的印象画,是一种变形和扭曲了的贴切。她的语言常常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使读者获得独特的审美感受,如《扶桑》中的一段话:“在扶桑病得咳也咳不动的时候,阿绵跑到街上去了。阿绵笑得一街的太平都碎了。所有人给她让路,惊吓得牙也忘在了嘴唇外。”^{[1]76}失去了孩子的妓女阿绵疯了,她的疯笑打破了唐人街表面的平静。一个“碎”字,既有声,又有形,更有情,将阿绵的疯笑中所透出的令人心酸的凄凉生动、形象、准确地表现出来。再如短篇小说《方月饼》讲述了一个留学生买了一些月饼想在中秋节晚上和同胞们共庆佳节。异国的一个方月饼抵得小说人物一个小时收入,但却并没有带来预期的聚会,她只好把同屋的美国人玛雅当作节日的陪伴,和自己一起分享月饼,但玛雅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中秋节之于一个中国人的意义。小说最后,作者写道:“她走了,我独坐、闷坐、枯坐。头生疼生疼。蓦地扭脸,天中央有了月亮。……它很白很圆,像阿司匹灵大药片。”^[5]“独坐”、“闷坐”、“枯坐”,不仅简洁有力、富有节奏感,而且蕴涵着层层递进的情绪演变,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主人公一个人长久地坐在月下的孤单的身影、体会到她孤独、郁闷的心情。“像一枚阿司匹灵大药片”的比喻更是非常巧妙,把主人公苦涩而又悲凉的心境淋漓尽致又别出心

裁地表达出来,同时也为小说营造出一种灰暗、冷峻的色调。

张翎的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与严歌苓完全不同。她的文字平淡柔和、清新典雅、细腻温馨,具有一种古典神韵。张翎说:“我采用了一种较为古旧的语言来叙述一个其实很现代的故事,像用一种古色古香的纸来包装一瓶才酿的新酒,希望借此营造一种距离感,不让自己陷入时代的泥淖中。”^①在她的小说中,她用自己舒缓、典雅的语言把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讲述得波澜不惊。“读她的小说,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遥远的冷静,有距离感的清凉,像是一个尘外的人娓娓诉说着尘内的故事,隔着一层软软的纱,那纱就是张翎身心毕露的文字中独有的纤柔的温暖。”^[6]连张翎笔下的月亮也是柔和、温馨的,全然没有严歌苓笔下那种苦涩与冷峭:“沉蓝的天幕上,剪纸似的挂着一弯月亮,那月亮并不圆,像农家用钝了的镰刀,却亮得出奇。四周簇拥着些云彩,那云彩都镶着些模模糊糊的淡黄色的边,月光抹在远处的树上,朦朦胧胧的,树梢上像洒满了霜似的,就有些肥胖起来。”^{[2]198}再如描写踏青的猝死:“踏青是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丽的初恋状态里猝然离去的。她活得不够长,还没来得及让方舟看到她身上琐碎和实际的一面。死亡不露痕迹地过滤了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丑陋和瑕疵,留下的是刻骨铭心午夜梦里的完美。一如琥珀的形成,生命被突发的外力凝结在一个极为凄凉的静止状态,无视着世上沧海桑田的变迁。”^{[2]79}

如果说严歌苓的语言是充满感性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张翎的语言是充满悟性的,她把这种悟性同传统文化的意蕴、丰富细腻的比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充满诗性的语言,像是中国的山水写意画,在那一份神似中还不忘记给读者留下大片想象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严歌苓. 扶桑[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 [2] 张翎. 望月[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3] 张翎. 冷静的审视和叙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发展方向[J]. 转引自李蓉. 张翎小说与海外新移民小说的新开拓[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6(1).
- [4] 严歌苓. 严歌苓作品精选[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246.
- [5] 严歌苓.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73.
- [6] 陈瑞琳. 风雨故人 交错彼岸[N]. 光明日报,2001-05-24.

[责任编辑:吴晓红]

① 关于《交错的彼岸》的文学对话. 见 <http://bbs.highot.net/thread-48429-1-1.html>.

自我消解的守护者

——论《A&P》中对骑士文学的戏仿

孙长玥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约翰·厄普代克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最多产和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在其著名的短篇小说《A&P》中,他创造出了萨米——这个与传统骑士文学中骑士形象大相径庭的新骑士形象,这是厄普代克对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戏仿。通过与骑士文学的对比研究和对萨米这一形象的文本分析,探讨了《A&P》对骑士文学戏仿的创作特征,并总结出了新时代创作中的新骑士形象:背离传统,暧昧不明,非黑非白,看似勇于担当,实则自私自利;看似绅士风度,实则欲念熏心,缺乏道德标准,没有自我约束。

关键词:《A&P》; 骑士文学; 戏仿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57-04

Guardian in self – destruction

——on the parody of cavalier literature in A&P

SUN Chang – y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John Updik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ive and awards – winning American writer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In A&P, one of his famous works, Updike creates Sammy, a new knight imag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knights, which is the parody of traditional cavalier literature. Through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cavalier literature and textual analysis of Sam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the parody of cavalier literature in A&P and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neo – knight images in modern literary creation: anti – traditional, ambiguous, ambivalent, more selfish than courageous, immoral and non self – disciplined.

Key words: A&P; cavalier literature; parody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 – 2009)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最多产和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在多部作品中塑造了骑士形象,包括其著名的短篇小说《A&P》。该小说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描述了一个19岁的超市收银员萨米(Sammy)因不满经理伦格尔(Lengel)批评三位身着泳装赤脚购物的妙龄少女着装不检点而愤

然辞职的故事。文中萨米以骑士自居,把自己倾慕的女孩称为女王(Queenie),并把保护女王看成自己神圣的使命。然而,萨米——这个新骑士的形象与传统骑士文学中的骑士形象大相径庭,是厄普代克对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戏仿。那么,何为戏仿,因何而戏仿,戏仿之结果如何,这三点便是我们接下来所要展开的内容的概括。

收稿日期:2012 – 12 – 20

作者简介:孙长玥(1989 –),女,安徽寿县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骑士文学

要分析《A&P》对骑士文学的戏仿,就首先要了解骑士文学的前世今生。骑士文学是欧洲骑士制度的产物,也是中世纪欧洲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体裁上大致包括骑士抒情诗、骑士传奇、骑士小说及后来的反骑士小说,内容上主要描写骑士的冒险经历和典雅爱情,表现骑士精神。

典雅爱情是欧洲中世纪骑士持有的一种特别的爱情观,其中心主题是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它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爱情的双方是骑士和宫廷(或城堡)里的贵妇人,双方地位悬殊;第二,爱情的双方不以性爱和结婚为目的,是神圣的精神恋爱。此外,骑士精神还表现为对个人人格的爱护与尊重;为被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等。虽然骑士精神在中世纪现实中也有一些负面体现,如他们的怜悯仅限于本民族等,但它仍然是西方绅士文化的源泉。

骑士精神在骑士阶层鼎盛的时期被作为一种美德来赞扬,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是以正面积的形象出现。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了17世纪早期,尽管象征旧时代统治权的骑士阶层已经基本没落殆尽,但是骑士精神却作为长久以来广为流传的文学核心被保存了下来。在时代的发展中,骑士文学的核心被保留,外壳被逐渐解构,内容里也被注入许多新时代的特征。换言之,骑士文学通过自我解构与再构成,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最初的骑士文学是以讴歌骑士精神这种理想的境界为主要内容,后来的时代给骑士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戏仿。

二、戏仿

戏仿就是戏谑性仿拟,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这就表明戏仿文体不可能是单文本存在的,与原文本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忽闻关系,前者从后者衍生而来,对后者既模仿又改造,既复制又替换”^[1]。对于骑士文学的戏仿即是作家虚构一个对象或情节,然后以戏谑性的方式模仿骑士文学,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作《堂吉珂德》,该小说的主人公堂吉珂德便是一个典型的对骑士精神的戏仿的产物。骑士精神的基本特征虽然在堂吉珂德身上得以保留,但仅仅

只剩下脆弱的核心,依附于这核心之上的时代的外壳与骑士时代截然不同,这种外在与核心的分歧便构成了戏仿的关键要素之一——反差感。原本应当作为美德而被赞扬的骑士精神,在新的时代里却成为了迂腐、愚蠢乃至自寻死路的为人所嘲笑的丑角的特征,这正是对骑士精神所代表的旧阶级的嘲讽,也是对时代变迁的感慨。作者通过创造这样一个形象,成功地将原本的骑士文学中的骑士形象进行了解构,为读者创造出了一个新时代的骑士形象,这个形象具备了一切骑士的特征,但是却不再是为人们所崇敬的对象,这便是达成了戏仿所要达成的目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骑士精神对文学的影响依然在持续,而戏仿这一文学手段在新的时代也有了新的表现,这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之一便是接下来要加以分析的《A&P》中的主人公萨米。

三、《A&P》中对骑士文学的戏仿

(一) 对故事场景的戏仿

从对场景的戏仿来说,传统的骑士文学通常都会把场景设置在城堡、宫廷、森林中,出身高贵、历经磨难奇遇、英勇善战的骑士们或忠心护主护教或英雄救美,冒险成就一段佳话。而在《A&P》中,故事却发生在美国小镇的一个超市里,主人公萨米是一位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且虽以骑士自居保护女王却没有具备基本的骑士精神。通过萨米对这家超市物品摆放顺序的熟悉程度和对其他同事家庭情况的了解,可见他已在这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整日重复同样枯燥乏味的工作且迷茫没有目标。没有“活得尊严以及荣誉”。他把超市购物的一般顾客称为“绵羊”和“家庭奴隶”,把那些整天监视收款爱挑毛病的顾客称为“老妖婆”。没有做到“不可无礼的冒犯他人”。当三位泳装女郎款款地步入超市时,萨米肆无忌惮的打量着她们的身材,甚至忘了手头的收银工作。之后萨米的眼睛始终追随着她们,想入非非,根本没有遵守社会道德的基本礼仪。

(二) 对故事情节的戏仿

从对情节设置的戏仿来说,三个女孩的出现无疑给萨米这个在相对封闭、不太开化的小镇上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却又愤世嫉俗、追逐新奇的大男孩带来巨大的冲击。女孩曼妙的身材、青春的活力、自信的举止顿时让萨米无法自拔。萨米爱上了其中的首领并称她为女王,立刻在心理上变身为骑士

保护他的女王。当超市的其他顾客和职员见到泳装少女表现得不知所措时,萨米嘲笑、蔑视他们。当代表传统道德准则的经理介入批评女孩们着装不检点时,看到女王及其同伴因挨骂而脸红急匆匆地逃离超市,萨米担起了营救遇险被困女王的任务——以离职表示抗议。这些都符合骑士文学中骑士冒险作战和崇拜贵妇人的主题。但萨米的“英雄主义行为”虽然体现了其勇敢却只是为了讨女生的欢心,满足自己的私心。

(三) 对骑士形象的戏仿

从对骑士形象的戏仿来说,传统的骑士追求精神层面的爱情,崇尚贵族的礼仪,谦卑有礼,不失风度,而从萨米对女孩们极为详细的描述中,我们却能很明显地注意到,萨米关注的更多的是女子的性感的衣着、裸露的皮肤、柔软的臀部、细长的大腿、棕色的头发等女性特征,体现出了其行为的动机更多地是来自于本能欲念的影响。此外,萨米从一开始就称其倾慕的女孩为女王,这除了她出众的外表因素之外,还因为萨米认定女孩的气质一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难以抑制的对物欲的崇拜与追求使萨米浮想联翩:“我随着她娇滴滴的话音隐入她家客厅。穿着乳白色的上衣、打着领结的父亲和其他男宾们闲散地站着聊天,而脚穿凉拖的夫人们正用牙签从一个大盘子里取鲑鱼点心吃……^[214]”。萨米渴望能借助女王融入富裕的上层生活,摆脱贫困的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文中没有任何真正浪漫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描写,萨米的爱慕丝毫没有传统骑士对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崇拜的纯洁性,他的“英雄行为”带着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颠覆了充满神性光环的中世纪骑士形象。

(四) 对角色命运的戏仿

最后,从对角色的命运的戏仿来说,厄普代克一反传统骑士文学中常见的完美结局,安排了一个让萨米一无所获失望至极的下场,他英雄救美的豪言壮语女孩们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看似勇敢的放弃丝毫未能引起对方的注意,等到他追出门时,对方早已扬长而去。这一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结局无疑是对萨米虚伪的骑士行为的无情嘲弄——不仅让他丢掉了工作,而且女王对他的“英雄行为”直接无视更没有感激之情。萨米孤零零的站在超市外面,不知所措,“他一想到今后的认识定会艰难无比,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的胃都下垂了”^[214]。

四、创作特征

(一) 时代特征

作者对骑士文学的戏仿是对骑士阶层以及其所保护宣扬的精神的一种反叛,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骑士文学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从而实现了戏仿本身的性质之一: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的目的。

文学创作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表达作者的思想,表达作者对世界的、文化的或是其他方面的观点,更是为后人留下了观察作者所在时代的文化与历史的窗口,这也就意味着每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骑士文学诞生于封建时代,宣扬的自是维护封建统治所必须的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形象,因而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诞生的骑士形象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符合当时封建阶级价值观念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被浓缩为骑士精神的思想。

然而,到了本文创作的年代,美国正经历着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及反战运动等,人们的各种观念都处在一种激烈的起伏动荡之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基于封建道德价值观念而诞生的传统骑士已经不再适合现今的读者,而创作新时代的“骑士”,就要求作者刨除传统的骑士文学外包装着的封建时代的文化外壳,用戏仿的手术刀改造骑士文学的身躯,最终赋予其新时代的面容,赋予其表达新时代思想的功能,这便是戏仿于本文中被运用的最大目的,亦可说是创作的基础条件之一。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过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萨米这样一个被改造的骑士的形象,他所代表的不再是高贵的骑士美德,而是一个“更加符合时代特色”的骑士形象——背离传统,暧昧不明,非黑非白,看似勇于担当,实则自私自利;看似绅士风度,实则欲念熏心,缺乏道德标准,没有自我约束。他不仅仅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典型美国青年动荡不安又充满迷茫的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的折射,也反映出了当时的美国价值观念的一个侧影。

(二) 心理特征

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传统骑士文学所象征的骑士精神理解为一种由“超我”(superego)所主导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通过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等有意识的限制性的行为来指导自己的精神与物质世界,通过规范化的倾向达成心理上

的自我满足,从而实现自我价值。而厄普代克笔下戏仿后的现代“骑士”则是象征着一种由“本我”(ego)主导的行动模式,更多地注重内心的本能与自我中心式的需求,挑战传统,破坏规则,通过这样一种离散化无序化的倾向来达成自我满足。本我主导与超我主导的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超我主张的是规范与限制,这种规范与限制能够强烈地被执行者的思想世界所意识到,换言之,其处于“前意识”的领域,显而易见地“显身化”地指导着执行者的行动与思考;然而本我主导的自我价值实现方式更多地依靠本能的需求与潜在的欲望,这种动机源泉通常难以被执行者意识到,也就是处于“潜意识”的领域,然而在这种实现方式中却确实地影响着执行者的行为。具体到本文而言,萨米的行为动机很明显不是出于道德规范或是自我约束之类的“强制性”的规范限制,而是更多地出自于内心的悸动与反叛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萨米的行为动机更接近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利比多”(libido)的概念,也就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这种冲动驱使萨米做出了接下来一系列的自我表现行为,通过这样一种行为,萨米满足了其内心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也同时破坏了其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本我主导与超我主导的出发点大相径庭,甚至可说是背道而驰,然而二者所指向的终点却都是自我实现,差别仅仅是实现价值的层次的不同。

作者对这样一种自我实现方式大施笔墨,既有受当时社会整体风气影响而对传统观念的保守姿态与对个体过多的约束有所不满时,也同时有意无意地对已经踏上失控边缘的社会思潮——过度地自我中心、无视社会规范、肆意妄为的自由散漫主义表现出了并非完全赞同的态度。

五、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文学性的角

度而言,萨米的行为一面构成了骑士文学的行文结构,其行为从结果上来看是符合骑士文学中“保护女性”的特征的,但是其行为的动机却与骑士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消除了骑士阶层的高贵性,原本应该是一体的骑士精神与骑士文学在这里被一分为二,骑士精神在骑士文学中变成了“不在场”的状态。

从作者的深层思想而言,其本人并未明确地表达出创作这一形象的立场倾向,其笔下的形象也充满了自我矛盾的色彩,这正是其对待当时的社会的一种辩证性思维的体现: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肯定,既不被传统所完全束缚,也不对自我行为抱有完全的宽容,体现出了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的思想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迷茫与不安定的特征。

一言以蔽之,萨米是一个典型的被重构的骑士形象,他的身上具备了骑士的某些特质,但同时体现出了与其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异样感。他的行为举止保留了骑士文学的特征,然而却在保留的同时剥除了“美德”的外壳,实现了对其骑士形象

参考文献:

- [1] 王守仁. 谈后现代主义小说——兼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和《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J]. 外国文学评论, 2003(3): 142-148.
- [2] Updike J. A&P [M]. 王守仁, 赵宇, 译. 英美小说.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3-44.
- [3] 陈晓明. 后现代主义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4] 金衡山. 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5] 唐国清. 试论欧洲文学中的骑士精神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3): 42-48.
- [6] 朱振武. 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吴晓红]

自然之隐喻及其启示

王惠萍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人类的思维就是建构在隐喻之上。可以说,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离不开隐喻;人类语言中也不乏关于自然的隐喻。常见的自然之隐喻有自然是人、自然是上帝写的书、自然是机器及其变体形式自然是仓库和地球是热力发动机、自然是母亲和自然是网等。这些隐喻揭示了不同时期的人类——自然关系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隐喻可以影响并调整人类的生态意识,因此,语言研究者有责任并有义务设计新的隐喻,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促进人们生态意识的培养。

关键词: 自然之隐喻; 人类——自然关系; 启示; 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61-04

On metaphors of nature and their inspirations

WANG Hui -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Abstract: As metaphor is more of a cognitive phenomenon than of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human thinking is founded on metaphors. Virtually, metaphor is the main means for people to apprehend the world. Integral to human's cognition of nature, metaphors abound in human language. The typical metaphors of nature in language are nature as a human, nature as a book written by God, nature as a machine (including its variants: nature as a storehouse and the Earth as a heat engine), nature as Mother and nature as a web. These metaphors can reveal the human - nature relationship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human's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offering the important inspiration that metaphors can influence and adjust human's ecological awareness, so linguistic researcher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devise new metaphors to reveal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o help cultivate human's ecological awareness.

Key words: metaphors of nature; human - nature relationship; inspiration; ecological awareness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利用和经济的无序膨胀,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全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许多生物物种濒临灭绝;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温室气体效应,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因此,如何保护环境是21世纪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头等重大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分别从各自不

同的领域积极寻找各种途径以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促使语言研究者对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从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其目标是探讨语言在调整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在生态破坏或生态协调中所起的作用^[1]。本文在隐喻理论(metaphor theory)的基础上,探讨语言中常见的有关自然的隐喻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以揭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并促进人们生

收稿日期:2012-10-23

基金项目:2012年度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代汉语语篇的生态批评语言学研究”(SK2012B286)资助

作者简介:王惠萍(1971-),女,安徽潜山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

态意识的培养。

一、隐喻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人类的思维就是建构在隐喻之上。“隐喻渗透于日常生活,不但渗透在语言里,也渗透在思维和活动中。我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在本质上基本上是隐喻的”^{[2]3},其“实质是运用另一事物来理解或体验某一事物”^{[2]5}。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认为经验在语言理解中非常重要,他们认为人类的经验源于人的身体、情感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用已知的或熟悉的事物的特征来感知、理解未知的、陌生的事物,这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即隐喻式的思维方式。隐喻思维方式与其他感知方式一样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2]3-6}。可以说,隐喻是人们认知、思维、语言及行为的基础,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途径;语言中的隐喻实际上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与工具,反映了人类大脑认知世界的方式。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离不开隐喻;人类语言中也不乏关于自然的隐喻。我们通过语言中的自然之隐喻可以发现人类认识自然的方式,并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二、自然之隐喻与人类——自然关系

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由来已久,人类为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并形成了不同的隐喻,这些隐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一) 自然是人

在蒙昧混沌之初,原始人的思维活动是典型的“身体化活动”,即人首先把人自身作为衡量周围世界事物的标准,通过自己的身体认识世界^[3]。正如米尔斯(Mills)所言:“人们只有了解自己才能了解世界;要改变世界就要改变自己。”^{[4]94}。

1. 人的状态、特征或者行为是一个地方的状态、特征,如:

bare 赤裸的;土地等寸草不生的。

gaunt (人因生病、焦虑等)瘦削的,憔悴的;(建筑物)非常不起眼的,难看的。

sterile 不能生育的;(土地)贫瘠的,不长植物的。

virgin 处女的,纯洁的;(土地、森林)原始的,未使用的。

sleepy 欲睡的,困乏的;(某个地方)寂静的;死气沉沉的。

dead 死亡的,去世的;(地方)死气沉沉的
sprawl (懒洋洋地)伸开手脚躺着;(建筑群或市镇)杂乱地延伸,扩展。

placid 平和的,温和的;(地方)宁静的,平静的。

treacherous (人)背信弃义的;(海洋等)暗藏危险的。

hospitable 好客的,热情友好的;(气候、环境等)有利的,适宜的。

friendly 友好的;environment - friendly 环境无害的;ozone - friendly 不破坏臭氧层的,等等。

2. 人类身体的部位是地球的某些部分或者地貌,如:arm/neck/tongue of land (狭长地段),backbone (脊椎、分水岭),bowels of the earth (地球深处),the brow of hill (小山的上部),crest/crown of hill (山顶),face of the earth (地面),foot of a mountain (山脚),finger of land (狭长地段),mouth of a cave/hole/river (洞口、河口),shoulder of a hill (山肩),heart of a city (城市中心),等等。

3. 对人的身体实施行为就是对乡村、地貌实施行为,如:comb the countryside (在乡村四处搜寻),dominate (建筑物,大山等俯视,高耸于),lie (城镇、村庄等坐落于),the rape (对环境的突然且不必要的破坏),等等。

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身体与自然的这种亲密关系进一步系统化,并且形成连贯的框架^{[4]94}。隐喻“自然是人”意味着地球如同人类一样也会变老,因此,地球表面便是地球的脸,可以从光滑变成满脸皱纹;地球象植物一样从种子萌芽、成长到最后成熟;地球有自己的循环系统静脉。这个隐喻解释了高山上为什么有温泉、火山活动等令人困惑的现象;告诉人们地球可以被治愈、改善;自然象人一样有生命、意愿和自己的创造力。因此,自然是不能被完全预测或控制的,人类没有权利实行对自然的完全控制。在这个隐喻之下,我们的义务是尊重自然的自主性(autonomy)。如果我们不尊重自然,自然就会毫不犹豫地以不友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

(二) 自然是上帝写的书

在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面对大自然强大力量,人类显得极其弱小,很多时候甚至是无能为力。因此,人类对自然表现为敬畏和被动服从,自然被看作是上帝写的书。隐喻“自然是上帝写的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假设其作者是神圣的。自然如同《圣经》给人类以指示,人类主要的任务是发现书中每个符号的意义,而不是对之进行改写或改进。因此,人类只能被动地理解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该隐喻另一个中心思想是《圣经》与自

然之书都是为人类书写的:《圣经》为人类提供精神上的救赎,自然救治人类的身体。

(三)自然是机器

从启蒙运动时期起,世界被看作是机器:首先是时钟,然后是蒸汽机,再到后来是计算机。因为机器由部分构成,人类为了超越现有生活的限制,可以发明、改良、操纵机器。机器为制造并操纵它的人服务。不能受制于人类的机器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是危险的。机器总是按照人类大脑预先设想的某个目的来制造的,如完成任务、生产产品、提供娱乐等等。因此,人类控制、改造、甚至破坏自然都是合法的。把自然看作机器意味着自然是可预测的,但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愿望来操纵并控制自然。我们甚至声称控制自然是我们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人类大规模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掠夺和攫取,从自然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财富,自然界成了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该隐喻有两个主要的变体形式(variants):

1. 自然是仓库。该隐喻作为机器隐喻的变体形式出现于工业时代。仓库是人们用来囤积原料供人类享用的。现代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自然是“为人类创造发明提供原材料的仓库”^{[5]6}。这也就是说,自然里有丰富的原料,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作为自然仓库的主人可以自由享用并完全控制自然资源。

2. 地球是热力发动机。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热力学(thermodynamics)的产生与发展,地球被描述为热力发动机(heat engine),这是机器隐喻的另一变体形式。热力学的熵量增加原理(the principle of entropy increment)规定,在一切自然现象中,各种系统都不断地趋于平衡、无序和对称;熵的总量只能永远增加而不能减少。因此,由于熵的总量不断增加,地球作为热力机的最后结果是地球死亡,地球上的生命也只是“熵的短暂停留(momentary stay of entropy)”^{[5]6}。

总之,把自然比作机器表明人们认为地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而是一部威力无比的巨大机器,人类可以对之进行前所未有的操纵与控制。随着工业时代及其工厂系统的发展与进步,机器隐喻及其变体形式在西方社会思想中也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征服和统治自然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

(四)自然是母亲

我们经常听到地球母亲(Mother Earth)这样的表达,如:你不能愚弄地球母亲(You can not fool Mother Earth),地球母亲知道最好的(Mother Earth

knows best),等等。实际上,人类在史前时期就用神话传说故事来认识他们的起源、现实世界及其未来。隐喻“自然是母亲”可以追溯到创世传说故事中。奥林匹亚创世传说(The Olympian creation myth)写道: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Mother Earth emerged from Chaos and bore her son Uranus as she slept. Gazing down fondly at her from the mountains, he showered fertile rain up her secret clefts, and she bore grass, flowers, and trees, with the beasts and birds proper to each. This same rain made the rivers flow and filled the hollow places with water, so that lakes and seas came into being.”^{[5]7}(在万物之初地球母亲源于混沌之中,睡眠时生下儿子乌拉诺斯神。儿子在山上俯瞰着地球母亲,遂降下甘霖洒在地球裂缝上。地球上便有了花儿、草儿和树儿,还有猛兽和小鸟。这场甘霖还使得河流流动,湖泊和大海得以形成。)

由此,地球是活生生的和仁慈的,给予万物以生命,犹如人类母亲的慈爱并且孕育生命。因此,地球是母亲。美国作家福克纳(Faulkner)的小说《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的主人公艾克(Ike)父母早丧,就把大自然当作母亲:“大自然母亲那些不会死亡的古老的无法追忆的阶段,她使他几乎变为一个成年人,如果真的有谁使他成长的话”^{[6]7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科学的发展,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对象的思想变得日益突出,其作为人类母亲的形象则变得越来越模糊,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但到20世纪六十年代,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提出人类活动造成环境灾害的严重性^{[7]ii}。人类也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James E. Lovelock)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盖亚假说。该假说认为,地球是活着的,地球不仅容纳了千百万种生命有机体,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地球上的大气、海洋、地表岩层和所有生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生命有机体,正是这个有机体的整体功能使地球成为生命存在之地,所以地球上的生命要依赖于地球的存在而生存,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是一个整体,并且相互联系^{[8]282}。从盖亚的角度看,剥削利用自然资源是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威胁。该假说是以希腊大地女神盖亚(Gaia)的名字来命名的,又强调地球上的生

命要依赖于地球的存在而生存,正如孩子的生命要依赖于母亲,这意味着隐喻“自然是母亲”重新回到人们心中。

在全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该隐喻的重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人类通过该隐喻不仅将地球拟人化,重新赋予自然以生命,还鼓励人类要尊敬地球上万物的生命,甚至包括地球本身。这意味着地球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一台供人随意操纵的机器,因而地球有其内在固有的价值,人类不应该对之采取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态度。

(五)自然是网

该隐喻指地球上所有生物相互依赖,所以我们不能把地球看作是一个存放商品的仓库;地球上的生命是相互联系的网,不是一个等级体系。因此,我们人类不能与自然分离,更不能站在自然之上。该隐喻认为生物圈所有有机体和实体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有平等的权利去生存、开花,即以生物为中心的平等。该隐喻还表明地球上所有生物,无论是女人、男人还是其他生命形式,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即共生和相互帮助。该隐喻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最高阶段、也是最终阶段。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之隐喻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人类——自然关系的变化:在蒙昧之初乃至农业时代,由于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人对自然怀着敬畏之情,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伙伴关系;但到工业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人类——自然关系变成人类极力想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甚至要战胜自然;到20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开始意识到自然不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机器,地球是活的,地球上的万物相互依赖,人类——自然关系应是和谐共生。

三、启示

隐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建构现实,构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9]。不仅如此,隐喻还可以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破坏我们已被普遍接受的范畴,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因而具有重构人们意识形态(ideology)的作用^{[8][13]}。因此,隐喻影响我们的思维和实践。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及对其采取的行动深受隐喻的影响,如在机器隐喻及其变体的影响之下,人类对自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与掠夺,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在隐喻“自然是母亲”的影

响下,矿物被看作是地球母亲的子宫里孕育成熟的,随意采矿是一种违背地球神圣性的行为,因此许多地方的矿工在采矿前要举行严格的采矿仪式^{[6][7]}。由此,我们认为,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之所以遭到严重破坏,隐喻,尤其是隐喻“自然是机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隐喻“自然是母亲”和“自然是网”又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地球是活着的,人类与地球上的万物应该和谐共生。因此,隐喻可以促使我们破坏自然,也可以促进我们保护自然。这也就是说,隐喻可以影响并调整人类的生态意识。

韩礼德(Halliday)1990年在第10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的主题发言中指出,语言具有塑造我们意识的威力^[10]。舒尔茨(Schultz)认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有可能使我们赢得未来,也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未来;人类通过语言保护环境是一个有效的方式^[11]。因此,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并有义务设计新的隐喻,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促进人们生态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 [1] 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110-115.
- [2]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9-50.
- [4] Harre R, Brockmeier J & Muhlhausler P. *Greenspeak: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9.
- [5] Verhagen, Frans C. World views and metaphors in the human - nature relationship: An ecolinguistic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ages [J]. *Language & Ecology*, 2008 (3): 1-15.
- [6] 龙娟. 自然与女性之英语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71-74.
- [7]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62: i-iii.
- [8] Goatly, Andrew. *Crit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roductory coursebook*.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9]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169-199.
- [10]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6): 7-36.
- [11] Schultz, Beth. Languag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 In Fill A. & Muhlhausler P. *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109-114.

[责任编辑:吴晓红]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学生议论文中 含 Out 短语动词使用研究

徐 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含 out 短语动词一直以来在中国大学生议论文写作中以高频率出现,因其意义复杂,词义不透明,成为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过程的难点之一。以 carry out 等短语动词为例,通过对比学习者语料库 WECCL 和英语本族语语料库 LOCNESS,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揭示了中国大学生议论文中含 out 短语动词在使用频率,搭配,语义等方面的特征和差异。并阐述了特征和差异生成的原因以及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基于语料库;含 out 短语动词;中介语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65-07

A corpus – based study on out – formed phrasal verbs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rgumentative writings

XU P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Phrasal verbs (PVs), composed of a verb and an adverb particle or a preposition, are widely used in oral as well as written English.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 is reckoned a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oints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master due to its multiplicity of meaning and semantic opaqueness.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phrasal verb of “carry out”,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contrasts data collected from WECCL, the learner corpus, with that from LOCNESS, the reference corpus, to reveal the major disparity in the use of out – formed PVs, in terms of occurrence frequency, collocation, meanings and etc. Moreover, the causes of and teaching revelations from the disparities in the finding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corpus – based; out – formed phrasal verbs; contrastive inter – language analysis

在英语学习中,动词加上介词或副词等小品词构成的短语动词被广泛应用于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中。这类动词语法结构固定,意义灵活,在英语中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词汇领域,但这却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难点之一。难度主要在于作为由动词加小品词或介词构成的短语,其意义分为字面型和引申型,字面型的意义可以根据字面意思推测,而引申意义短语动词由于小品词或介词的介入,导致意义上的变化,从而使学习者认知记

忆方面的负担增加,使用时错误突出。

一、相关研究与概念

(一) 国外对短语动词的研究

Quirk 等从结构主义视角,在多词动词 (multi – word verb) 的框架下分析了短语动词,对多词动词做了详尽的分类和阐述^{[1]150}。Bolinger 从语义方面考查短语动词,研究了有连接性的短语动词。且认为,是不是短语动词是由它的“度”来决定的^{[2]6}。

收稿日期:2012 – 11 – 14

作者简介:徐鹏(1982 –),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二语习得。

同时他也研究了小品词的语义特征,认为“小品词的核心意义蕴含了两层意义,一个是动作意义,另一个是结果意义”^{[2]185}。Lindner 是第一个从认知角度分析短语动词的,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含有 up 或 out 的短语动词上^[3]。受到 Lindner 的影响, Morgan^[4]也试图从更深层次的隐喻角度分析 Lindner 的文章。但他们的研究均停留在认知层面。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语料库对短语动词进行了研究。Akkerman^[5]用布朗语料库做出的研究揭示出最常用的动词加小品词搭配,以及动词后小品词的顺序如何决定短语动词的意义。就短语动词定义而言,《柯林斯短语动词词典》指出:动词和副词小品词或者介词小品词的组合作为短语动词^[6]。《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认为:由一个动词后接副词小品词构成的多词动词称为短语动词,且该小品词含有核心方位意义,且常用于引申义^[7]。学界一直以来对短语动词的界定持有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1) 动词和介词的组合是否应归为短语动词;2) 短语动词的词义是否必须为引申义,而非简单的词义叠加。本研究基于语料库数据检索,试图最大限度了解含 out 短语动词使用情况,因而采用了 Jack Richards et al 的最具有包容性的定义:既包含动词和介词的组合,词义也不局限于引申义^[8]。

(二) 国内外对含 out 短语动词的研究

作为短语动词构词常用的小品词 out,其意义更加难以掌握,其研究更具有代表性。而国内外关于含小品词 out 构成的短语动词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已有研究主要从认知隐喻的角度加以剖析,重心置于 out 的意象图示上。何学德,蒋橹^[9]沿用 Lindner 对 out 的意向图示的分类,分析了带 out 的一系列动词短语。林芸,雷卿^[10]也是通过认知语言学的容器观,分析了 out 构成的短语动词的认知理据。徐丹^[11]基于一定的语料基础,在认知理论的框架下,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将词频与语义联系起来得出相关性的结论,并阐明了各种 out 短语的语义分布上的特点。然而,对含 out 构成的短语动词基于语料库的中介语对比分析的研究几乎没有。

(三) 中介语对比分析

中介语对比分析(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 CIA)是“在可比情况下对本族语和非本族语使用者的语言使用的对比与比较”^{[12]143}。Granger 把基于学习者语料库所进行的中介语分析称为中介语对比分析^[13]。“中介语对比分析法利

用目标语和学习者两个语料库,除了从目标语语料库中获取典型的语言信息,通过对学习者语料库与目标语语料库的比较,能较系统地发现学习者中介语的非母语特性,即偏离,包括误用、多用、少用和回避等。”^{[14]228} Biber^[7]依据《朗文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研究发现:最常见的短语动词搭配小品词依次为 up, out, on, in, off, down。而笔者曾通过 LOCNESS 语料库检索,发现在所有的 v. + particle 结构的短语动词当中, out 构成的短语动词最为常见,位居第一。因此在中国大学生笔语中, v. + out 结构的短语动词研究也不容忽视。

二、研究设计

(一) 本研究力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 (1) 和本族语大学生议论文相比,中国大学生议论文中含 out 的短语动词频率分布总体特征如何?
- (2) 过用和少用的短语动词在搭配和语义方面分别有什么特点,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是什么?
- (3) 这些发现对教学有什么启示?

(二) 语料库介绍

Sinclair 认为,学习者语料库是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不同的设计标准而收集的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外语或二语原始的语言文本。本研究中选取了两个语料库 WECCL, LOCNESS,分别作为学习者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鉴于研究需要,我们从 WECCL 中建立一个议论文子库。该子库覆盖 26 个作文话题,共计 4 680 篇文章,1 207 968 词次。作者大都为一至四年级英语专业学生,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作文的质量与本族语者有可比性。LOCNESS 语料库作为国际学习者语料库建设项目下的一个参照库子项目,由比利时卢汶大学语言学中心的 Sylviane Granger 主持开发,汇集了 436 篇美国和英国大学生议论文,共计 324 304 个词次,涵盖了涉及交通,政治,狩猎,电脑等 100 多个话题。我们摘取其中部分建成一个含有 209 783 词次的英美大学生纯议论文语料库作为参照用。

(三) 研究步骤

本研究采用 Granger (1998) 所倡导的中介语对比分析(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方法,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大步骤:

1. 以 WECCL 生语料库和 LOCNESS 生语料库为源语料库,分别转换获得三个衍生语料库: WECCL 原型语料库, WECCL 附码语料库, WECCL

原型附码语料库, LOCNESS 原型语料库, LOCNESS 附码语料库, LOCNESS 原型附码语料库。这六个语料库将会用于不同的目的。

2. 使用语料库检索工具 Antconc, 从 WECCL 原型附码语料库和 LOCNESS 原型附码语料库分别检索所有的含 out 的短语动词, 选取两库前十位的短语动词进行比较。以参照语料库为对照, 揭示中国大学生议论文中含 out 短语动词的频率分布及语义分布特征。

3. 选取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短语从搭配, 语义分布两大方面进行跨库深度分析, 比较其与英, 美国大学生的使用差异。

三、结果与讨论

(一) 中国大学生议论文中含 out 短语动词使

表1 各语料库频数最高的前十位含 out 的短语动词(频数统计包含 v. + ... + out 形式)

WECCL 语料库 (1,207,968 词次)			LOCNESS 语料库 (209,783 词次)		
短语动词	义项	频数	短语动词	义项	频数
go out	6	113	carry out	2	28
move out	2	89	point out	3	18
find out	4	83	find out	4	17
carry out	2	62	go out	6	14
come out	11	57	get out	7	11
point out	3	41	take out	14	8
get out	7	39	bring out	9	7
live out	2	38	come out	11	6
turn out	7	38	run out	8	6
speak out	*	32	turn out	12	5

表1, 表2 显示, WECCL 中最常用的含 out 的短语动词频率由高到低依次分别为 go out, move out, find out, carry out 等词, 而 LOCNESS 库中最常用的短语动词却分别为 carry out, point out, find out, go out 等。在两表前十位共计 13 个短语中, 有六个使用频数表现出极强的差异性 ($p < 0.01$), 按显著性由高到低分别为: carry out, move out, point out, bring out, live out, run out, 而其中 carry out, point out, move out 尤为显著, $p < = 0.001$ 。其余七个尽管存在差异却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就六个显著性差异的短语而言, 中国学生在 live

用总体频率特征

通过 Antconc 软件, 获取两库中所有含有 out 的短语动词列表。考虑到两库规模上差异悬殊, 单纯比较短语动词的词形词次频数意义不大, 且 WECCL 库中含有大量凭空臆造、低频率、无效的干扰短语搭配, 如: say out, widen out 等。为确保较高可比度, 本文选择两库分列前十位的含 out 的短语动词进行对比, 共涉及 13 个短语动词。鉴于两库的规模差异, 单纯的频数比较必须配合卡方检验方能揭示两库短语频数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为了解各短语动词的使用深度和广度, 本文利用 WordNet 词典, 分列出每个短语动词所涵盖的义项数(见表1, 表2)。

out 和 move out 上存在过用, 而在其他四个短语上存在明显的少用。这与之前 Liao & Fukuya (2004)^[15] 研究得出中国中级水平英语学习者倾向于避免使用短语动词这一结论基本一致(见表3)。

表2 各语料库频数最高的前三位含 out 的短语动词卡方检验值比较

短语动词	WECCL 库频数	LOCNESS 库频数	卡方值	显著性 (p 值)	
go out	113	14	1.434 3	0.231	+
move out	89	2	11.458 3	0.001 ***	+
find out	83	17	0.385 0	0.535	-
carry out	62	28	19.001 0	0.000 ***	-
come out	57	6	1.389 5	0.238	+
point out	41	18	11.552 7	0.001 ***	-
get out	39	11	2.057 8	0.151	-
live out	38	0	6.599 5	0.010 *	+
turn out	38	5	0.342 5	0.558	+
speak out	32	4	0.387 9	0.533	+
take out	23	8	2.980 5	0.084	-
bring out	9	7	10.638 7	0.001 **	-
run out	11	6	5.665 2	0.017 *	-

(二) 过用的含 out 短语动词

中国学生对 move out 和 live out 的过用难以理解, 因为此两列短语在本族语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较低。在 LOCNESS 中, live out 的出现频率仅为

零,且这两则短语在语义范围狭窄,均只有两个义项。通过使用 Antconc 检索功能,从 WECCL 原型语料库中检索出所有的含有 move out 的句子,随机抽选 15 条仔细观察,发现句子几乎均与校园生活主题紧密相关,最强搭配名词系 student, college, reason, dormitory。例句如下:

(1) ...then it be the time to move out of dormitory and strive for the ideal ...

(2) ...after graduation, I think it be not necessary to move out because they already ...

(3) ...second home, more and more have the tendency to move o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really attractive ...

(4) ... to settle down in dormitory. I think I won't move out of my dorm even the dorm be uneasy for me to lie ...

(5) ..., that be one of the reason that college student move out there ...

表3 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议论文中
过用及少用含 out 短语动词

过用		少用	
move out	2 义项	carry out	2 义项
live out	2 义项	point out	3 义项
		bring out	9 义项
		run out	8 义项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生的 move out 被置于校园生活的语境下使用。且在整个 WECCL 语料库 1 207 908 词次中,有 419 篇文章 147 245 词次(占文本规模 12.19%)的内容是关于同一个话题:大学生在校外租房。而 move out 作为该主题不可避免的短语而被学生高频率使用。相似的 live out 也符合这一解释。此处 live out 指“在外居住”,实则等同于 live outside,与 move out 一样,其最强搭配词分别为 campus, student, school, rent 等校园主题的词汇。而 Antconc 的词簇功能显示,在 38 例 live out 的结构中,有 23 例是以 live out of 的形式存在。严格来说, live out of 中 live out 只是作为“自由组合”(free combination),所取均为字面意义。live out 作为短语动词有两层引申涵义:a. “实现(梦想)”,如 live out one's fantasy; b. “住完一段时间”,如 live out one's life。而中国学生的使用均未涉及到这两涵义。

语料库显示在过用短语使用上主要呈现的特征为:语义狭窄,深度不够。尽管这些短语动词在绝对频数上呈现出过用,但实质原因为命题内容偏颇导致,属于样本取样失误。短语在使用深度上有所欠缺,短语使用义项集中化,往往只局限于某一种义项被高频率大范围使用,而该短语其它义项则无所触及。通常被中国学生熟练掌握的为短语的字面含义,可以由动词和小品词的意思直接判定。出现这一现象与学生的短语习得规律有关。张晶^[16]研究表明短语动词透明度是造成学生短语习得的困难的主要因素。这一结论可以解释中国学生过用短语动词的字面义项。

(三)少用的含 out 短语动词

根据表 2 显示,中国学生在四个短语上存在少用倾向,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差异。其中 carry out 在使用上呈现的显著性最强, $p < 0.001$ 。由于篇幅限制,且考虑 carry out 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仅选取该短语做深度分析。从搭配,语义等方面考查其特征。

1. 搭配特征。搭配研究可以反映学生使用短语的偏好。Firth 最早提出搭配的概念,指出“通过一个词的共现词来认识一个词”^{[17][179]}。随后引发大批语言学家对搭配现象的研究,包括 Halliday^[18], Kjellmer^[19] 等人。各语言学家对搭配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两派:1). “频数观”认为搭配即为一定跨距内词汇较高频率的共现,代表人物为 J. R. Firth, M. A. K. Halliday, John Sinclair 等。2). “短语观”主要受俄国短语学影响,以 A. P. Cowie 为代表,认为搭配是一种词的组合,虽不完全,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定的组合。由此可以看出两者观点差异,频数观不强调词与词之间内核关系,只以频数量化其共现,而短语观强调词与词之间的有机结合,突出其内在结合的稳定关系。本文为了考查词汇的共现,语境,遂采用 John Sinclair 的定义,将搭配定义为“在文本中一个较短的跨度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共现”,此定义中“较短的跨度内”一般指定为左右四或五词距之内^{[20][170]}。

为了研究 carry out 所处的语义环境,借助于 Collocator1.0 软件,本文选取两库中与 carry out 搭配最强实义词进行比较。由于兼顾绝对频数,本文选择 T 值衡量搭配强度。则获得的搭配最强的 20 个实义词如表 4 所示。

表4 各语料库中 carry out 搭配强度最强前二十个实义词

WECCL 库	频数	T 值	LOCNESS 库	频数	T 值
government	11	3.172 2	check	4	1.989 4
plan	9	2.983 1	plan	2	1.381 2
policy	7	2.623 2	treatment	2	1.352 9
education	10	2.197 3	industry	2	1.346 7
should	10	2.127 1	research	2	1.340 4
reform	3	1.720 5	order	2	1.334 9
talent	3	1.685	human	2	1.165 2
law	3	1.672 2	cross - breeding	1	0.998 9
activity	3	1.638 2	camp	1	0.997 8
university	6	1.587 5	heinous	1	0.996 7
must	4	1.516 2	commerce	1	0.995 6
opening	2	1.407 9	correctly	1	0.994 4
strict	2	1.397 6	extensively	1	0.994 4
successfully	2	1.3925	brutal	1	0.99
educational	2	1.385 8	operation	1	0.99
search v.	2	1.376 8	currently	1	0.988 9
research	2	1.375 3	lazy	1	0.986 9
open	2	1.353 6	duty	1	0.986 7
first conj.	3	1.329 5	scheme	1	0.985 6
measure	2	1.3099	trade	1	0.984 4

表4显示中国学生使用 carry out 的搭配上有以下偏好:

1) 从词性上来看,两库前20位的搭配主要由名词构成,且形容词和副词搭配在频数上差别不大。而情态动词,中国学生却存在着用过倾向。在WECCL库中 should 与 must 两搭配词与 carry out 的T值搭配强度分别高达2.127 1和1.516 2,而本族语语料库LOCNESS中,carry out 前20位搭配词中并未出现情态动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外语学习者更倾向于将 carry out 与 should, must 连用,带有“职责”,“义务”的语义倾向。

表5 各库 carry out 搭配形容词

WECCL	opening, strict, educational, new, illegitimate, separate, quality - oriented, dull, efficient, powerful, faster, academic, special, healthy, different, appropriate, easy, convenient, life - long, old, enough, important, many
LOCNESS	heinous, extensive, brutal, lazy, lower, biological, simple, criminal, high, long, many

2. 语义分布特征。为了考查 carry out 在两库中的语义使用上的区别,本文检索出其在两库中所有宾语,进而考查 carry out 的词义使用(见表6)。根据

2) carry out 作为一个短语动词,其搭配的名词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依然根据表4,两库中 carry out 搭配的名词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语义倾向。WECCL 库中出现搭配强度很高的名词有 government (T=3.172 2), plan (T=2.983 1), policy (T=2.623 2), education (T=2.197 3), reform (T=1.720 5) 等,这些词同属一个语义场,集中表现浓厚的“政府执行”,“社会管理”,“政策性”等政治性语义倾向。这一点与之前使用 should, must 情态动词表示“职责”,“义务”的语义倾向相吻合。而英语本族语中搭配名词中却未呈现出该语义偏好,搭配词未集中表现出某一特定语义场。词汇分布范围广泛均匀,涉及人文,商业,医学等,且大部分搭配名词为一些通用词汇,如 check, plan, treatment 等。

3) 尽管搭配形容词在频数上差别不大,但两库在搭配形容词的语义韵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依据表4,前二十位搭配词中,WECCL 库中出现四个形容词分别为: opening, strict, successful, educational; LOCNESS 中为 heinous, brutal, lazy 三个均带有较强贬义色彩的形容词。carry out 有伴随消极的语义环境出现的倾向。鉴于三个形容词难以概括全貌,本文遂检索两库中 carry out 左右跨度为5内全部搭配形容词进行考查以证明这一猜测。考查结果表明:在LOCNESS本族语语料库中,carry out 搭配的形容词大多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或者贬义色彩,例如 heinous, brutal, lazy, criminal 等带有很强的贬义。除此之外是一些中性色彩的形容词如 extensive, biological, high, long 等。鲜有明显积极色彩的或褒义形容词。而中国学生使用的语义韵特征却极其不同,WECCL 库中 carry out 主要搭配褒义,积极色彩的形容词和中性词,如 new, efficient, powerful 等等。大体基调是积极向上的,消极贬义的词汇只有 illegitimate, dull, old 等寥寥无几(见表5)。可以表明中国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并未意识到 carry out 的适用语义色彩和语境。

WorldNet 词典的描述,carry out 主要有两层词义:

- 1) put in effect 实施
- 2) pursue to a conclusion or bring to a successful

issue. COMPLETE, ACCOMPLISH 完成

表6 各库 carry out 宾语及义项分布

WECCL	频数	词义	LOCNESS	频数	词义
plan	10	1)	action	4	2)
policy	10	1)	check	3	2)
education	8	2)	treatment	2	2)
activity	3	2)	commerce	1	2)
law	3	1)	exchange	1	2)
idea	2	1)	operation	1	2)
measure	2	2)	penalty	1	2)
reform	2	2)	policy	1	1)
regulation	2	1)	punishment	1	2)
research	2	2)	practice	1	2)
task	2	2)	pregnancy	1	2)
amendment	1	*	research	1	2)
competition	1	*	scheme	1	1)
conversation	1	2)	sport	1	2)
duty	1	1)	study	1	2)
function	1	2)	task	1	2)
mechanism	1	*	test	1	2)
method	1	1)	transplant	1	2)
picture	1	*	trade	1	2)
privilege	1	*	work	1	2)
project	1	2)	wish	1	1)
reason	1	*			
revolution	1	*			
right	1	*			
skill	1	*			
system	1	2)			
way	1	*			
work	1	2)			
共计	63		共计	27	

从表6可以看出,中国学生语料库中 carry out 搭配的宾语式样丰富,大量系自我杜撰,在英语中不可接受(表中以*标示)。和之前结果一致,中国学生 carry out 的搭配宾语呈现出较强的政治执行性的语义倾向,且在 carry out 的词义使用分布上,carry out 的两条词义使用相对均衡;而在本族语语料库中,carry out 大部分情况下是被用作“完成”的含义使用。而“实施”的含义使用的少之又少。

3. 原因分析。中国学生在使用 carry out,在词义使用、搭配、语义倾向,语义韵上都和本族语使用者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特征在于:1) 过用其“实施,执行”义项,少用“完成”义项;2) carry out 带有很强的政治语义色彩。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短语使用上不具备相关意识,认为 carry out 的含义是“实施”,“完成”,受到母语负迁移影响,学生自然而然将 carry out 简单等同于汉语的“实施”。而汉

语中的“实施”具备很强的政治性语义倾向,常被使用在政府文件,法律法规,政策制定中。中国学生在使用 carry out 时继承了这一语义倾向和相关搭配。由此还可以解释中国学生生产出的无效搭配,如 carry out privilege (实施优惠)。而至于词义2)“完成”,中国学生则会选择使用单词替代词,如 complete, accomplish, finish 等。如 Liao & Fukuya^[16] 的结论表明中国学生中级英语学习者倾向于避免使用短语动词而改用单动词。也可以部分说明和本族语语料库相比,中国学生为何 carry out 在频数上显著性少用,而在词义分布上“实施”的义项相对过用。

教学方面,教师在教授短语动词时,未能及时全面提供整个短语动词的使用特征。就 carry out 而言,在教学过程中,义项1)“put into effect”被强化,而义项2)“complete”被弱化。有甚之,教师自身也不了解这般义项使用分布。更不用说搭配、语义倾向、语义韵等只有在大规模语料中才能显现的“隐藏”特征。此外,由于时间条件的限制,课堂上教师也未能提供足够、地道有效的例句来佐证。究其深层次原因,中国教师通常将英语教学简单分拆为语法和词汇,在教学中分而教之。正是这种二分法导致当下短语教学脱离语境,缺少搭配、语义倾向等意识的培养。同时,中国作为缺少英语全语境环境的国家,学生很难接触到大量的自然语言输入,也是导致学生无法习得搭配意识又一重要因素。

四、对教学的启示

针对以上问题和成因,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培养相关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需要树立“词汇语法”意识,防止割裂语法和词汇之间的有机联系。Sinclair 指出:“考虑词汇和句法之间的相关性比将二者孤立地对待更有效”^{[20]104}。要扭转教师在教学上词汇语法二分法的错误观念。同时加强培养学生对短语动词的搭配意识,指出短语动词的语义倾向,语义韵特征,防止学生过度概括,产生离奇的搭配。

2. 减少母语迁移影响。母语迁移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二语学习中,应尽量排除母语干扰,选择目标语或双语解释,避免直接将 carry out 直接等同于“实施”的现象发生。

3. 加强语料库在英语教学方面的运用。语言教学的实质就是教会学习者如何在真实的情景下使用地道的语言。通过使用语料库,向学生呈现大量纯正,有效地自然语言输入,进而帮助学生挖掘出隐藏

在大规模语料中的深层次语言特征。鼓励学生通过网络使用 BNC, BROWN 等通用语料库以及各种专业语料库,以满足自己不同的学习需求。由语料库的问世带来的数据驱动学习法(Data Driven Learning)——学生通过计算机生成的语言共现结果,自己分析语言范式的特征和规则——也被认为是在中国这样的缺少纯正英语输入环境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补偿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学生的辨识能力较弱,面对海量的语言数据有可能不知所措,无法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因此这也需要教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从而保证学生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总之,语料库技术在外语教学上最大的优势就是从大规模共现语料数据中归纳出核心的范式结构,特征等。具体的运用如:辨析近义词;调查短语结构搭配模式;探讨意念的表达形式;发掘篇章语言特征模式;文学作品特征赏析;文体风格对比;利用语料库编写,检验教学大纲;编排设计教学内容等等^[21]。

五、结论与不足

以上短语动词的对比考查有力地揭露中国学生在短语动词使用上的特征和问题。中国大学生议论文中含 out 短语动词的使用依然受语义透明度约束,使用率较高的短语动词集中在 go out, move out, find out 等词义单一,语义透明的短语上,且偏好使用字面含义,使用深度上有所欠缺。与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在部分短语动词上存在着显著性的过用或少用。短语动词使用上缺乏搭配意识,语义倾向,语义韵运用不当,使语言缺乏地道性。而这些主要是由于母语迁移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学过程中的缺失造成的。这也恰恰是中国学生学习二语中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之一。

受条件限制,本研究只选择了少数几个含 out 短语动词进行研究,未能够覆盖全部;没有对短语动词的回避现象进行跟踪探讨;选取的只是议论文体之间的比较,没有与非议论文体作对比探究。这些问题将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Quirk,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85: 1150 - 1160.
- [2] Bollinger D. The Phrasal Verb in English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 [3] Lindner, Sue. A Lexico - Semantic Analysis of English Verb - Particle Constructions with UP and OUT [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 [4] Morgan P. Figuring out Figure out: Metaphor and the Semantics of the English Verb - particle Constric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7, 8 (4): 327 - 357.
- [5] Akkerman E. Verb and Particle Combinations: Particle Frequency Ratings and Idiomaticity [J]. ICAME News, 1984 (8): 60 - 70.
- [6] Collins COBLUID Dictionary of Phrasal Verbs [M]. London and Glasgow: Harper Collis, 1989.
- [7] Biber D,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 [8] Richards J C, et al.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9] 何学德, 蒋槽. 小品词 - OUT - 语义的认知语言学分析 [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5 (4): 46 - 49.
- [10] 林芸, 雷卿. 探寻英语中黏附 out 的短语动词的认知理据 [J]. 宜昌学院学报, 2007 (11): 92 - 93.
- [11] 徐丹. 带 out 短语动词的认知语义研究 [D]. 成都: 西华大学, 2009.
- [12] Pery Woodley M. Contrasting Discourses: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a Discourse Approach to Writing [J]. Language Teaching, 1990 (23): 143 - 151.
- [13] 俞燕明. 中介语对比分析法及其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J]. 山东外语教学, 2007 (5): 46 - 51.
- [14] Granger, Sylviane & Tribble, Chris. Learner Corpus Data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Form - focused instruction and data - driven Learning [M]. In Granger Sylvaine, eds. Learner English on Computer. London: Longman, 1998: 228.
- [15] Liao Y D & Fukuya Y J. Avoidance of phrasal verbs: The case of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J].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2002, 20, (2): 71 - 106.
- [16] 张晶. 中国学生英语短语动词习得困难探究 [D].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8.
- [17] Firth, John R.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 - 1951 [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57.
- [18] Halliday M A K. Lexical relations [A]. In Kress C, et, al.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Selected Paper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9] Kjellmer G. Aspects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A]. In Meijs W, et, al. Corpus Linguistics and Beyond [C]. Amsterdam: Rodopi, 1987.
- [20] 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1] 何安平. 语料库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吴晓红]

二语心理词汇联想测试中词频和词性效应的相关性研究

周谨平

(湖北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205)

摘要:以二语词汇联想测试中高频词和低频词刺激反应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词性和词频在二语心理词汇的构建特征。实验发现,不同类别的高低频刺激词确实能对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汇构建产生影响。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名词的语义反应最多,形容词和动词的非语义反应较多。

关键词:二语心理词汇;词汇联想测试;词性效应;词频效应

中图分类号:H3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72-04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word class effect and the word frequency effect in L2 mental lexicon word association test

ZHOU Jin - p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high frequency prompt words and low frequency prompt words as the main experimental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ord class effects in storing L2 mental lexicon organization patter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word class effect differs with the increase of L2 language proficiency: nouns increase most rapidly whereas verbs and adjectives increase the most slowly in their semantic associations.

Key words: L2 mental Lexicon; word association test; word class effect; word frequency effect

词汇联想测试是伴随着英语词汇联想教学而产生的一种词汇测试法。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词汇联想测试开始应用于心理学,用来评估儿童的认知发展、社会态度及同化。国外大多数关于心理词汇的论著都是以英语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一语心理词汇的问题。相比之下,国内现阶段有关二语心理词汇研究多见于使用词汇联想测试揭示二语心理词汇的表征及其提取模型的构建。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词汇联想测试能有效揭示二语心理词汇的结构特点,能从质和量两方面探讨心理词汇组织模式的发展规律。尽管大量有关二语心理词汇的实证研究业已表明语义的纵聚合和横组合联系在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汇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然而运用词汇联想测试来揭示二语学习者心理词汇

的组织形式,学界尚存在着不少争议,选择什么样的词作为刺激词就成了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因为不同类型的词具备不同的语义关系和联结特点。

一、实验设计

(一) 研究方法

1. 研究目的。本实验研究不同词性的高低频词是否对二语学习者产生影响。受试者对高频词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汇联想测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受试者对低频词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汇联想测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 受试对象。本研究以英语专业二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为测试对象。考虑到大二学生经过一年以上的专业英语学习,已初步掌握了相关的词汇学

收稿日期:2012-11-28

基金项目:2011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二语心理词汇语义网络构建激活的实证研究——基于英语专业学生阅读能力的调查”(2011jy1q058)资助

作者简介:周谨平(1978-),女,湖北武汉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教学法研究。

习策略。大三学生经过了专业四级的培训和考试之后,对于词汇的学习更加予以重视。本实验随机挑选了本校英语专业大二和大三年级共60名学生参加了测试,其中每个年级各30人。

3. 受试材料。本研究所选取的测试词来自《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该大纲中的词汇分为I至VI级,都是英语专业学生在基础阶段所要掌握的词汇。为确保测试词的熟悉度,本研究从III级到V级的词汇中随机选取了30个高频词和30个低频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各20个,任意排列)作为测试词。

4. 实验过程。本实验根据 Wolter (2001) 的定义,分别采用了高频和低频词条,要求受试每看到一个刺激词后,30秒内写出头脑中所出现的第一个英语单词。对比学习者的联想反应,把受试的反应词

主要分成四类:聚合型、组合型、语音型和无反应。

(二) 数据收集及分析

表1 高低频词描述统计量表

词类	高频词			低频词		
	数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数量	平均数	标准差
名词	10	34.116 7	4.088 39	10	33.133 3	7.167 41
动词	10	34.583 3	3.906 93	10	23.533 3	7.351 85
形容词	10	34.566 7	3.950 40	10	25.300 0	10.593 09

表1测试结果显示不同组别的受试者对测试中高低频各类词性的刺激词在反应均值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所选单词符合测试要求。随后,将高频词和低频词作为检验变量,年级设定为分组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进一步得到下面表2和表3的结果。

表2 高频词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词类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F	Sig.	t	df	Sig.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高频名词	假设方差相等	0.543	0.466	0.723	38	0.474	0.700 00	0.968 86	-1.261 35	2.661 35
	假设方差不相等			0.723	35.688	0.475	0.700 00	0.968 86	-1.265 53	2.665 53
高频动词	假设方差相等	0.568	0.456	0.212	38	0.833	0.200 00	0.943 12	-1.709 24	2.109 24
	假设方差不相等			0.212	37.041	0.833	0.200 00	0.943 12	-1.710 87	2.110 87
高频形容词	假设方差相等	0.276	0.602	-1.601	38	0.118	-1.700 00	1.062 15	-3.850 21	0.450 21
	假设方差不相等			-1.601	34.943	0.118	-1.700 00	1.062 15	-3.856 40	0.456 40

表3 高频词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词类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F	Sig.	t	df	Sig.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低频名词	假设方差相等	0.163	0.689	0.648	38	0.521	1.250 00	1.929 24	-2.655 55	5.155 55
	假设方差不相等			0.848	37.883	0.521	1.250 00	1.929 24	-2.655 94	5.155 94
低频动词	假设方差相等	0.207	0.652	-2.045	38	0.048	-3.250 00	1.589 23	-6.467 23	-0.032 77
	假设方差不相等			-2.045	37.656	0.048	-3.250 00	1.589 23	-6.468 20	-0.031 80
低频形容词	假设方差相等	1.103	0.300	-0.307	38	0.761	-0.750 00	2.444 84	-5.699 82	4.199 32
	假设方差不相等			-0.307	37.389	0.761	-0.750 00	2.444 84	-5.701 97	4.201 97

表2对比了高低水平组的高频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均值方程t检验结果。其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受试的不同年级学生在高频词测试中均无明显差异(双尾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0.474,0.833和0.118(Sig. 双侧>0.05))。这也印证了前人的相关研究,Morton (1969)^[1]词汇发生模型(the Logogen Model)认为词频是词汇认知中的一个重要变量,高频词认知的阈限低,容易被激活,检索起来也比较容易。Forster 的搜索模型(the autonomous search mod-

el) (1976) 则认为心理词典中词条是按词的频率排列的,高频词在前,低频词在后,所以高频词认知时间短。Gough (1984)^[2]等认为高频词则不需要通过语音中介,可以由视觉特征直接到达心理词典的词条,也就是说高频词认知快是因为它认知过程中的步骤较少,激活形式是整词激活,所需的加工时间较短。

表3对比了高低水平组的低频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均值方程t检验结果。整体而言,受试的不同年级学生在低频名词和形容词的测试中均无明显差异

(双尾 t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 0.521 和 0.761 (Sig. 双侧 >0.05)). 而在低频动词测试中表现出显著差异 (双尾 t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为 0.048 (Sig. 双侧 <0.05)). 张萍^[3]总结了近年来二语词汇联想测试相关研究,并证实了词性在二语联想反应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国内研究如张珊珊^[4]探讨了词性效应对词汇联想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名词会产生更多的聚合型反应,动词则易引发组合型反应。张萍对比了词性在一语和二语心理词库的构建特征,结果发现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名词的语义反应增加最快,形容词次之,动词的语义构建相对缓慢。陈士法^[5]等通过受试者对不同词性英语单词的反应时,发现就多词素词来

说存在着词性效应,心理词典的词性效应受词素数量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语义存储等比较复杂的表征中,与学习者的二语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上述研究均表明刺激词的不同类别确实能对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汇构建产生影响。但是,学习者对词汇的充分掌握绝不单单取决于对刺激词的不同类别的选择和识别,不同刺激词的词频效应也是单词认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那么,不同词性的刺激词在词频效应下随着学习者二语词汇水平的变化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为此,本研究对比了不同年级在不同词类的高/低频刺激词联想反应测试(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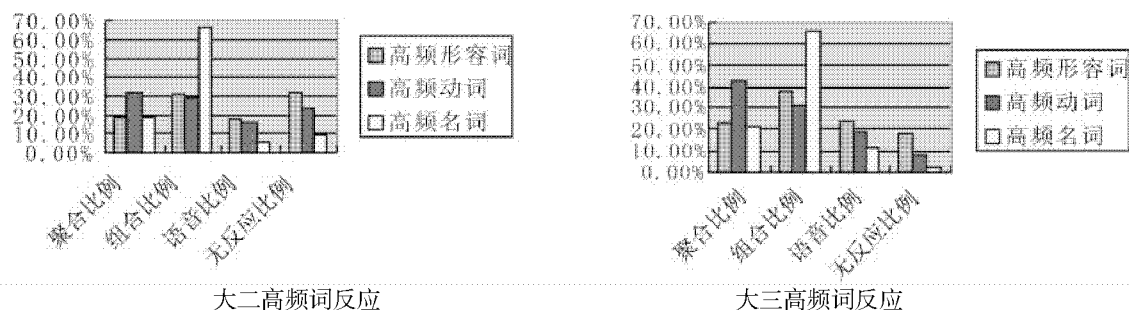


图1 高频词联想测试反应结果

图1对比了大二和大三不同水平组的高频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聚合反应、组合反应、语音反应以及无反应的结果。两个受试组均显著表现出大量的聚合反应和组合反应,语音反应和无反应的比例较低。语音反应和无反应的测试结果均为形容词最高,动词次之,名词最低。动词在两个水平组中激发的聚合反应均为最高,名词和形容词相差无几。名词在两个水平组诱发的组合反应都是最多的,动词和形容词相差无几。通过上述对比说明不同类别的高频词刺激都能诱发更多语义反应,非语义反应呈下降趋势。总的来说,高水平学习者产出更多的语义反应,更少的非语义反应,越熟悉的词越能激发更多的语义联系,语义

联系越强,对词汇的掌握越好。另外,不同水平组的聚合比例都低于组合比例,对于这一测试结果,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受试的学生往往过分依赖母语的语义网络来理解测试过程中的那些刺激词的词义,却忽视了刺激词的词性,以及相对应的语法功能。这说明英语专业学习者在其词汇学习中尚缺乏词频意识,高频词汇尚未成为英语专业词汇学习的重点。第二,传统教学模式负面影响仍然很大,教学形式单一。单调、匮乏的教学语言输入常常侧重于词与词之间的某种线性的修饰搭配关系或符合句法的常见搭配,词义和句意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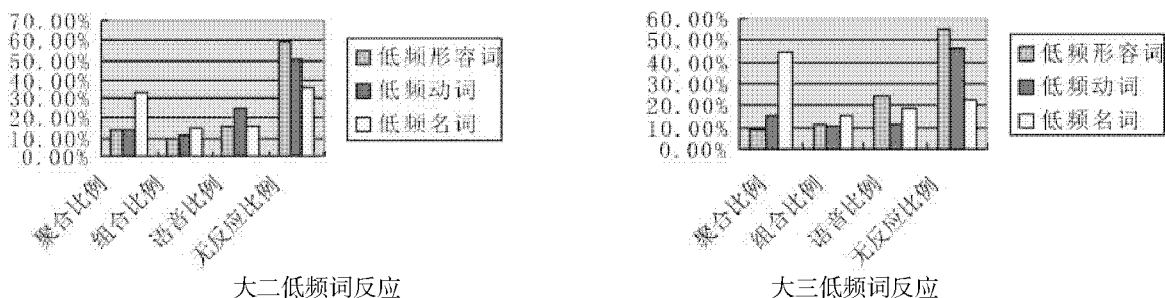


图2 低频词联想测试反应结果

图2对比了大二和大三不同水平组的低频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聚合反应、组合反应、语音反应以及无反应的结果。两个受试组均显著表现出大量的语音反应和无反应,这是因为低水平组受试遇到陌生词汇

无法做出联想反应亦是常事,但是对于高水平组,某些学习过的单词由于分布率低导致遗忘,以及词汇本身的难度可能使学习者在长时间得不到重复,就成为其大脑中的“似曾相识的陌生词”,因而也无法做出迅

速的语义联想,直接导致聚合反应和组合反应比例较低。无反应的测试结果均为形容词最高,动词次之,名词最低。名词在两个水平组诱发的聚合反应和组合反应都是最多的,动词和形容词相差无几。根据Reeves等人(1998)的总结,单词的频率、意象性、具体性、语义以及语法类别都是影响影响词汇习得和词汇结构的因素,这其中词的语法类别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各词类自身具有的不同特性,学习者习得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是以不同方式组织和储存在大脑中的,名词主要以相关的概念和意象图式为线索串联起来构成语义关系,形容词多以正反义、上下义等搭建层级网络,而动词多与共现搭配词形成语块或构成句法搭配关系。伴随着词频等级的降低,学习者的词汇识别能力逐渐减弱,在此过程中都会出现不精确、误猜等情况。此外,学习者已有的母语系统的存在和介入,使得这些低频词的认知阈限高,在心理词典中无法形成对应的整词表征,只能是相应的词素被激活,因而激活需要更多的信息,所需的加工时间较长。

二、结果与启示

本实验结果与张萍等人的研究结果部分类似。张萍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语词汇联想中词类不仅影响着二语心理词汇的语义/非语义联结,而且更明显地影响其语义网络的建立,尤其是词汇间的共现搭配。不同类别词的词性效应随着语言水平提高的程度也不一致,名词的语义反应增加最快,形容词次之,动词的语义构建相对缓慢。许凤,张文忠^[6]实验发现,不同词类的学习结果也不一样,形容词最容易被学习者学会,动词最难,名词介于两者之间。这主要是动词词形的复杂性给动词的学习增加了困难。与前人的研究稍有不同,本研究发现高频和低频形容词在不同水平测试组中均表现出大量的无反应测试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学习者对形容词词汇信息处理不够深入。依据Aitchison(2003)的论述,名词是大脑中最稳固的词类,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名词的语义知识比其他词类更容易获取和习得。事实上,教师在教授语法知识和句法知识的同时,往往会有意识的加强对二语名词词义的理解,凸显名词在语言材料学习中的中心地位,因而使其具有更高的出现频率,而对于动词这类复杂的词形变化的词,学习者会在不断的错误或

失误的使用中来增强对其语义的理解。这种词汇学习策略上的偏好直接导致了学习者对形容词学习的“不彻底性”,即使在其所能够认知的高频词汇中,也只能运用其中某一项词义。另外,本研究也为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一些启示:

(一)教师应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对其英语心理词汇进行重组,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对不同类别的词汇多个意项的呈现,做到不“顾此失彼”。另外,在遇到词汇的不同义项时,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并尽力提高该词汇不同义项的复现率和凸显性,保持词的新近性,以促进学生对该词汇多个义项的习得,提高学习者低频词的使用频率。

(二)做到视听与阅读并重,以文本信息伴随语音呈现。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逐步建立语音和词形之间的联系,把阅读词汇向听力词汇转化。词汇的学习不单是简单复制所学内容,而是创造性使用。创造性就高,这就表明该词已经开始融入其语言系统,更能自如地运用该词。

(三)建立不同的二语词汇概念网络,注重词汇的质量而非数量,把握词汇的深度知识,特别注意词汇之间的联系,词汇各义项之间的联系,集中系统地接触高频词的多个义项并在大脑中积极建构这些义项的概念网络可以使词汇知识更全面、更完整、更系统,有利于建立优质的语义网络,以便理解和输出。

参考文献:

- [1] Nation I S P & K. M. Wang. Graded readers and vocabulary [J].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1999 (12): 355 - 379.
- [2] Rott S. The effect of exposure frequency on intermediate language learners'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retention through reading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 (21): 589 - 619.
- [3] 张萍. 学习者英汉语心理词库构建的词性效应对比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6): 68 - 71.
- [4] 张珊珊. 通过单词联想实验探索二语词汇结构 [J]. *现代外语*, 2006 (2): 164 - 171.
- [5] 陈士法, 彭建武, 侯林平, 等. 英汉心理词典中英语单词储存的词性效应研究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 95 - 100.
- [6] 许凤, 张文忠. 关于词性因素在二语附带词汇习得中的研究 [J]. *长沙大学学报*, 2008 (4): 108 - 109.

[责任编辑:吴晓红]

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

曾昭聪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非常复杂。从文字角度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而形成的异形词;语音角度来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通假字、古今音变、方言音转、听音为字、连绵词、外来词而形成的异形词。有不少异形词的形成是同时具备多种原因的。

关键词:近代汉语;异形词;来源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76-07

On the origin of the homophones in modern Chinese

ZENG Zhao - c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s of the homophones in modern Chinese are rather comple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 are homophones coming from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haracters, variants, secular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ronunciation, there are homophones deriving from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ancient and modern pronunciations, dialects' 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 based written characters, binding words and loanwords. The formations of quite some homophones are out of several reason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homophones; origin

关于现代汉语异形词的研究学界成果较多,而关于近代汉语异形词,则尚无系统研究。笔者将“近代汉语异形词”界定为:近代汉语阶段同时或先后产生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所谓“近代汉语”,指自唐代至清初汉语发展的历史阶段;“同音”,包括方言音变和历史音变;“同义”,指一个及以上义位(义项)相同。笔者在对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近代汉语中丰富的异形词现象,因而对其来源进行了思考。

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历时层面的来源,也有共时层面的来源。我们结合明清俗语辞书中所见异形词(某组异形词中至少有一个成员见于明清俗语辞书),从文字、语音两个方

面进行了共时与历时的综合考察。从文字角度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而形成的异形词;从语音角度来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通假字、古今音变、方言音转、听音为字、连绵词、外来词而形成的异形词。当然,有些分类是交叉的,我们只是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强调,有不少异形词的形成是同时具备多种原因的。

本文以明清俗语辞书语料为线索讨论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篇幅所限,每小类仅举三组例子;举例时少数文字因需要而保留繁体字形式。

一、因古今而形成异形词

古今字是汉字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出现的记录相同意义的不同文字形式。例如:

收稿日期:2012-12-20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一般课题“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2012YB21)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09BYY048)资助

作者简介:曾昭聪(1969-),男,湖南洞口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训诂研究。

【都𡵚】【都鄙】“都𡵚”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地理类,无释义^{[1]61}。

按,“𡵚”为“鄙”之古字,《说文·商部》:“𡵚,𡵚也。”段注:“下文云:‘𡵚,爰𡵚也。’《水部》曰:‘𡵚,不滑也。’凡鄙吝字当作此,鄙行而𡵚废矣。”《说文》所记录的“𡵚”义是鄙吝。然“𡵚”指偏远地区,与“都”相对,这一用法也是很早就有了。《殷虚书契菁华》:“土方正于我东𡵚,戔二邑。”《说文·邑部》:“鄙,五鄙为鄙。从邑,𡵚声。”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即都鄙之本字。《说文解字》以为𡵚𡵚字,而以鄙为都鄙字。考古金文都鄙字亦不从邑,从邑者后所增也。”“𡵚”、“鄙”为古今字。《汉语大词典》“都鄙”条义项二:“京城和边邑。”未收“都𡵚”。“都𡵚”、“都鄙”为异形词。

【匡当】【筐当】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四《居处》“匡当”条:“《说文》‘𡵚’字注云:筐当也。‘当’字注云:今俗有匡当之言。二字不同。应以无‘竹’为正。《玉篇》又有‘𡵚’字,训云门𡵚,其实亦只应书‘匡’。”^{[2]549}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匡当”条:“《说文》‘𡵚’字注:筐当也。筐从竹。唯徐锴系传云:今俗犹有匡当之言。引当字注者误。”^{[2]885}

按,《直语补证》纠正《通俗编》引文出处之误:“今俗有匡当之言”是徐锴系传之语,非许慎语,“引当字注者误”。按《说文·木部》“𡵚,筐当也。”徐锴系传:“今俗犹有匡当之言。”段玉裁注:“匡当,今俗有此语,谓物之腔子也。”即边框义。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文字孳乳之一斑》:“匡当有界域,与国有界域同。”另外,“匡当”一词中的“匡”,《通俗编》以为“应以无竹为正”。其实,“匡”是“筐”的古字,《诗·小雅·楚茨》:“既齐既稷,既匡既勑。”郑玄笺:“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陆德明释文:“筐,本亦作匡。”《说文·匚部》:“匡,饭器,笱也……匡或从竹。”章炳麟《新方言·释器》:“𡵚,筐当也。古悔切。字亦作𡵚。《释名》:‘𡵚,恢也。恢廓覆发上也。’今浙江称作帽木椶为头𡵚。”所以二者是因“匡”“筐”古今字的关系而形成的异形词。

【撵夫】【辘夫】【牵夫】“撵夫”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人物类,无释义^{[1]66}。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撵夫”。《世事通考》将其与“驾长”等词放在一起,据其词目编排方式(语义相类者排在一起)当是指“辘夫”。《汉语大词典》“辘夫”条:“用纤绳拉船或车前进的人。”首

例为明吴嘉纪《挽船行》:“老姑起把船,新妇为辘夫。”从“辘夫”二字字形出现的时代来说,始见于明没错,然从词的角度来说,举明代例则过晚。因为唐代已有“牵夫”这一用法。唐杜牧《与汴州从事书》:“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牵船夫。大寒虐暑,穷人奔走,毙踏不少。某数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县,见县令李式,年甚少,有吏才,条疏牵夫,甚有道理。”此文前面说“牵船夫”,后面说“牵夫”,可证其同。宋邓深《即事六绝》之一:“卧橹无声百丈斜,牵夫匍匐入芦花。”宋许纶《次韵德久舟行阻风》:“昨日颠风鸟雀喧,牵夫寸步不能前。”宋杨万里《舟过兰溪》:“船底石声知浅水,沙头笠影倦牵夫。”《汉语大词典》未收“牵夫”。又,“撵夫”用例最早见于宋代。例如宋袁说友有诗题名为《江舟撵夫有唱湖州歌者,殊动家山之想,赋吴歌行》。又,宋卫宗武《归舟》:“回艇临塘路,撵夫欣路平。”“撵夫”即“辘夫”、“牵夫”。因为“牵”的本义就是牵引。《说文·牛部》:“牵,引前也。”《广雅·释言》:“牵,挽也。”《正字通·牛部》:“牵,别作撵。”《正字通·糸部》:“辘,挽船索也。”“辘”、“撵”当是“牵”的后起区别字,因之“牵夫”、“辘夫”、“撵夫”成为异形词。

二、因异体字而形成异形词

所谓异体字,指音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汉字。从音义相同的广义角度来说,也包括俗字在内。例如:

【子婿】【子婿】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子婿”条:“《史记·张耳陈馥列传》: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2]896}

按,“婿”、“婿”二字为异体。《说文》:“婿,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读与细同。婿,婿或从女。”《汉语大词典》“子婿”条:“亦作‘子婿’。”释义:“女儿的丈夫,女婿。”举三例,除《直语补证》已举之《史记·张耳陈馥列传》外,还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唐柳宗元《祭杨凭詹事文》:“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其中《史记》、《颜氏家训》作“子婿”,柳宗元文作“子婿”。

【发搨】【发搨】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搨鼓”条:“樵楼启明定昏,或祭祀,搨鼓三通,俗呼发搨。唐岑参《凯歌》‘鸣笳搨鼓拥回军’是也。搨,俗作搨,古作雷。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去声,见队韵。”^{[1]36}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六“搨

鼓”条：“《宋史·礼志》：打球，‘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搯鼓。’杨升庵《丹铅录》引岑参《凯歌》：‘鸣笳搯鼓拥回车’，以为近制。启明定昏鼓三通曰‘搯鼓’，当用此字，今本作‘叠鼓’，非。”^{[1]242-243}

按，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一“搯鼓”条：“岑参《凯歌》：鸣笳搯鼓拥回军。今本搯作叠，非。近制：启明定昏，鼓三通，曰发搯。当用此字。俗作‘搯’，非。‘搯’亦俗字。然差善于‘搯’。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转作去声用。”“发搯”还有分用的，如同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洗澡”两个语素分用一样：《汉语大字典》引《水浒全传》第十二回：“将台两边左右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一齐发起搯来。”《汉语大词典》“发搯”条义项一：“指起更打鼓。也指启明定昏。”举三例：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搯也！呀，却早撞钟也！”《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张阴捕惊醒，坐在床铺上，听更鼓，恰好发搯。”清袁枚《随园随笔·六更》：“宋大内五更已绝，则梆鼓遍作，号曰虾蟆更，亦号六更。其时禁门开，而百官集，如外方之攒点，今之发搯是也。”^①《汉语大词典》“发搯”条义项一首举元代例，按宋代已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一：“东而南，转而之西，连亘西北，薄城而营，长十五里，阔十余里，至晚发搯，声震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来或未之闻。”下文：“十一日早，敌营发搯，声如昨日。”又下文：“金人自到此日，给炒麦数合，疲困已甚，皆思北归，抽摘人马过河，至晚不辍。然不复发搯，只击锣数声而已。”宋李纲《梁溪集》卷九十二：“至二十三日夜昏黄，到光州西城厢，听得城上发搯打更。”其它元明例证不烦一一列举。由宋代用例、《汉语大词典》所引元曲、清代袁枚“今之发搯是也”等可知“发搯”一词自宋至清，均为俗语词。按，“搯”、“搯”为异体字。《玉篇·手部》：“搯，搯鼓也。”《正字通·手部》：“搯，搯本字。”《俚言解》以为“搯，俗作搯”是对的，《丹铅总录》“……发搯。当用此字。俗作搯，非”则是鄙薄俗字的观点。“发搯”与“发搯”为异形词。

【笊籬】【罽罽】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三“笊籬”条：“汤中取物竹器曰笊籬，见《指月录》：唐庞蕴居士访大同济师，师提起笊籬曰：‘庞公！’庞云：‘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亦作罽罽。杨诚斋诗：罽罽亲捞微带生。（苏鹗《杜阳杂编》：同昌公主出

降，镂金为笊籬。）”^{[1]203}

按，据《土风录》记录的异体字，“罽”字书未见；“罽”，据《中华字海》，仅见于“接罽”一词，这是古时的一种头巾，见《晋书·山简传》。“罽罽”之“罽”与“接罽”之“罽”仅是字形偶合而已。“笊籬”是用竹篾、柳条或金属丝编织的漏勺，因其作用与网类似，故字又从“网”。“笊籬”亦作“罽罽”，这是异体字（也是俗字）所构成的异形词。

三、因正俗字而形成异形词

俗字是“區別於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3]1}，相沿既久，往往也能取得“正字”的地位。文字的正俗之别是异形词的一个来源。例如：

【攢帐】【攢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攢帐”条：“《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每年造僧帐两本，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勒诸县取索管解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攢帐。”^{[2]887-888}

按，《汉语大词典》“攢帐”条：“亦作‘攢帐’。结帐，清算帐目。”举《金瓶梅词话》二例：第六十回：“那日新开张，伙计攢帐，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又第七十五回：“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来攢帐，交与你，随你交付与六姐，教他管去。”由《直语补证》所举《旧五代史》例，知其书证过晚。在《金瓶梅词话》之前的用例还有：宋洪适《盘州文集》附宋许及之《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行状》：“公曰：汉法：令长吏守丞岁终上计，大略似今攢帐耳。”又作“攢帐”，盖“攢”为“攢”之俗字。《字汇·手部》：“攢，俗攢字。”《汉语大词典》所举《金瓶梅词话》两例即异形词并存。又如：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晓谕亭户安业》：“亭户作过者，只今帖息；逃走者，只今归还。本司见行攢帐，选官前来散还本钱，各各仍前着业。”

【棒椎】【棒槌】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棒椎”条：“‘椎’字注。”^{[2]912}

按，“椎”字注”指承上一条释语所引《广韵》。《广韵》：“椎，椎钝不曲挠也。亦棒椎也。又椎髻。”“椎”，《说文·木部》：“椎，击也。”段注：“所以击也。”“椎”有名动两种用法，其名词义后作“槌”。“槌”本指放置蚕箔的木柱。《说文·木部》：“槌，关东谓之槌，关西谓之？”但后来又成为

① 其中《警世通言》例中的“发搯”《汉语大词典》误排为“打搯”，今正。

“椎”的通用俗字。《集韵·脂韵》：“椎，通作槌。”《希麟音义》卷四“槌胷”条：“槌，俗字也，正作椎。”“棒椎”一词指木棒，《汉语大词典》未收，但收有其异形词“棒槌”，义项一：“捶打用的木棒。”首例举《金瓶梅词话》第三八回：“便取棒槌在手，赶着打出来。”按此用例过晚。《太平广记》卷二五八“高敖曹”条引《启颜录》：“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元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予谓双陆之制，初不用棊，俱以黑白小棒槌，每边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两只掷之，依点数行，因有客主相击之法。”另外，“棒椎”的用法也在《直语补证》所引《广韵》释语之前出现了：《龙龕手鑑》卷四：“椎，直追反，棒椎也”。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椎，《汉[书]·张良传》：为铁椎百二十斤。又击也，捣也。亦作捶。又椎钝不曲挠。又棒椎。又椎髻。亦作魁。”“棒椎”与“棒槌”，是俗字造成的异形词。

【颀子】【噪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颀子”条：“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颀子。见《梦溪笔谈》‘叫子’一条。”^{[2]1908}

按，《梦溪笔谈》卷十三：“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颀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颀子’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则知此处“颀子”即“颀叫子”、“叫子”，即置于喉中吹之能模仿人声的一种哨子。《直语补证》“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颀子”，是噪音之义，与《梦溪笔谈》所记并不一致。不过，由《直语补证》的释义“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颀子”可知“颀子”也有“噪音”义，其所引《梦溪笔谈》“颀子”义也与“噪音”有关而不是“喉咙”义。《汉语大词典》“颀子”条释义：“噪子；喉咙。”释义与书证均无“噪音”义，据《直语补证》可补“噪音”义。

又按，“颀”本指额头，《说文·页部》：“颀，额也。”引申指头，《太玄·僖》：“天扑颀。”范望注：“颀，头也。”喉咙为人头与躯干相连接之处，故“颀”又引申指喉咙。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鼻病诸侯》：“颀颀之间，通于鼻道。”据《直语补证》，亦可引申指噪音。“噪”，宋代始见，乃是“颀”后起俗字，《集韵·荡韵》：“噪，喉也。”因字从“口”，尤多用以表“噪音”义。明郭勋辑《雍熙乐府·一枝花·嘲妓丑》：“歌声时，噪拗；舞旋时，腰驼。”《汉

语大词典》收有“噪子”条，列“喉咙”、“噪音”两个义项。“颀”、“噪”正俗字，故“颀子”与“噪子”为异形词。

四、因通假字而形成异形词

通假字就是用读音相同相近的字替代本字。一般来说，通假字是可以考知其本字的。

【装潢】【装璜】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十七：“染纸谓之装潢。（《释名》：潢，染纸也。《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高澹人曰：装潢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案潢有上去二音。）”^{[1]2474}又，清伊秉绶《谈征·事部》：“《魏古录》：凡书画装潢之佳，自范晔始。杨升庵曰：《唐六典》有装潢匠，注：音光，上声，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今制笈犹有装潢之说，作平声读非。唐秘书省装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1]1280}

按，《汉语大词典》“装潢”条义项一：“古时装裱书画用黄蘗汁染的纸，即潢纸，故称。”“一说，潢，犹池。言书画周边装饰绫锦，则缘内如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明方以智《通雅·器用》：‘潢，犹池也，外加缘则内为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即“表背”也。’”^①《说文·水部》：“潢，积水池。”后引申指装潢。《玉篇·水部》：“潢，染潢也。”《广韵·宕韵》：“潢，《释名》曰‘染书也。’”《齐民要术》有“染潢及治书法”。《说文·玉部》：“璜，半璧也。”“潢”为本字，“璜”为通假用法。由此“装潢”与“装璜”成为异形词。

【滑澁】【滑汰】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滑澁”条：“行路欲颠仆曰打滑澁，见皮日休《吴中苦雨》诗：‘藓地滑澁足’。亦可作滑汰，东坡《秧马歌》：‘耸踊滑汰如凫鹭’。（《说文》：‘汰，滑也。’《广韵》‘澁’注：‘泥滑’。又‘跽’注：‘足跌’。）”^{[1]286}

按，《玉篇·水部》：“澁，滑也。”《广韵·曷韵》：“澁，泥滑。”“汰”则为清洗义。《说文·水部》：“汰，渐？也。”王筠句读：“汰者，汰之讹。”《土风录》所引不确。《广雅·释詁二》：“汰（汰），洒也。”因此，“滑汰”之“汰”表“滑”义是通假用法，“滑汰”是因通假字而成为“滑澁”的异形词。

【温噉】【温燉】【鹑忒】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九“温噉”条：“物微暖曰温噉。案，《致虚阁杂俎》云：‘今人以性不爽利者曰温噉汤，言不冷不热

① 此处方以智的时代《汉语大词典》误作“清”，今正。

也。’龚氏《芥隐笔记》谓温噉等字皆乐天语。案，元微之诗：‘宁爱寒切烈，不爱暘温噉。’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噉’。不独乐天也。（乐天诗：‘池水暖温噉’。或以为韩文公诗。又《火炉诗》云：‘温噉冻肌活。’此‘温噉’为‘火炽’。与‘噉’异。）俗又转其音曰‘鹑忒’。”^{[1]279}

按，“温噉”指“物微暖”，白居易《别毡帐火炉》诗“婉软蛰鳞苏，温噉冻肌活”中之“温噉”亦“微暖”之义，并非如《土风录》所说的“火炽”义。“噉”本指火光，但在《广韵》中有他昆切读音，通“噉”。白诗“温噉”因通假字而与“温噉”形成异形词关系。“俗又转其音曰‘鹑忒’”，则“鹑忒”为其音转异形词。

五、因古今音变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有古今之别，某一个词到后代因语音有所变化而被写成另一个形式，就形成了异形词。

【螻蛄】【蛸蚘】【蛸蝓】【蚱蝓】/【螞蚱】【麻劄】【馬劄】【蛸蚱】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麻劄”条：“扬子《方言》螻蛄即蝗。注：‘螻音近詐，亦呼蛸蚘。’今北方人呼螞蚱，或麻劄，即此二字。颠倒声转之异。《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随俗写耳。”^{[2]903}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麻劄”。《汉语方言大词典》“麻劄”条：“又作‘麻蚱’。”“麻蚱”条：“〈名〉蚱蝓；蝗虫。西南官话。……也作‘麻劄’”，后举《直语补证》例。按，由《直语补证》“今北方人呼作螞蚱，或麻劄”及其所引《元史》“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知《汉语方言大词典》仅列为“西南官话”有所不妥，亦当为北方方言。

又按，《方言》卷十一：“蛄……南楚之外谓之螻蛄，或谓之蛄……。”《说文·虫部》段注：“螻蛄，即今北人所谓蛸蚱，江南人谓之蝗虫。螻蛄、蛸蝓，一语之转。”王夫之《诗经稗疏·幽风》“斯螽、莎鸡、蟋蟀”：“斯螽，毛传曰：‘蛸蛄也。’……《方言》及《广雅》谓之春黍。郭璞曰：‘江东呼蛸（蚱）蛸（蝓）。’今按，蛸蛄似蝗，项稍短而无斧，六七月间好入人葛衣中，闽粤人生啖之。”章炳麟《新方言·释动物》：“《说文》：‘蝗，螽也。’今通言谓之蝗，或谓之蛸蛄，或谓之蛸蝓。《方言》作螻蛄。”由此，知“螻蛄”、“蛸蛄”、“蛸蝓”、“蚱蝓”是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螞蚱”、“麻劄”、“馬劄”、“蛸蚱”是另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两组异形词又是

“颠倒声转之异”

【胡咙】【喉咙】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胡咙”条：“喉咙曰胡咙。按，《后汉[书]·五行志》童谣云：‘吏置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胡，颌下肉也。又去声。《金日磾传》“捽胡”，晋灼音“护颈”也。（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则“喉咙”亦可读“胡咙”。“尤”、“虞”二韵古通也。）”^{[1]255}又，清梁同书《直语补证》“胡咙”条：“《后汉[书]·五行志》：‘请为诸君鼓咙胡。’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2]903}

按，《汉语大词典》“胡咙”条：“喉咙。清顾炎武《日知录·胡咙》：‘古人读侯为胡。《息夫躬传》师古曰：“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参以《土风录》所引“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知《直语补证》所谓“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确实是保存了古音。“胡咙”是较早的词形，“喉咙”晚出，但“胡咙”一直保存在某些方言中。《直语补证》说“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日知录》说“今人言胡咙”，所谓“今人言”，似均指其方言。二人均为吴方言区人（梁同书为浙江钱塘人，顾炎武为江苏崑山人）。但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胡咙”一词指“嗓子，喉咙”，见于中原官话、晋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闽语，则“胡咙”一词基本上是通用词了。所以“胡咙”、“喉咙”主要还是因古今音变所产生的异形词。

【登时】【当时】【顿时】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一“登时”条：“登时犹言实时、当时也。当读去声。《唐书》田弘正笑刘悟曰：‘闻除改，登即行矣。’胡三省《通鉴》注：‘登即行，言登时行也。’《律条》：‘凡夜无故入人家，主家登时杀死，勿论。’按韵书‘登’注‘升也，进也，又成也，熟也。’无实时、当时之义。‘登时’盖方言耳。”^{[1]7-8}

按，《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帝登帅卫士”胡三省注：“登，登时也。登时，犹言实时也。”《助字辨略》卷二“《吴志·锺离牧传》注‘牧遣使慰譬，登即首服’”刘淇按：“登，即登时，省文也。”按，“登时”即“当时”，也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顿时”^{[4]86-87}。“登时”表此义的较早例子：《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晋葛洪《抱朴子·释滞》：“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时差也。”“当时”表登时、顿时义《汉语大词典》首引《海内十洲记》，此书旧题汉东方朔撰，《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当在六朝时，则基本上与“当时”同时。“顿时”

则清代才出现。因此,“登时”、“当时”、“顿时”是一组因古今音变而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音转异形词。

六、因方言音转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不但有古今之别,同一时代也有方言音转情况(有时也包括讹转)。古今音变与方言音变往往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

【呆木大】【呆木头】【呆木徒】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呆木大”条:“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馱去声。《辍耕录》‘院本名目’有此。”^{[2]1886}

按,《辍耕录》卷二十五确记有“呆木大”,但与今义是否完全相同还需考证。因“木大”为宋代戏曲角色名,推测这一角色名所指角色可能为“不慧者”。台湾《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呆木大”条义项一:“愚蠢的人。直语补证·呆木大:‘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亦称为‘呆木。’”《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汉语方言大词典》亦未收该词,但收“呆木头”,所录义项有二,其一:“〈形〉不机灵;不聪明。吴语。江苏江阴。浙江绍兴。”其二:“〈名〉比喻发呆不动或反应迟钝的人。吴语。上海[ŋE²³⁻²² mo?¹²⁻⁵⁵ dɿ²³⁻²¹]。《歇浦潮》第三十回:‘他们都和~一般,焉能解得你的寂寞。’浙江绍兴。鲁迅《故事新编·出关》:‘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明清吴语词典》“呆木徒”:“又作‘呆木大’”,据“光绪镇海县志39卷”转引《直语补证》。三词可视为同一方言内部的音转异形词。

【望子】【幌子】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望子”条:“望子,酒家悬帜也。古谓酒帜为帘。帘音廉。《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高而酒不售。’《容斋续笔》有‘酒肆旗望’之文。今人呼酒旗为望子。”^{[1]35}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望子”条:“《广韵》:‘青帘,酒家望子。’按今江以北,凡市贾所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2]584}

按,明杨慎《丹铅馀录》卷八“酒帘”条:“《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高。’帜谓之帘,帘谓之酒旗。《唐韵》‘帘’字注当云‘酒家悬帜’,岂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俚言解》似袭之而来。所谓“望子”,即高悬以望的标识。《唐韵》云“酒家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则“幌子”是“望子”的方言音转异形词。

【戮席】【冲席】【撞席】【闯席】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戮席”条:“戮音銃,《字学集要》:饮酒不

请自来曰戮席。俗作冲席。”^{[1]30}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撞席”条:“朱国祯《涌幢小品》载:士子有用中论中式者,后相竞用之。时为语曰:‘主司好请客,徐干偶撞席。只好这一遭,后会难再得。’(时以言不对题者,为请客文章)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盖言突如其来也。”^{[1]252}

按,诸词皆表“饮酒不请自来”或酒席“不邀自至”。《汉语大字典》据《广韵》“戮”徂送切,音 zòng,又“戮戮”字下“戮”注:“不请自来。《广韵·末韵》:‘戮,戮戮,食不唤自来。’《类篇·支部》:‘戮戮,戮戮,不迎自来也。’”作“戮席”,则明代始见(《字学集要》为明代字书)。《汉语大词典》未收“戮席”、“冲席”,亦未收《汉语大字典》已录、见于《广韵》、《类篇》中的“戮戮”。但收有“撞席”、“闯席”。前者释义:“未受邀请而赴宴。”举三例,首例是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三折:“你把柴门紧紧的闭上,倘有撞席的人,休放他进来。”后者举一例: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一:“嵩(严嵩)子世蕃鸞纵,邀公(杨允绳)饮,有二客皆朝绅,不速而至。世蕃令两童子持朱墨笔点其面,为闯席者戒。”又,“戮”见于《广韵》,出现时间最早。字形从聚从支,会意,义当是冲散他人聚会,似当是为表示“饮酒不请自来”这一意义而造的专用字。《俚言解》说“音銃”,与《广韵》所记反切不相同,当是方言音转。又,《俚言解》“俗作冲席”,则“戮”、“冲”方言音同。《土风录》“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则“冲席”、“撞席”、“闯席”乃是因方言音转而形成的异形词。

七、因听音为字而形成异形词

听音为字“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误听误记,二是相近之字,三是变生涩为熟悉、变抽象为形象具体。”^{[5]667}“听音为字”有时包括方言音转;有时相当于通假字,但通假字一般有本字,而“听音为字”则不一定能找“本字”。例如:

【薄相】【孛相】【白相】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五“嬉游曰白相”条:“《姑苏志·方言》‘薄相’注云:嬉劣无益儿童作戏。薄音如?。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南郭《州志》(引者按,即张采《太仓州志》。采号南郭)云白音鼻,非是。(鼻音避作入声者,土音之讹。)”^{[1]347}清翟灏《通俗编》卷十二“孛相”条:“《吴江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按,皆无

可证,惟东坡诗有‘天公戏人亦薄相’句。”^{[2]265}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二“薄相”条:“东坡《泛颖》诗: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嬉嬉。”^{[6]46}清陈鱣《恒言广证》卷二“薄相”条:“鱣按:《吴江县志》:俗谓嬉游曰字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6]39}

按,诸俗语辞书将“字相”、“白相”、“薄相”三个不同的写法联系在一起(其中《恒言广证》晚出,当袭自《通俗编》),指“嬉游”。欲索其理据,则如《通俗编》所说:“皆无可证”,因此这三写不种的写法实为听音为字而形成的异形词。实际上,由于方言原因,实际还不止这三种词形。《土风录》“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则还有作“别相”者。

【一刀两段】【一刀两断】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一刀两断”条:“《朱子语录》:克己者,是从根源上一刀两断,便斩绝了。又云:圣人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直是一刀两断,千了百了。”^{[2]574}清梁同书《直语补证》“一刀两段”条:“见《五灯会元》。”^{[2]902}

按,《直语补证》未举出具体例子,以之为线索,可以发现《五灯会元》中用例颇多,如卷十二《龙潭智圆禅师》:“阳来日送出三门,乃问:‘汝介山逢尉迟时如何?’师曰:‘一刀两段。’”《通俗编》所列词目是“一刀两断”,《直语补证》则是“一刀两段”,二者在“坚决断绝关系”义上是一对异形词。

【一寤】【一惚】【一瞢】【一寤】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一寤(音忽)”条:“睡一觉曰一寤,音作忽,见《广韵·十一没》‘寤’注:‘呼骨切,睡一觉也。’(毛初晴《韵学要指》云:越人语暂睡而觉曰寤。《礼部韵》无有。)”^{[1]286}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六《杂字》“寤”条:“音忽。《说文》:卧惊也。《博雅》《广韵》皆云觉也。俗以卧一觉为一寤。《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一寤,起来天地还依旧。”^{[2]794}

按,《汉语方言大词典》“一惚”条:“〈数量〉一觉。吴语。江苏苏州。陆阿妹《五姑娘》:‘当仔伊~要困到大天亮。’”又“一瞢”条:“〈名〉(睡)一觉。吴语。江苏苏州。《海上花列传》第十八回:‘~困下去,困到仔天亮。’”又“一寤”条:“〈名〉(睡)一觉。吴语。清钱大昕《恒言录》:‘吴中方言,睡一觉谓之~。’也作‘一寤’:吴语。上海[ɿʔ⁵⁵⁻³³ huəʔ⁵⁵⁻⁴⁴]. 胡祖德《沪谚》:‘卧觉曰~。寤音忽。’浙江金华。1915年《金华县志》:‘邑以

一觉为~。《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表示同样意义的词分别记录为不同词形。按,“寤”,《说文·寤部》:“寐觉而有信曰寤。”段注校改为“寐觉而有言曰寤”。《小尔雅·广言》:“寤,觉也。”“寤”,《说文·寤部》:“寤,卧惊也。一曰小儿号寤寤。一曰河内相諝也。”《广雅·释詁四》:“寤,觉也。”故“一寤”、“一寤”各有其理据。“惚”,《玉篇·口部》:“惚,忧也。”故“一惚”是听音为字。“瞢”则为记录方言的新造字。《汉语大字典》引刘半农《车水夜水也风凉》自注:“瞢,睡之单位名,自入睡以至于醒,每一次曰一瞢。时间长曰大瞢,时间短曰小瞢。”“一瞢”是用方言字记录的词形,也是听音为字。

因语音原因而形成异形词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还包括连绵词和音译外来词。连绵词是两个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的汉字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往往字无定体;音译外来词是用汉字来记录外来语言中的词的读音,也可能用到不同的汉字。所以二者实际上都是听音为字的结果。明清俗语辞书中也有一些相关例子,因这两种情况较为明显,不赘述。

近代汉语异形词主要就是由于以上原因而形成的。异形词存在于不同的文献中,其中比较有特点的现象是版本异文中较多的异形词。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有助于词语释义、辞书编纂,对汉语词汇史研究、词汇的系统性研究都将有重要作用。因非本文主题,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1] 长泽规矩也. 明清俗语辞书集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 翟灏,梁同书. 通俗编(附直语补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3] 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4] 曾良. 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 [5] 王云路. 中古汉语词汇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6] 钱大昕,陈鱣. 恒言录 恒言广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责任编辑:吴晓红]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能性“得”字研究

王衍军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州 510610)

摘要: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语料清晰展现了表“能性”的“得”字由元代至清末逐渐语法化的过程:由实义动词到助动词,再到表能性半自由动词,最后完全虚化为能性助词,“得”经历了由实到渐虚再到虚这样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此外,该语料还表明:由元代至清末,表能性“V得/不得”式结构由盛渐衰,与此相反,“V得/不C”式能性述补结构和一些能性助动词的使用频率却逐渐增大,这种语法格式兴替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社会属性的制约和影响。

关键词: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能性“得”字;语法化;汉语历史语法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83-06

Study of the potential word of “De” in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Korean era

WANG Yan - 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era of the Korean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De” from Yuan Dynasty to the last stage of Qing Dynasty. “De” has gone through the course of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transitive verb to auxiliary verb and then to semi-free verb, until finally becomes the auxiliary word which expresses potential completely. In addition, the data also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V De/No De” was used frequently during the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yet, the rate of utilization of it gradually declined in the early of the Qing Dynasty. Meanwhile, the other structure of “V De/ No C” and some helper verbs have been developed gradually in the competition of it since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reason of the diachronic grammar evolution in northern dialect is determined by the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language’s social attributes.

Key words: the Korean era; Chinese textbooks; the potential word of “De”; grammaticalization; historical grammar of Chinese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指的是“朝鲜王朝”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元代到清代)所使用的汉语教科书。五百多年间,朝鲜王朝编纂和使用过的汉语教科书不下十余种,本文利用汪维辉教授编纂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1],选择了其中的七本教科书作为语料来源,这七本教科书分别是:

《原本老乞大》,编著年代“最迟不晚于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前一至几年,反映元代汉语特点”^{[2]94}。下文简称《老》A。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两书的“汉语部分已不同于元时的初版本,大体上反映了明初的北方话口语”^{[1]208}。下文分别简称《老》B、《朴》A。

《老乞大新释》,刊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是清代前期北京口语的实录。下文简称《老》C。

《重刊老乞大谚解》,刊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老》C相比,语言相差不大,但比《新释》要保守些。下文简称《老》D。《老》A-D四个版本合称《老》。

收稿日期:2012-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元代以来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研究”(11YJC740108)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以来北方方言能性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2BYY088)资助

作者简介:王衍军(1972-),男,山东泗水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词汇语法和现代汉语方言研究。

《朴通事新释谚解》，刊于清乾隆30年(1765年)，大体反映清代前期的北方话口语。下文简称《朴》B。《朴》A-B两个版本合称《朴》。

《华音启蒙谚解》，刊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反映清末北方话口语。下文简称《华》。

七本教科书都“力求用地道的汉语口语来写，而且是用当时通行的、而不是已经过时的口语来写，所以即使是同一种教科书，也要不断地加以修改。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十分难得的、贴近当时汉语口语的语言资料”^[1]。因此，这些汉语教科书语料大致反映了元末至清末五百多年间北方话口语发展变化的情况。从近代汉语历史的分期来看，这一时期的汉语正处于过渡期，承上启下，新旧交替，而教科书语料中能性“得”字的多种形式和丰富的语法作用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在语料中，能性“得”字主要做助动词、半自由动词和能性助词，出现频率非常高，但现有成果中对其进行研究的却不多。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我们检索到以下几篇相关文献：刘公望^[3]重点剖析了《老乞大》中“的”字的多种句法功能，其中提及“的”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可能或不可能，相当于一个后置的助动词；王森^[4]和朱丽芳^[5]探讨了《老乞大》和《朴通事》中“得”字的多种语法意义，勾勒了“得”由“获得”到“得到”，到表示行为、表示心理活动、再到表示能愿、表示情态等这样一个逐渐虚化的过程。可见，以上论文都只是在研究中涉及到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语料中的表能性“得”字，并未对其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因此，在前贤时彦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朝鲜时代七本教科书中的表能性“得”字为研究对象，对其语法形式及语法意义进行综合归纳，并对能性“得”字的历时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历时演化的动因和机制。

一、能性助动词“得”

能性助动词“得”在汉语教科书中使用频率不高，在《老》中出现4次，在《朴》中出现8次，在《华》中则未见使用。在句法上“得”后必须出现动词或动词短语，不能单用，并与之形成述宾结构关系，动词或动词短语是它的内容宾语。在出现环境上，所有用例均出现在对话语境中，其中，肯定形式多出现在反问句中，构成“(怎生/怎麼)+得+动词/动词短语”结构，否定式多用在陈述句中，构成“不得+动词/动词短语”结构。

(一) 得+动词/动词短语

(1) 帖落是不喫水，怎生得倒？(《老》A:17)^①

(2) 这洒子是不沉水，怎生得倒？(《老》B:67)

(3) 这洒子是不沉水的，怎麼得满盛了水了呢？(《老》C:118)

(4) 这洒子是不沉水，怎麼得满盛了水？(《老》D:169)

(5) 我一般杂识人家，满了一任时，急且几时又得除？(《朴》A:276)

(6) 我这般杂职官员，满了一任，还不知等到何年才得补用哩。(《朴》B:377)

(7) 常言道：“今日脱靴上炕，明日难保得穿。”(《朴》A:252)

(8) 案上堆着许多案件，都要逐件发落，直到日平西才得上马回家。(《朴》B:386)

(9) 门子关了，腰栓插的牢，这般隄防时，怎麼得入去？(《朴》A:271)

(10) 这般隄防的紧慎，他怎麼得能勾(够)偷了东西去呢？(《朴》B:373)

(11) 把窗孔的纸扯了，一发着草布糊了，那般的蚊子怎麼得入来？(《朴》A:282)

“得”表客观可能性，表示“客观条件是否容许某种动作或变化的实现”，相当于普通话的“会、能、可能”。如例(1)“怎生得倒”即“怎么能倒”。从不同时代的语料来看，其后所接的谓词性词语明显不同。元明时期，朝鲜汉语教科书中能性助动词“得”多用在单音节动词或双音节复合趋向动词前面，如“倒”、“除”、“穿”、“入去”、“入来”。清代前期，“得”后所接的动词短语逐渐复杂化，不再是光杆动词或复合趋向动词，而是前后均附加了很多修饰限制成份，如例(1)、(2)中，“得”后是光杆动词“倒”，而在例(3)、(4)中，“得”后的成份变成了复杂动词短语“满盛了水了呢”和“满盛了水”。

不仅如此，助动词“得”还可以和另一助动词“能勾(能够)”连用，再后接动词短语，构成复杂的述宾结构，如例(10)。丁声树先生指出：“有时候为加强‘能’或‘可以’的意思，用了‘得’字还可以再加‘能’字或‘可以’。”^[6]本句中“得”、“能勾”连用，语句本身显得信息冗余，不符合经济原则，但说话者有意使用这种连用形式，同时配合上反问语气，增强了能性表达效果，从而强调“他”(小毛贼)根本不可能“偷了东西去”。

(二) 不得+动词/动词短语

(12) 官司排门粉壁，不得安下面生歹人。

^① 本文以汪维辉教授编纂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为例句出处，“冒号”前为书名，后为页码，下同。

(《老》A:282)

(13)俺不是不教恁宿。官司排门粉壁,不得安下面生歹人。(《老》A:21)

(14)如今官司好生严谨,省会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老》B:71)

(15)咱休别了兄长之言,定体已后,不得改别。(《朴》A:227)

否定式“不得”表示客观条件或情理上不许可,后面必须带动词或动词短语。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于书面语,特别是多用于规章法令等文体。丁声树先生指出:“‘得’字也有‘能’的意思,通常总是以否定居多。”^{[6]391}但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肯定形式的出现次数要高于否定形式,两者出现次数之比为12:4,而且否定形式只有“不得+动词/动词短语”,没有现代汉语中的“没得”和“没有得”加动词/动词短语的用例。

二、能性半自由动词“得”

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能性半自由动词“得”的使用频率很高,特别是在元代和明初的教科书中,但清代前期以来,使用频率渐趋衰退。从句法形式来看,“得”用在谓词后构成两种格式:(一)谓词+得/不得+(O)^①+有;(二)谓词+得/不得+(O)。

(一) 谓词+得/不得+(O)+有

这一句法格式只出现在《老》A中,其中,肯定形式“谓词+得+(O)+有”出现2例,否定形式“谓词+不得+(O)+有”出现3例。如:

(16)天可怜见,身已安乐时,也到得有。(《老》A:6)

(17)一个手打呵响不得,一个脚行呵去不得有。(《老》A:41)

(18)官人们前面出不得气力行呵,一日也做不得人有。(《老》A:41)

(19)死的后头,不拣甚么,都做不得主张有。(《老》A:41)

(20)我汉儿人上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少汉儿言语省的有。(《老》A:6)

例(16)–(18)表示具备或不具备实现某种动作/结果的客观条件,例(19)(20)表示具备或不具备实现某种动作/结果的主观能力。其中,位于句末的“有”系句末语气助词,表达肯定或是强调的语气,这种用法仅出现在《老》A中。《老乞大集

览》卷上“汉儿人有”条下云:“元时语必於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1]317}可见,句末语气助词“有”体现的是元代北方话的特点,是汉语与蒙古语接触融合的产物。因为在蒙古语中,“有”是句末助动词,使用频率非常高,而汉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成份,因此就采用了附加在句尾的方式。元蒙王朝建立后,随着蒙古语与汉语接触、渗透、影响的加深,这种句末语气助词逐渐在汉语中大量使用。但这种用法并没有被承继下来,随着元蒙王朝的灭亡,蒙古语对北方汉语的影响逐渐消退,句末语气助词“有”也就随之消亡了。

(二) 谓词+得/不得+(O)

从谓词来看,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语料中仅出现1例形容词“坏”,其余均为动词,而且大多数为单音节动词,如“行”、“当”、“买”、“卖”、“说”、“赢”、“省”、“做”、“到”等,小部分为双音节动词,如“著落”、“成合”、“抵挡”、“消化”等。其次,从语义来看,语料中表能性的“V+得/不得+(O)”可分为三类:A类表示“客观可能性”,用于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容许某动作或变化的实现;B类表示“主观可能性”,用于表明主观能力做得到做不到或是否擅长做某事,即主观能力是否容许某动作或变化的实现;C类表示“情理、事理许可性”,用于表明情理、事理上是否容许某动作/结果的实现,该结构含有说话者的主观评价,多表示“许可、禁止或劝阻”。例如:

A类:(21)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老》A:7)

(22)这桥梁、桥柱比在前喂牢壮,阿的涯十年也坏不得。(《老》A:18)

(23)似这般价钱,其实著落不得。(《老》A:32)

(24)你底似的休多索,恁两个枉了,成合不得。(《老》A:32)

(25)是诸王段子,不是常行的,不着十二两银子,买不得他的。(《朴》A:221)

B类:(26)底似的汉儿言语说不得的上头,不敢言语。(《老》A:22)

(27)那般呵,消化不得上头,脑痛头眩。(《老》A:40)

(28)你学了多少时?我学半年有余也。省的那省不的?(《老》A:8)

(29)咳,那矧汉,你那里抵当的我?(《朴》A:278)

^① 下文中“V”代表动词,“O”代表宾语,“(O)”表示宾语可有可无,“C”代表补语,“/”表示前后选项二选一。另外,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在朝鲜时代教科书中作谓词的除动词外,还有1例形容词“坏”。

(30)咱们下一局赌输赢(赢)如何?你那里赢(赢)的我?(《朴》A:225)

C类:(31)噯吆,大人们受罪不少咧。到这一步田地何能说得麽?(《华》:488)

(32)你父亲可好麽?不孝的说不得咧,我的父亲前年去世。(《华》:478)

(33)我要告辞大人,这是使不得的。那有怎麽快走的?(《华》:488)

三类“得”前的谓词既可以是表主动意义的动词,也可以是表被动意义的动词,其中,A类还可以是形容词。就主语而言,A类结构一般蕴含着受事者主语,C类则一般蕴含着施事者主语,而B类则施受两可。所以B类结构经常是歧义两可的,既可表客观可能性也可表主观可能性,一般通过具体语境来消除歧义。比如例句(26),是表示“客观环境不允许说汉儿言语”?还是表示“主观能力上不会说汉儿言语”?语义模糊,必须要通过语境来消除歧义。此外,为了强调主观可能性,B类“谓词+得/不得+(O)”前还可再用上助动词“能”。例如:

(34)咱们下一局赌个输赢如何?你那能赢的我?(《朴》B:348)

(35)咳,你这矮汉,那里能抵当的我?(《朴》B:378)

“助动词拿别的动词做宾语,不拿名词做宾语”,^{[7]322}以上两例中“谓词+得+(O)”做助动词“能”的宾语,表明结构中“得(的)”字仍带有一定的动词特性。又如下面的例子似乎更能说明这一点:

(36)似你这般定价钱,就高丽田地里也买不得。(《老》A:32)

(37)似你这定的价钱,就是朝鲜本地方也买不来!(《老》C:134)

“买不得”与“买不来”前后对举,义为“不能买来”,“得”明显带有一定的动词性,但“得”又必须固定地用在动词后面,综合这些特征,我们认为此处的“得”是一个表能性的半自由动词。

三、能性助词“得”

能性助词“得”插入述语和补语之间,构成“V得C(O)”式能性述补结构,经过穷尽式分析,可知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能性助词“得”构成三种句法格式:(I)“V得C(O)”式能性述补结构;(II)“V得OC”式能性述补结构;(III)“V得了”式能性述补结构。

(一)“V得C(O)”式能性述补结构

这一结构表示“主、客观条件是否容许实现某

动作或变化的结果、趋向”,其否定形式是“V不C(O)”式。该结构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用例不多,《老》A和《老》B中各有8例,《老》C和《老》D中分别是18例和17例,《朴》A、《朴》B中各出现了16例,《华》中出现了34例,在使用频率上大致呈现出一种渐趋递增的趋势。例如:

(38)这慢刀钝,不快,若干草几时切得了?(《老》A:12)

(39)这夏店俺是曾走了一两遭,都忘了,那里记得来?(《老》A:24)

(40)便将到市上,市上人也出不上价钱。(《老》A:28)

(41)你当这个差有几年麽?有一年多工夫。是好能对得起你老人家。(《华》:478)

例(38)“切得了”即“切得完”,“了”为实义动词,“完、尽”义,其语义指向“V”(切)的受事(草),整个结构表示实现“切完草”这一结果的可能性。例(39)中,“来”为趋向动词,表示有(没有)能力完成“记住”这一结果,表示的是一种主观可能性;例(40)是否定式,“出不上价钱”表示客观条件不容许实现“出上价钱”这一结果;例(41)中,助动词“能”与“V得C(O)”式结构叠架使用,强调无论是从主观能力还是从客观条件(当差时间)都能“对得起你老人家”。

(二)“V得OC”式能性述补结构

“V得C”式能性述补结构如果带宾语,宾语的位置多在补语C后,如例(41),但我们在《朴》中发现4例宾语O的位置处在补语C之前,即构成“V得OC”式结构,其对应的否定形式是“VO不C”结构,整个结构表示“主观条件是否容许实现某动作或变化的结果、趋向”。例如:

(42)不问多少与他些个便是。治得马好时,多少不打紧。(《朴》A:236)

(43)如此说,只要他治得马好,钱之多少倒不打紧。(《朴》B:354)

(44)咳,到底是你这矮汉倒了,我原说你那里敌的我过哩。(《朴》B:378)

(45)他前日输与我的猪头也不肯买,我正恨他不过。(《朴》B:377)

吴福祥先生指出:“V得OC、VO不C是唐代产生的语言形式,后来为绝大多数南方方言所承继,成为这些方言能性述补结构系统中最早的底层形式。”^{[8]308}而《朴》中的“汉语部分是1483年经过中国使臣葛贵等人修改过的本子,已不同於元时的初版本,大体上反映了明初的北方话口语,其中也许还杂有南方方言的成分”^{[1]208}。汪维辉先生的这

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这种“V得OC”式能性述补结构正是南方方言中最早的底层形式,是《朴》中所带有的南方方言的印迹。

(三)“V得了”式能性述补结构

“V得了”式能性述补结构表示“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否实现某种动作或变化”,其对应的否定形式是“V不了”。该结构在朝鲜汉语教科书中用例不多,且仅在清初以来的教材中出现,其中《老》C、《老》D中各出现2例,《华》中出现9例。在该结构中,“了”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词汇意义“完、尽”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作用在于使可能式成为可能,是一种傀儡补语”^{[7]210}。例如:

(46) 买主若不添些,也买不了去,卖主多要争价钱,也不能卖去。(《老》C:134)

(47) 人家的儿孙,从小教导他成人,若有福分,官儿也做得了。(《老》D:195)

(48) 你这样俗眼那能懂得了?我说给你听罢。(《华》:489)

(49) 你这个好糊涂话!买卖规矩,两愿意才成得了。(《华》:493)

(50) 讲的狠好,教人越听越好。我们外方的人,想去也去不了。(《华》:482)

(51) 可惜了,可惜了,像这样的好东西再也得不了。(《华》:488)

以上例子中,“了”的意义虚化,其语义指向“V”,整个结构表示在主、客观条件制约下,动作“V”能否实现,义为“能/不能V”。如例(46)“买不了去”义为“不能买去”;例(47)“做得了”义为“能做”。

四、结语

(一)能性“得”字的语法化过程

“得”字本为动词,义为“得到、获得”,在先秦上古汉语时期,在句中作谓语动词,能带宾语。如《后汉书·班超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时,“得”字也出现于另一动词前的位置,作助动词,表“可能”之义。如《孟子梁惠王上》:“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乎?”这些用法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都完好承继下来。例如:

(52) 休那般说,不当有。“饥时得一口,强如饱时得一斗。”(《老》A:19)

(53) 他是汉儿人,在东京城里住。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老》A:30)

例(52)(53)中,“得”是实义动词;例(1)-(15)中,“得”为助动词。从汉代起,“得”开始用于另一动词的后面,产生了“V得/不得(O)”格式,

“得”后置的句法位置是诱发其进一步语法化的内在句法动因。此后,表“获得”的“得”在“V得/不得(O)”句式开始变化,由“获得”义变为表示“动作结果或趋向的达成”。例如:

(54) 既恁这月初一日离了王京,到今半个月,怎么才到的这里?(《老》A:6)

(55) 那珠儿多大小?圆眼来大的,好明净。当的多少钱?当的二十两银子。当那偌多做甚麽?(《朴》A:224)

当表达成的“V得/不得(O)”格式用于未然或表假设的语境中,则可表示“能性”义。如例(55)中,“当的多少钱”,如用于未然语境,也可表示“能当多少钱”。

未然或假设语境中表能性的“V得/不得(O)”式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表达方式,久而久之,当其经常出现在未然或假设语境中时,原来由语境承载的能性义逐渐为“V得/不得(O)”式结构所吸纳,最终使得该结构成为能性义的负载者,这时专职化的“V得/不得(O)”式能性述补结构就产生了。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有些例子语义模糊,是表“能性”,还是表“达成”,存有歧义,这也正好可以证明我们的推论。例如:

(56) 今日些小淡薄礼。虚请亲眷。酒也醉不得,茶饭也饱不得。休怪。休这般说。不当。教恁尽一日生受。酒也醉了,茶饭也饱了也。(《老》A:39)

“醉不得、饱不得”是说“没有醉、没有饱”?还是说“不能醉、不能饱”?如是前者,则表“达成”,若为后者,则表“能性”,表义模糊不明。根据语法化的一般通则,一种旧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变为一种新结构,往往经历一个两解并存的中间阶段,这个中间阶段建立了由旧结构向新结构过渡的桥梁,即:A(旧结构)A/B B(新结构),所以,像例(56)这种语义模糊的例句可以看作是“V得/不得(O)”式述补结构从表达成向表能性语义演变的一种中间状态。

“在南北朝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动+得+动/形/主谓’,‘得’后带谓词性成分的用法促进了‘得’的虚化”^{[9]68}。与“V得/不得(O)”式的语法化模式一样,在最初的时候,“V得”后接表示结果或趋向的补语(C),构成“V得C”式述补结构,在未然或表示假设的语境中,或表示动作结果或动作趋向的“达成”,或表示“能性”。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有些例子同样具有歧义,表义模糊。例如:

(57) 俺怎麽敢买将去?不争将去时,连其余的马都染的坏了。(《老》A:34)

该句是表示“染的坏”这一结果“将要达成”，还是表示“能够达成”？语义模糊，甚至借助语境都不易区分。当然，这种未然语境中表能性的“V得C”式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表达方式，久而久之，当“V得C”式述补结构经常出现在未然语境中时，原来由语境承载的能性义逐渐为“V得C”式结构所吸纳，经过重新分析，最终使得该结构成为能性义的负载者，这时专职化的“V得C”式能性述补结构也就产生了。在该结构中，“得”用在动词和补语中间，是表达能性的助词。

综上所述，“得”的虚化是由表实在的“获得、取得”的引申意义开始的，由作为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能性”义，到作为半自由动词用于动词后表“能性”义，再到作为能性助词用于“V得C”式述补结构中表“能性”义，“得”字经历了由实到渐虚再到虚这样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二) “V得/不得”式能性述补结构渐趋衰退

从语料来看，在元明时期的北方话口语中，“V+得/不得”式能性述补结构应该是最为常用的。比如下面的例子：

(58) a 这孩儿几个月也？九个月了，会爬麼？爬得。(《朴》A:277)

b 这孩儿几个月了？九个月了，会爬麼？会爬了。(《朴》B:377)

例(58)a中，问话人采用了能性助动词“会+谓”的格式(会爬)，而答话人不予理睬，仍然使用“V得”式惯用格式(爬得)，可见，在元明时期的北方话口语中，“V得/不得”式是惯用格式。但自清代以降，该格式在能性表达句中的使用频率逐渐变小，渐趋萎缩。在清代语料中，我们发现一些原用“V得/不得(O)”式的句子已改为一般动词。例如：

(59) a 如今卖的多少？(《老》A:29 | 《老》B:79)

b 如今卖多少？(《老》C:131 | 《老》D:181)

清代语料中，还有一些句子用能性助动词来替换“V得/不得(O)”格式。例如(58)b中，答话人就不再使用“V得(O)”式惯用格式，而是随着问话人采用能性助动词“会+谓”的格式。而除了“会”之外，还使用“得”等能性助动词。例如：

(60) a 每日这般用心弄他时，虫子怎麼蛀的？(《朴》A:284)

b 你们若依我这般用心收拾，虫子怎麼得蛀呢？(《朴》B:382)

此外，我们发现在清代语料中，还有不少句子以“V得/不C”式能性述补结构替换掉原“V得/不

得”式结构。例如：

(61) a 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老》B:P57)

b 我这朝鲜话，只可在朝鲜地方行得去。(《老》C:108 | 《老》D:159)

(62) a 姐姐，我看上你，饭也好生吃不得。(《朴》A:261)

b 姐姐，我自从看上了你，饭也好生吃不下。(《朴》B:368)

例(61)(62)中，a句中的“行的”、“吃不得”在b句中分别改换为“行得去”、“吃不下”，因此，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由元末至清末，“V得/不得”式能性述补结构逐渐衰退，相应的，“V得/不C”式能性述补结构和一些能性助动词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大。

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语义表达准确，使社会交际顺畅进行，是其社会属性的必然要求。但是“V得/不得(O)”式结构在表义上存在一定歧义，表“能性”还是表“实现”有时很难分清，语义负担过重，这必然影响到社会交际的顺畅进行。在语言实践中，说话人自然会优先选用表义清晰明了的表达手段，因此，“V得/不得(O)”式在与其它能性表达手段的竞争中落败，从而渐趋衰退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

参考文献：

- [1] 汪维辉.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 李泰洙. 《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3, p94.
- [3] 刘公望. 《老乞大》里的助词研究(上) [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2): 90-94.
- [4] 王森. 《老乞大》、《朴通事》里的“的” [J]. 古汉语研究, 1993(1): 80-84.
- [5] 朱丽芳. “得”的语法化过程在《朴通事》中的体现 [J]. 现代语文, 2007(8): 41-42.
- [6]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7]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8] 吴福祥. 粤语能性述补结构“Neg-V得OC/CO”的来源 [J]. 方言, 2005(4): 306-318.
- [9] 力量, 肖应平. “得”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 [J]. 北方论丛, 2006(1): 67-70.

[责任编辑: 吴晓红]

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崛起之路

魏三强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信息系, 安徽 宿州 234101)

摘要:采用市场调研法和抽样统计法,对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针对安徽动漫广告产业发展中现存的问题:市场规模较小、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创新的能力不强,提出了推动其发展的具体策略:科学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注重原创,打造动漫广告品牌;开拓市场,丰富媒体传播手段;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专业人才;规范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它对于推动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新崛起、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安徽绿色 GDP 成色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动漫广告;安徽;动漫产业;崛起之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89-04

The rising road of Anhui's animated advertising industry

WEI San - qiang

(Computer Information Department, Su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Suzhou, Anhui 234101, China)

Abstract: Using market research method and sampling statistics,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predicts Anhui's animated advertis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Anhui's animated advertising industry such as the market on a smaller scale,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weak innovative cap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pecific strategies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scientific planning,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strength; emphasizing the original, advertising animated brand; expanding the market, enriching the means of mass media; enhancing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 - train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standardizing the supervision and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is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driving the new rising of Anhui's animated advertising industry, to promoting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construction, to serving Anhui'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o upgrading Anhui's green GDP quality, etc.

Key words: animated advertising; Anhui; animated industry; the rising road

动漫广告产业是新兴的文化产业,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动漫广告产业显现出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势头,被誉为发展潜力较大的朝阳产业,将成为新的绿色 GDP 增长点。在中国动漫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之下,全国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并相应制定了动漫产业发展的规划。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十二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动画产业、漫画、游

戏、数字内容等产业,构建相互支持、齐头并进的动漫主导产业发展体系,重点发展动漫影视作品的创作、生产、出版和播映等领域的产品生产和服务。”这为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取得一定发展成就的同时将面临诸多现实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安徽动漫广告产业一直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之中?此崛起之路非常值

收稿日期:2012-12-1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校企合作的宿州特色文化动漫宣传片的开发研究”(KJ2012Z405)资助

作者简介:魏三强(1980-),男,安徽宿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动漫设计与制作、多媒体技术。

得去探讨。

一、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现状

安徽是文化资源大省,历史底蕴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创意之源,为动漫广告创作和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素材。安徽已经建立芜湖与合肥两个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以及马鞍山、淮南与池州三个省级动漫产业基地。这些基地的建设较大提升了安徽动漫的原创水平,推动了安徽动漫产业的迅速发展^[2]。目前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尚且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喜忧参半。

(一) 安徽动漫广告的传播现状

动漫广告一般是指包含动漫元素的广告,是动漫技术与艺术在现代广告中的应用,是现代动漫产业与广告产业相结合的产物。当动漫遇上广告,新的传播格调浮出水面,给人一种新鲜的视听享受^[3]。动漫广告的分类如下:(1)按照创作技术分:二维、三维、二维和三维组合型动漫广告;(2)按照传播媒介分:网络、影视、平面、手机动漫广告;(3)按照宣传内容分:企业、产品、城市、学校、公益动漫广告;(4)按照制作类型分:纯动漫型、组合型动漫广告;(5)按照角色风格分:写实、写意、装饰、漫画、儿童风格动漫广告。动漫广告和传统广告相比所具有的独到优势是:时尚性、魅力性、夸张性、主动性。调查的数据表明,在动漫市场受众当中,“90后”群体约占45%;“80后”群体约占25%;“70后”群体约占20%;其他群体约占10%(如图1所示)^[4-5]。随着动漫的主要受众“90后”群体逐渐成为动漫消费市场的主体,动漫广告作为一种更时尚、更低廉、更富含视觉文化、更具艺术魅力、更能吸引眼球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成为广大消费者青睐的宠儿^[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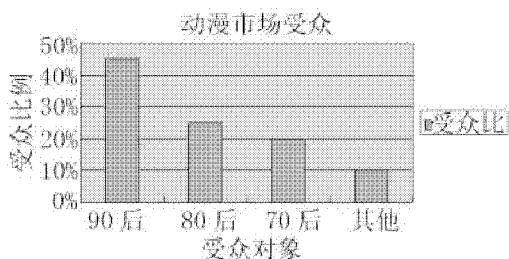


图1 动漫市场受众比例调查数据图

目前动漫广告主要在电视和网络上传播。2010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培爱教授对国内动漫广告传播现状进行了抽样统计和内容分析。

研究电视动漫广告的发现是:中国动漫广告在影视广告中所占比例约是17.90%,比例较小,市场规模不大;动漫角色广告约占所有动漫广告的45%,动漫产品广告约占所有动漫广告的55%;2008年电视动漫广告的经营额约是100.3007亿元,2009年约是107.2381亿元,年增长率约6.92%^[7]⁵³。研究网络动漫广告的发现是:2009年国内网络动漫广告约占网络广告总数的16.98%,略低于电视动漫广告的播出比例^[4]。运用陈培爱教授的研究方法,笔者及团队对安徽卫视、安徽影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安徽台家家购物、安徽动漫频道等五家电视影视广告的播出内容进行了抽样统计与数据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在2011年10月1日~2012年9月30日期间,安徽的动漫广告涉及汽车、服务、家电、数码等行业,以儿童用品、医药品、食品等为主;安徽动漫广告在影视广告中所占比例约是16.83%,比例较少;动漫角色广告约占所有动漫广告的39.72%,动漫产品广告约占所有动漫广告的60.28%;组合型动漫广告约占所有动漫广告的83.39%,纯动漫型广告约占所有动漫广告的16.61%(如图2所示)。

(二) 安徽动漫广告现存的问题

1. 市场规模仍然较小。2010年,中国动漫市场的规模高达208亿元,相比2009年增长22.4%,预计到2012年将突破320亿元^[8]¹⁵⁸。在国产动漫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态势下,2012年安徽动漫广告产品创作的数量相比2011年虽然有了大幅增长,但是投放市场播放的产品仍然较少,传统影视广告依旧占据安徽总广告数量比例的80%以上,安徽动漫广告的市场规模不大。

2. 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从2006年至今,国务院、文化部和安徽省文化厅纷纷出台了一些扶持动漫产业的政策,一方面鼓励动漫投资,另一方面为动漫建设良好的播映氛围。在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把广告列入了第一梯队的重点文化产业,动漫广告产业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在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十二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中,又加大了对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专项资金扶持力度。但是在动漫广告的市场运营中,安徽动漫广告产业融资渠道不畅,动漫广告创作的投资金额仍然不足,动漫广告的市场盗版现象较为严重,这些不利因素制约了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3. 创新的能力不强。时下安徽动漫广告的创作水平虽然较往年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产品整体创

作的质量及创新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在安徽省内专门从事动漫广告创作的专业人才数量还偏少,整体水平还偏低,专业人才的积累数量和培养质量还不能满足动漫广告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一些动漫广告产品因制作的质量问题而缺乏市场竞争力;一些动漫广告产品仅靠模仿或盗版制作,因为无任何创新,所以投放市场的范围极为狭窄,生命力极为短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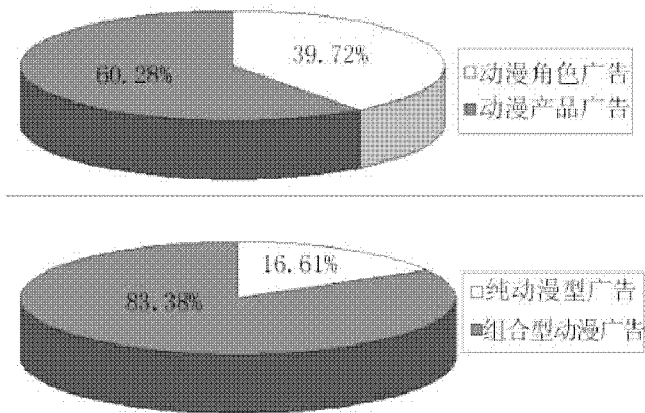


图2 动漫广告分类对比图

二、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趋势

从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广告业的发展趋势分析,都预示动漫广告产业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依靠有效的传播途径和完美的市场运营,那些优秀的动漫广告产品将给制作商、广告商、广告主三方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有学者认为:“在未来动漫广告将无处不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路盛章教授认为:“运用动漫手法创作的广告数量将逐年上升”。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培爱教授认为:“动漫广告必将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孙立军教授也表示:“目前国内采用动漫手法与动漫思维制作的广告,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有许多专家预测:“未来10年我国的动漫广告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7]153-58}。

通过市场调研与材料整理的结果,笔者及团队对安徽动漫广告产业发展的趋势预测如下:(1)随着安徽省动漫产业的整体发展,动漫广告在安徽影视广告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逐渐增大,它的应用范围将越来越广泛,安徽动漫广告的市场前景一片光明。(2)动漫植入安徽影视广告中的数量将逐渐增多,动漫形象代言人的队伍也将越来越庞大。(3)在新型媒体领域,动漫广告在安徽各大网站中的应用将趋于普遍;在汽车的移动电视、公共场所的液晶大屏幕上,以及在手机、掌上电脑等移动终

端领域,专门为其“量身定做”的定投式、精短式动漫广告将逐渐流行^[9-10]。(4)安徽动漫广告的创作、研发、营销团队的数量将逐年增多,“高质量”、“新创意”、“高收益”的动漫广告将是安徽动漫广告产业自主创新、精益求精的发展目标。(5)预计在未来10年内,安徽动漫广告在影视广告中所占比例将逐年递增,预计到2017年,所占比例将达到20%;到2022年,所占比例有望突破25%(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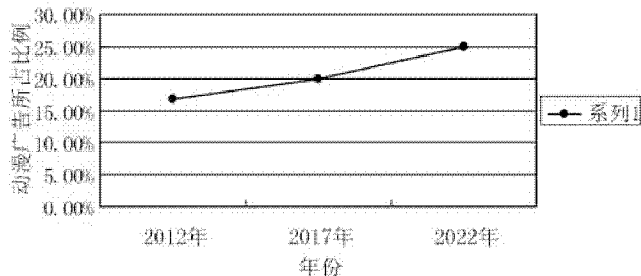


图3 未来10年安徽动漫广告发展趋势预测图

三、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策略

动漫产业的整体发展是动漫广告发展的首要前提,动漫产业的发展和动漫广告的发展具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双交叉”关系。中国动漫产业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动漫企业与动漫品牌,动漫企业实现了“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有到优”的转变。部分动漫企业开始上市融资,中国动漫产业链日益完善。国产动漫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8]158}。由中国原创的部分优秀动漫作品甚至“走出了”国门,赢得了国外市场的好评,充分展现了中国原创动漫在国际动漫大市场上新崛起的价值与地位。

安徽动漫广告产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国内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在国家动漫广告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结合安徽的实际,寻找一条具有安徽特色的、最适合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科学发展的道路。在促进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发展中,不宜单一维度地进行规划,务必实现动漫广告和动漫产业间的相互依托、影响与关联。应从两者共赢的战略角度思考,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方法原理,着力培育其共同的市场竞争力^{[7]156-58}。

(一) 科学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国家、安徽省相关部门应适时制定促进动漫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规划,适当调整动漫广告产业的整体布局与发展结构;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动漫协会在设立安徽省动漫大赛作品大奖时,应将动漫广告作品列入评奖范围;安徽各地政府应科

学制定本地动漫广告产业的保护性政策,在动漫广告企业用地、税收、资金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二) 注重原创,打造动漫广告品牌

原创动漫广告作品是动漫广告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安徽动漫广告的发展,应首先鼓励生产原创动漫广告。原创水平越高,商业价值就越可观。充分利用安徽区域特色的本土文化,如美食文化、历史文化、艺术文化、赏识文化等,大力发展动漫广告原创。政府部门专为动漫广告产业设置“原创动漫广告扶持资金与发展基金”,执行原创动漫广告奖励政策,着力打造安徽特色的动漫广告品牌。

(三) 开拓市场,丰富媒体传播手段

努力开拓安徽动漫广告的市场,吸引省外大、中型的动漫广告企业来皖生产和运营;充分发挥安徽文化资源的优势,在“引进来”的同时加快安徽省动漫广告产品“走出去”的步伐。丰富媒体传播手段,强调多样化的媒体传播样式^[11]。创作的动漫广告,除了利用主要的电视媒体进行传播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手机、掌上电脑等媒体投放。

(四) 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专业人才

动漫广告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大量的动漫广告专业人才。如何培养高端技能型的动漫广告专业人才,已成为学校与动漫广告企业共同的任务。笔者建议:应加大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力度,校企共同培养动漫广告专业人才;推行“校中厂、厂中校”与“院中园、园中院”动漫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改革与实践^[12],在全省推广“安徽建筑工业学院艺术学院与安徽樱艺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与合肥华耀传媒有限公司”等校企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做强做大安徽的国家级、省级动漫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校企合作研发高质量的、原创型动漫广告产品,共同服务安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五) 规范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以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主,加强对动漫广告监管的研究,尤其是对安徽动漫广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动漫广告衍生产品的监督;与安徽省文化厅等职能部门共同出台管理规则,对全省的动漫广告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规范监管^[13]。地方政府和责任部门应出台相关的保护政策,协助动漫广告企业或个人进行版权登记、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等;应建立健全较为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坚决打击盗版与侵权,为动漫广告企业/个人工作室

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四、结语

动漫广告是时代进步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与传统的影视广告相比,它有其独到的优势。若动漫广告的创作、运营、推广得当,它将为动漫创作商、广告商、广告主三方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目前安徽动漫广告产业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探索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崛起之路,找到一条具有安徽特色的、最适合安徽动漫广告产业快速、良性发展的捷径,它对于推动安徽动漫广告产业的新崛起、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安徽绿色 GDP 成色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安徽省文化厅. 关于印发安徽省“十二五”时期动漫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EB/OL]. <http://www.amtc.cn/show.aspx?id=6699>, 2011-05-11.
- [2] 魏三强,朱水源. 皖北地区动漫产业发展现状与推进策略[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112-115.
- [3] 饶丽娜. 动漫广告:跨越传统的新生代[J]. 传媒, 2006(3): 49-50.
- [4] 张瑞静. 中国动漫广告传播的历史与现状[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79-83.
- [5] 魏三强,侯舞阳. 动漫宣传片在地方特色文化宣传中的独到作用[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128-130.
- [6] 吴来安. 新媒体背景下的中国动漫广告研究现状分析[J]. 新闻大学, 2011(3): 110-115.
- [7] 陈培爱,罗奕. 我国动漫广告产业的新崛起[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54-61.
- [8] 范周,储钰琦. 中国动漫产业浮华背后的忧思[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53-58.
- [9] 张瑞静. 中国动漫广告发展浅析[J]. 新闻界, 2010(4): 158-160.
- [10] 陈滨,许新国. 卡通形象在电视广告中应用的艺术表现研究[J]. 装饰, 2012(3): 137-138.
- [11] 黄琼,李正良. 强媒体下湖南广告产业发展的路径探析[J]. 新闻知识, 2011(9): 54-56.
- [12] 魏三强,陈秋. “园中院、院中园”动漫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92-97.
- [13] 余霖. 动漫广告监管的思考[J]. 新闻界, 2011(4): 114-116.

责任编辑:吴晓红

艺术歌曲的民族性素材与时代性审美情趣

——王安潮艺术歌曲研究

杨伟民

(广西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系, 广西 桂林 541002)

摘要:王安潮在其中国民族风韵艺术歌曲的探索中,以古典音乐手法的合理运用、地域性音乐素材的有效融会、时代性音乐语汇及审美情趣的巧妙结合等个性手法,在共性的民族化音乐思潮洪流中,以其切身的感悟创作出大量旋律优美、结构精致、民族韵味浓郁的雅俗兼具的艺术歌曲。认为,他在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中或将留下其个性化身影。

关键词:中国艺术歌曲;艺术歌唱;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J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93-04

National materials and epochal aesthetic tastes of art songs

——Research on Wang Anchao's art songs

YANG Wei - min

(Department of Music, Guilin Normal College, Guilin, Guangxi 541002, China)

Abstract: In his exploration of art songs of Chinese national style, Wang Anchao has created out of the common trend of nationalized musical thoughts a large number of refined yet popular art works of beautiful melody, delicate structure, dense national flavor via his personality styles of reasonable use of classical techniques, effective fusion of regional music materials, and clever union of contemporary music notes and aesthetic tastes, as well as his own feelings. Consequently, the paper holds that he is inclined to leave his own ma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songs.

Key words: Chinese art songs; art songs; nationalization

中国自古就有歌舞的传统,其中的歌曲创作伴随着古代歌舞之乐之兴盛而不断发展,产生了大量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博得历代文人雅士的侧目!《阳关三叠》、《杏花天影》等名垂于乐史并为当代中外歌唱家所喜爱的事例就是佐证。在近代中国乐史的“新音乐”发展背景下,西方艺术歌曲创作手法的传入,使得西欧范式的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手法得以快速发展。其中,顺应时势而推进其民族化音乐手法的探索,成为潜藏于内的中国当代作曲者的传统,但这一传统还要求其创作手法适应和融入时代审美的特点。尤其是近年来,以徐沛东、印青、赵季平等既高雅又易懂的新型艺术歌曲创作风格艺术家的涌现,一大批既有雅韵、深境又有亲和、博

众的艺术歌曲已成为雅俗共赏的舞台宠儿。《乡音乡情》、《西部放歌》、《大江南》等作品的广为传唱说明此类艺术歌曲的社会价值。其成功除了恰当地运用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和观念外,地域性的民族音乐素材和时代性审美情趣的融会也是其博得喝彩的因子之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艺术歌曲创作的热潮之中,大量青年作者以其个性的手法在这一大潮中也占得一时之势,成为当代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品虽没有大作家的磅礴气势和娴熟技术,却有着小家碧玉般的精巧与亲和,王安潮的艺术歌曲创作即可视为此种。

和优秀的艺术歌曲所具有的品质一样,王安潮的艺术歌曲也具有“诗与音乐的结合”、“良好的和

收稿日期:2012-02-1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重点项目“五项全能音乐教育理念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可行性研究”(GLA102043)资助

作者简介:杨伟民(1964-),女,广西桂林人,广西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音乐系教师,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声乐艺术

声和节奏衬托作用的伴奏”、“结构短小精致”、“内容丰富”、“较高技巧与艺术修养”^[1]等特质。除此之外,他在民族化、时代化、个性化的艺术歌曲的探索中还发展出如下的一些特点:恰当借鉴古韵而发展的人工音阶、合理融入地域性音乐素材、恰当结合时代性审美情趣等。这些风格和手法因其触手可及的亲力和不乏亮彩的技术创新而博得认可,因其旋律线条及其走向特别适合于歌唱技术的发挥,其对比手法的恰当又特别适宜于情感情绪的宣泄而博得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歌者的喜爱。因此,特此撰文以析,拟向同仁们推介。

一、古典音乐素材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音阶是当代作曲家创作古典题材的
慢而幽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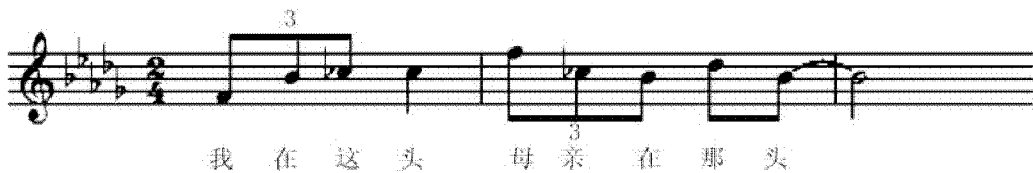
例1

例1中因基本对仗的上下句歌词意境表现的需要而采用了非对称的上下乐句。前句主要采用平缓的旋律走向,旨在提起意境之像(古人、古境、古诗的镜像);后句应对前句,采用“同头换尾”的乐句发展手法,但对音乐旋律的走向增大了起势的幅度,它旨在引入波澜的愁绪,是音乐变化的推展;前句引入雅乐音阶的 $\sharp Fa$ 偏音,后句引入俗乐音阶的 $\flat Si$ 偏音,上下句以人工八声音阶将古典意境和怀古忧思跃然纸上。这个“八声音阶”技术的使用除了情绪的渲染外,还有引入变换中心音游动的作用,其游动具有将“愁思”进一步“加重”作用。这个八声音阶以“角一羽”的动力性趋向为主干走向,将色彩性变化音($\sharp Fa$ 、 $\flat Si$)以经过音的手法引入,符合于中国音阶以五

重要参照点,如宋代姜夔自度曲中所使用的雅乐与俗乐音阶^[2],使得今人听赏其作品时能感受到古雅的音调美。但很多作曲家在使用这些古代音阶时都会做些个性化的变化,这就产生了以古代音乐素材产生的人工音阶,其技术核心的基础是古今音乐创作手法的融合。这些新音阶的特色,除了赋予音调特有的色彩音响外,还具有突出语调、字调固有线条之美的利好,并能与中国的腔词韵律相合,至此,古韵实现今展。王安潮创作的《烟波江上》(王安潮词)取材于古诗句“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情景和情绪,描绘了今人矗立烟雾与飞雪弥漫的江边码头,遥想古人、古境、古诗而产生冥想性的愁思。作品融会古代音调技术而以八声音阶(加 $\sharp Fa$ 和 $\flat Si$)来架构旋律,形成具有今人审美特点的古乐与古韵(见例1)。

声为主的结构的传统思维特点。

采用古乐音阶的色彩性来营造新的音乐意境的手法在《卢沟晓月》(慕容子敬词)和《乡愁》(余光中词)、《再别康桥》(徐志摩词)、《五月的夜晚》(王安潮词)等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其间略微不同,如《乡愁》以“愁”字为点,采用了不断游走的中心音为依托,从而引领变化音的产生,而《卢沟晓月》以强调偏音的非传统手法来“加重”古韵的悠长,《再别康桥》以偏音的动力性来加强离调所产生的惆怅情绪。尤其是《乡愁》中,旋律中运用 $\flat Si$ 的下行悲叹性音调走向,将旋律线条中的动力性予以综合,形成下沉的旋律走向(见例2)。



例2

以古音阶的现代综合运用作为古韵呈现的直观手法,王安潮以此而使其艺术歌曲的创作在表情达意上更为简洁,以古法托古意,古代音乐技法得以表现今天审美所需要的风韵。此外,王安潮的艺术歌曲创作还借助于句调、字调的走向对其中蕴含古意进行了情境化塑造,这些手法使王安潮古意题材的作品在手法上较为简明,在个性特色上较为突出。

二、地域性音乐素材的融入

突出地域音乐文化成为近年来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探索重要手法之一^[3],但每位作者会根据

自己的文化修为和作品表现的需要而选择特性的使用地域音乐素材,这使得当下的艺术歌曲民族化探索之路显得更为风格迥异、绚丽多彩、五彩缤纷。王安潮的艺术歌曲创作中所运用的地域性音乐素材主要来自于他所生长的皖西和所工作的皖南等地区,但由于在运用上手法变化多样,从而使其音乐色彩多变,并富有现代气息。

为徽州古村落所写的《古老的村庄》(王健词)以黟县的哭嫁歌谣为音乐素材,在平稳的旋律线条中间插四五度的音程跳进,尤其将迂回婉转的皖南音调巧妙地融入其中,哭嫁歌的幽怨曲调及其所特有的蜿蜒走式的

旋律线条使得作品音调在平稳之中不断透露出回合婉转、悠远深情的地域性风韵。此外,作品依据现代审美

需求而进行了规整化的起承转合式的段落架构,这就又使得其民间音调具有了现代气息(见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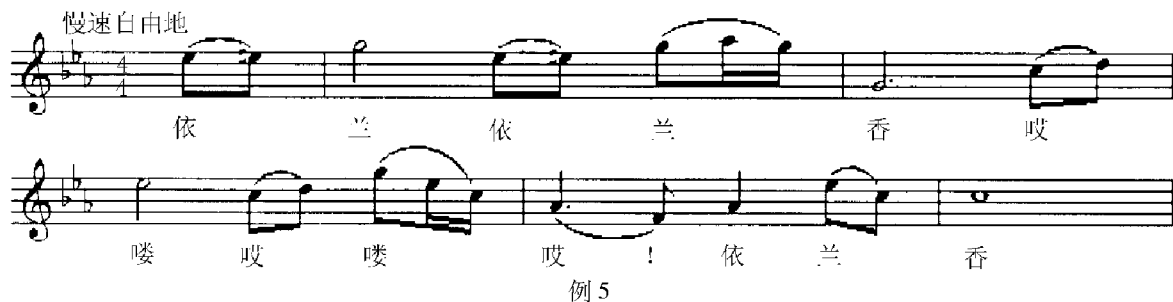
为芜湖十景而创作的《镜湖细柳》(佚名)中的歌唱段落也可算是一首较为独立的艺术歌曲。其音乐素材选自芜湖民歌,五声性的旋律构造以级进音程为

主,婉转的音调加上衬词的过渡,使得旋律中心音游移不定^[4],歌曲以“移步换景”的手法,以悠然自得的情韵描写了江南小城旖旎的风光(见例4)。



以皖西地区的地域性音乐素材创作的艺术歌曲有《和谐古城》、《楚风汉韵》、《飘香的古城》等,以淮南地区音乐素材创作的有《煤城咏唱》等作品。这其中,皖西大别山的“慢赶牛”和“四句推子”、淮南拾煤号子等地域性民间音乐曲调被运用其间,使其作品具有了风格指向性。当然,王安潮

的民间音乐素材选择也有安徽以外的,如《西双版纳依兰香》(虞雯琴词)中就应歌曲艺术风格的表现需要而选用了西南民间音乐音调素材,在音阶上采用宫音与升高宫音同时使用的手法,在旋律进行上采用强调下属音而产生的离调感等手法,都使得这首作品满盈西南音乐地域风情(见例5)。



地域性音乐素材的融入不仅使艺术歌曲风格的色彩指向性更为明确,也使作品很容易博得普通乐迷喜爱,亲和力与艺术性的双效品质促使作曲家们对此多愿意着力为之。王安潮的艺术歌曲创作善于抓住地域性音乐的核心素材,如旋律音阶的特征音、旋律进行中的典型手法、结构发展中的特性规律、音程关系及其结构方式等,对这些音乐特性技术的把握使其作品披上了地域音乐文化标识的外衣,不仅为乐迷所喜爱,而且成为地域性文化建设的对象,成这些作品成为各地文化节、旅游节的标志性文化名片。

三、时代性审美情趣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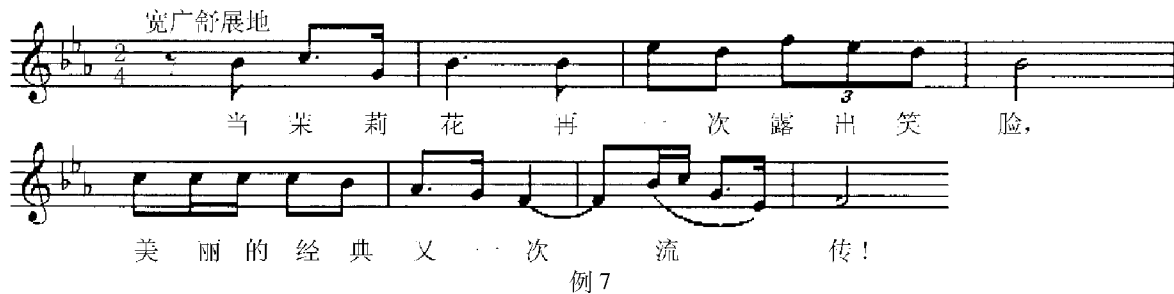
时代的审美情趣是艺术品创作的必要取向之一,也是艺术歌曲这一音乐体裁重要倚重点之一^[5],这一观念从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近代作曲家即已开始。但不同时代的审美迥异,而每个作者的感悟也千差万别,这就为艺术歌曲的时代性披上了迷彩的斑斓外衣。王安潮的艺术歌曲创作也较好地结合了时代审美情趣,其手法以律动、音型、句式等不同形式及其组合进行了个性发展,对其作品进行了时代审美情趣的融合索。

以轻快的节奏律动呈现新时代年轻人的性格特点在艺术歌曲的时代风貌展现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王安潮的创作也很好地将这一手法,使其艺术歌曲的律动变化丰富。它或采用律动对比的手法,或采用统一的律动贯穿手法,或采用两种手法的结合。如《离开小岛》、《七月七的葡萄酒》、《西双版纳依兰香》等。

《西双版纳依兰香》在首段的慢板悠长律动的抒情陈述之后,音乐的律动变换为轻快律动的小快



将宽广的交响性乐思纳入到时代性音乐的发展手法中也是艺术歌曲的音型产生了新的表现幅度,王安潮的很多艺术歌曲较好地发展了这一时代性审美情趣,他在作品《百年茉莉》(王安潮词)、《太行情思》(佚名词)、《风景》(周龙然词)等作品充分利用音型的现代性特点,运用交响性的音型来谋求艺术歌曲表现的浓烈效果。如《百年茉莉》以普契尼运用中国民歌《茉莉花》曲调创作歌剧《图兰朵》百年后的回响为文化背景,将茉莉交响的思维纳入到音



中国艺术歌曲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将民族性音调和音型的现代发展作为其核心艺旨,为这一体裁贡献了中国的语汇^[6]。这一探索过程中,不同的曲作者以其个性的发展为这一艺术大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王安潮作为这其中的探索者之一,已产生了三十余首有一定影响的艺术歌曲。笔者在与其深入交流中,逐步感受到他以古典音阶结构技法的合理运用、地域性音乐素材的有效融会、时代性音乐语汇及审美情趣的巧妙结合等个性手法,以此认为他在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中或将留下其个性化身影。他与中国千万艺术歌曲作者一样,在共性的民族化音乐思潮洪流中,以自己的感悟创作出旋律优美、结构精致、民族韵味浓郁的艺术歌曲新作,装扮着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的大厦!

板,以配合来逐一“叙述”依兰香的诸多品格,大跳的音程在快速律动的推动下,使音乐的情绪顿时欢悦起来。作品还在间奏中很好地取材慢板的音乐素材进行集中呈现(音型密集),用以连接随后的跳进音乐材料乐段,与律动一起形成情绪上的对比(见例6)。而《七月七的葡萄架》用统一律动贯穿的手法,轻快的律动将中国情人节中葡萄架下约会中的幽默情趣与欢悦心情以轻松的情绪渲染出来,也将新时代年轻人的美感追求展露出来。

型的构造中。如音型中以附点与三连音为主,将大开大合的句式作为音乐架构的基础(见例7)。还以此形成交响性乐思的基础,结合伴奏的三连音贯穿音型的铺衬,给听者呈现现代交响的音型特点。这一作法在提升了艺术歌曲表现幅度的同时,也探索了它时代性音乐审美情趣。这种手法在《风景》、《五月的夜晚》等纪念类题材的作品中均有体现,以特性音型为核心素材,以大开大合的句式为基础,王安潮的艺术歌曲注入了时代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 [1] 廖辅叔. 从艺术歌曲的定名说起[J]. 人民音乐, 1999(9): 14—15.
- [2] 夏野.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9: 123—126.
- [3] 李冬梅. 论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歌曲的民族性特征[D].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3.
- [4] 杨昌永. 民族管弦乐《镜湖细柳》解析[J]. 镇江高专学报, 2012(4): 107—110.
- [5] 叶林. 艺术歌曲的发展问题[J]. 人民音乐, 2000(8): 5—7.
- [6] 冯光钰, 薛良. 20世纪中国歌曲创作之回顾[J]. 中国音乐, 1996(2): 1—4.

[责任编辑: 吴晓红]

情感唤醒视角下的研究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研究

赵海萍

(太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太原 030024)

摘要:根据写作自我效能感理论,以42名文科非英语专业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而后访谈的方式,发现了影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的情感因素,设计情感唤起策略并实施后,再次进行问卷统计,得出有效情感唤起策略的排序为真实写作任务、目标教学法和替代性学习经验。

关键词:情感唤起;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097-03

Study of English writing self – efficiency of non – English major gradu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arousal

ZHAO Hai –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nglish writing self – efficiency, explores the affective arousal elements in influencing non – English major graduates’ writing self – efficiency by studying 42 non major graduates via bot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 shows that authentic writing task assignment, a goal – orientation teaching method and alterna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are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arousing non – English major graduates’ affection and subsequently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writing self – efficiency.

Key words: affective arousal; English writing self – efficiency; non – English major graduates

自我效能理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阿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其核心概念自我效能感被班杜拉定义如下:“学生对自身应付特定学业问题的能力以及从事相应学习活动可能达到的完善程度的评价,它涉及的是学生对自己学业学习能力的自信程度。自我效能是一项重要的情感因素,它决定着人们在活动中能付出多大的努力,以及面对困难能坚持多久等等^[1]。”写作自我效能感以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指的是“成功使用英语写作技能的自我判断和成功完成写作任务的自我效能判断^[2]。”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过程:1)选择过程,2)思维过程,3)动机过程,4)身心反应过程。在选择过程中,学习者选择能驾驭的环境以逃避挑战;在思维

过程中,学习者设定目标,并对结果进行归因;在动机过程中,学习者决定在面对困难时要不要坚持;在身心反应过程中,学习者表现他们的焦虑和抑郁。可见,以上四过程均涉及情感因素。

国外关于写作效能的研究大多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国内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研究其与性别、英语成绩和汉语写作效能感水平的关系,另一类就是研究它的作用机制即写作策略的选择问题。涉及情感因素的研究非常少。此外国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高职、高专、本科生和高中生,尚未发现针对研究生写作自我效能的相关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发现研究生写作自我效能中涉及

收稿日期:2012-12-10

基金项目:太原科技大学研究生教改课题(20112013)资助

作者简介:赵海萍(1976-),女,山西寿阳人,硕士,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的情感因素以及涉及实施有效的情感唤起策略。由于本课题的前期成果已表明文科生的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理科生^[3],故本次实验选取太原科技大学哲学所、思政部和人文社会科学三个文科专业的42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中的量表结合Shell(1989)设计的量表^[4]和教育部颁发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制得。包含12个项目,其中5个涉及写作技能自我效能感,7个涉及写作任务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likert五级记分制,每题有五个选项,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被赋予1~5的分值,分值越大,效能感越高。为了解决和保证本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正式测试之前随机抽取30名被试进行了试测,问卷a系数为0.847,大于0.8,故本问卷有较高信度(见表1)。笔者于2011年11月,在新生入学两个月对研究生阶段英语学习形成较全面认识后进行了第一次实测。测得的结果结合访谈作为设计情感唤起策略的依据。实施策略后,于2012年5月研究生阶段英语课程结束之前进行第二次实测,比较两次实测结果,总结出较有效的情感唤起策略。

表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统计表

因子	内容	MEAN1	SD.1	MEAN2	SD.2
写作技能自我效能感	1. 我熟悉并能正确运用本专业领域的专有词汇。	2.114	0.312	3.876	0.456
	2. 我能写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文章有次序地表达一些学术观点,并有效使用启、承、转、合连接手段。	4.008	0.307	4.332	0.315
	3. 我能判断任务文章所需的最佳体裁。	1.998	0.332	3.467	0.321
	4. 我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调整文体,写出适合即时情境的文章。	1.776	0.335	3.105	0.387
	5. 我能在一般写作或应用文写作中恰当地使用不同的写作技能。	2.113	0.347	3.651	0.872
写作任务自我效能感	6. 我能描述个人经历、发生的事情、读过的故事、看过的电影、喜怒哀乐等情感。	4.221	0.887	4.557	0.487
	7. 我能为将要参加的学生研讨会撰写发言提纲。	1.223	0.221	4.336	0.271
	8. 我能写出和回复个人或学术机构发出的邀请函。	1.443	0.258	3.413	0.554
	9. 我能就某个学术问题和同行在网上进行键谈式讨论。	1.887	0.553	3.884	0.774
	10. 我能为论文撰写摘要,且格式符合要求	2.003	0.442	4.661	0.554
	11. 我能写英语学术报告。	1.554	0.219	2.664	0.447
	12. 我能用英语写出有一定深度的学术论文,且做到格式正确,表达连贯。	1.334	0.187	2.665	0.776

二、讨论

从上表可以看出,均值低于2分的分别是技能效能感项目中的体裁($M=1.998$)和文体判断能力($M=1.776$)及任务效能感中的各种功能性文体的写作能力,如学术报告($M=1.554$),学术论文($M=1.334$)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学生的信心状况。结合对随机抽取的12名学习者(男、女各6名,三个专业各4名)的访谈结果,对学生情感因素的分析如下: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公式化导致学生写作八股现象突出,再加上大学阶段写作体裁单一,大多为议论文,学习者不需要判断文章体裁便可对写作策略进行选择,久而久之,丧失了文体和体裁判断的能力。

学生的新奇思想受自身词汇储备的限制,在表达方面面临困难;更重要的是,教师受旧有思维模式影响,倾向于不鼓励学生表达新异。

受师生比例限制,教师通常无法实现对所有学生的写作进行详细评价,评价的结果往往只粗略地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或是使用电脑评语,学生得不到个体性关注。这些均导致学生英语写作的

信心、能力和面对困难的态度等方面的负面反应。

大学阶段的写作任务大多是设计性的,真实的,即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写作任务很少。有的写作辅导用书甚至根据可能遇到的写作题材编撰了相对应的常用词和句型,学生只需对号入座即可。这种写作学习方式在研究生阶段受到了挑战:学生没有参加过英语的学术研讨会,没有写过、甚至没有阅读过与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和论文,撰写学术报告和论文也就无从谈起。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英语教师都是英语专职教师。他们的英语基础扎实,教学方法科学,但专业基础欠缺。他们完全胜任GE(General English)的教学工作,但学生如果拿着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英语写作问题去求教他们,往往无能为力。同样,学生如果去求教自己的专业老师,本专业的老师又会由于英语基础不够扎实再次让他们失望,久而久之,学生必然产生焦躁情绪。

针对以上访谈结果,实验组设定如下情感唤起策略:

真实性学习任务:写作自我效能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学习者选择能驾驭的学习任务。因大部分学生一年级就要参与到导师的项目研究,故可安排学

生每隔一周翻译自己从事研究的一篇摘要、或准备一篇报告的提纲、回复一封学术会议的邀请等,和本专业的同学讨论后提交英语教师并尝试最终发表和运用。除此之外,鼓励学生参与到各种网络社区中去,用英语尝试键谈式交流。网络交流的文本要求比较宽泛,可长可短,可以是专业相关也可以与专业无关,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会有反馈,这些反馈和发表的摘要必定给学生带来成就感,以便他们把英语写作纳入到能够驾驭的范畴中去。

目标教学法:写作自我效能的第二个表现是学生设定学习目标。目标设定之所以能唤起写作的正面情绪是因为他提高了作者的写作动机^[5]。戴键林曾考查过目标设定对写作效能的影响。结果发现“训练被试掌握明确而具体的写作策略的目标形式(过程目标),比起相对模糊而笼统的目标,更能帮助作者提高写作的自我效能^[6]。过程目标设定从5个方面入手:1)确定文章主题;2)产生观念;3)安排段落次序;4)写出主题句;5)写出支持性句子。教师在每单元的写作教学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项目进行培训;检查的过程要足够细化,避免把过程目标设定演变成产品目标设定;另外允许学生在众多策略中选择适合自己的策略。总之,如庖丁解牛般帮助学生分解写作任务以实现学生的成竹在胸。

多元评价法:第二个写作自我效能表现中涉及情感唤起的还有归因取向。教师可尝试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的方式相结合。每周的写作任务完成后,学生先把自评评语写在习作后,然后同组同学互评,教师可每周选一组同学做点评。教师的点评要手写,评分要针对上文中的5个方面尽量细化。这一策略能帮助学生正确归因,避免焦躁情绪。

零限制:英语写作效能的第三个表现涉及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学术要有创新就要允许畅所欲言。教师要容忍不同,对表达方式和形式亦要宽容。只有教师足够宽容,足够耐心,学生面对困难时才有更多坚持下去的勇气。

替代性经验:英语写作效能的第四个表现是关于学生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研究生已是心智发育完全的成人,单纯的无原则的言语劝说无法起到帮助他们摆脱负面情绪的作用。这里可设计从增加他们的替代性经验入手:选择基础较差的一个或几个学生着重培养,帮助其分阶段实现写作目标。如有困难可将阶段目标再次细化。其余同学会从同伴的进步中得到替代性经验,最终实现愉悦的写作体验。

2012年5月对同一组被试利用同样的量表进行第二次实测,结果如下:

被试在撰写功能类文体如为学术研讨会写的提纲和学术论文的摘要方面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最为显著(均值分别提高了3.113和2.658)。其次为进行键谈式交流和撰写、回复学术会议邀请函(均值分别提高了1.997和1.970)。排在第三位的是对专业词汇的掌握,体裁选择的能力(均值分别提高了1.762和1.469)。关于撰写格式正确,表达规范的学术论文的自我效能感排在第四位,均值提高了1.331。在以上提及到的7项中,离散型变化的排序为学术论文写作(0.589),学术邀请函写作(0.296),键谈式学术讨论(0.221),专有词汇掌握(0.144),摘要写作(0.112),学术研讨会发言提纲(0.050)和体裁选择(0.011)。7项中学术论文的均值变化最小,离散型变化最大。访谈后得知学术论文的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相对单项技能如摘要等,学术论文的效能提高要慢些,而且水平要参差些。在要求学生就以上五条策略按有效性排序后,结果显示处于前三位的分别是真实性写作任务(83%)、目标设定教学法(67%)和替代性经验(55%)。

三、结语

情感唤起策略贯穿英语写作自我效能实现的四个表现过程。本研究用问卷结合访谈的方式,分析了影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写作自我效能的情感因素,设计并实施情感唤起策略后,再次通过问卷和访谈对这些策略进行有效性排序,结果表明,真实性写作任务,目标教学法和替代性经验优于零限制和多元评价对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写作情感唤起有明显意义。

参考文献:

- [1] Bandura. A Self - 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191 - 215.
- [2] 唐芳,徐锦芬.大学生英语写作自我效能感调查与研究[J].外语界,2011(6):22-28.
- [3] 赵海萍.一项关于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67-69,75.
- [4] Shell D F, Murphy C C, Brunning R H. Self - efficiency and outcome expectancy mechanism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achievement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9, 81 (1) :91 - 100.
- [5] Locke, Edwin A, Latham, Gary P. A Theory of Goal Setting and Task Performance [M]. Ea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1990.
- [6] 戴键林,莫雷.目标设定影响写作自我效能的实验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2):62-64.

[责任编辑:吴晓红]

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现状研究

丁琦¹, 王后林², 方明¹

(1. 安徽农业大学 研究生院 教务处, 合肥 230036; 2. 安徽省教育厅 思想政治工作处, 合肥 230061)

摘要:近年来安徽省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上取得了较快发展和较好成绩, 积累了有益经验, 但在学科建设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问卷调查、座谈研讨, 认真分析了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现实状况, 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 现状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3) 02-0100-06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 in Anhui province DING Qi¹, WANG Hou - lin², FANG Ming¹

(1. College of Graduates, Dean's offic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2. Off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6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hui provinces have made fairly rapid development and good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 with beneficial experience. Ye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such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seminars and discussion, carefu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basic experience of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hui province,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and assumptions.

Key words: the discipline of Marxist theories; Marxist theories;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党中央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笔者在安徽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支持下于2013年1月对省内所有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9所高校(不包括军事院校)学科点建设情况开展了问卷调研分析, 并与部分高校学科点负责人、导师和研究生进行座谈。

调查表明近年来我省高校,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4号), 特别是2012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意见》(学位〔2012〕17号)等一系列文件的要求, 都能做到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 努力做好本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工作。各校学科点的建设取得较快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 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亟待改进之处。

本文以问卷调研的实证数据为依托, 深入分析

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现实状况、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和设想,希望借此能对加强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效果起到积极作用。

一、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现状

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二级硕士学科点的设立。2005年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单独设立为一级学科后,我省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取得快速发展,2006年一年内就有7所高校申请设立的16个二级硕士学科点、2个一级硕士学科点和3个二级博士点获批,占到当时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二级硕士学科点的66.7%、一级硕士学科点和二级博士点的全部。近年来,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工作整体推进速度明显加快,学科建设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既推动了我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

(一)从培养机构看,学科建设有较为具体而明确的培养依托机构

目前,我省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点的高校共有9所。其中2所高校设有二级学科博士点,4所高校设有一级学科硕士点(见表1)。

表1 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设立情况统计表

学科 所在高校	一级学科 博士点	二级学科 博士点	一级学科 硕士点	二级学 科硕士点
合肥工业大学	无	无	有	有
安徽大学	无	有	有	有
安徽师范大学	无	有	有	有
安徽农业大学	无	无	无	有
安徽医科大学	无	无	无	有
安徽工业大学	无	无	有	有
安徽财经大学	无	无	无	有
淮北师范大学	无	无	无	有
安徽工程大学	无	无	无	有
合计	0	2	4	9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的通知》(教社科〔2011〕1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意见》(学位〔2012〕17号)要求,目前我省多数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高校先后成立了独立的、直属学校领导的思想政理论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合肥工业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大学成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师范大学成立政治学院,安徽工业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和安徽工程大学也都成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尚未完全独立成二级机构的另外三所高校培养机构改革进程也在有序推进。

通过依托独立设置思政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为培养机构,可以有效地解决学位点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机构分离问题,既加强了领导、完善了管理机制,又有效整合了资源,为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也为促进我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发展提供的有力支撑。

(二)从建设成果看,学科建设近年来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我省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科建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据统计,2004年以来,省教育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项目共立项580多项,项目经费250万元。全省高校累计承担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项目1608项,累计投入科研经费97万元,发表论文2692篇,出版专著117部,提交研究报告48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5项。

近三年来,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共培养出博士36人,硕士578人,为我省高校培养输送了一批具有高学位学历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骨干教师。有关高校学科点在省教育厅思政课建设专项工程扶持下,三年来对全省高校1171名思政课教师和2371名高校辅导员开展了岗前培训、进修学习、专题辅导等,为我省思政教育队伍素质提升作出了很大贡献。

同时,学科建设研究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发表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专著,各校学科点承担了多项富于地方特色的、应用性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次承办了影响力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论坛和研讨会议。丰硕的研究成果及其广泛的影响,为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也为我省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三)从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队伍建设看,学科建设初步形成了梯次较为合理的学术团队

为了有效提高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各校学科点始终坚持以学术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的建设为抓手,遴选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师德师风好的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参与各学科点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骨干力量,其影响力和带动力已经初步显现。

总体上看,目前学术队伍共有 248 人,其中教授 95 人,占总人数的 38.3%;副教授 114 人,占 46.0%;具有博士学位(含在读)147 人,占 59.3%,硕士生导师 182 人,占 73.4%,博士生导师 28 人,占 11.3%,年龄在 30 岁-49 岁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共有 190 人,占 76.6%,梯队年龄结构较为合理(见表 2-5,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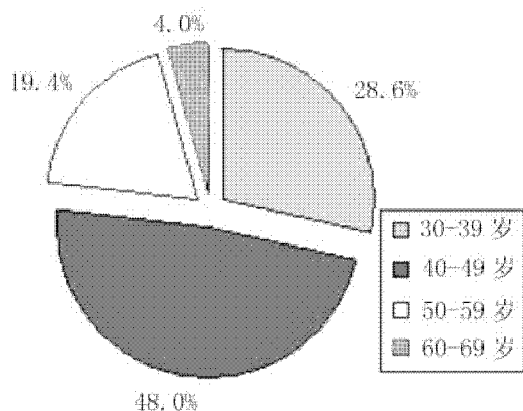


图 1 年龄结构比例图

表 2 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学术队伍年龄结构统计表

结 构 学 校	年 龄 结 构 (岁)			
	30-39	40-49	50-59	60-65
合肥工业大学	8	26	7	0
安徽大学	12	12	7	2
安徽师范大学	24	27	11	4
安徽工业大学	1	14	2	1
安徽农业大学	8	10	2	1
安徽医科大学	1	5	3	0
安徽财经大学	2	3	6	2
淮北师范大学	4	11	2	0
安徽工程大学	11	11	8	0
合计	71	119	48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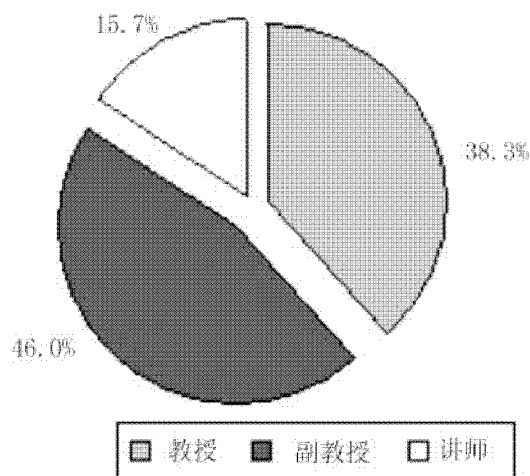


图 2 职称结构比例图

表 3 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学术队伍职称结构统计表

结 构 学 校	职 称 结 构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合肥工业大学	12	22	7
安徽大学	15	13	5
安徽师范大学	24	23	19
安徽工业大学	11	7	0
安徽农业大学	11	10	0
安徽医科大学	3	6	0
安徽财经大学	6	7	0
淮北师范大学	7	10	0
安徽工程大学	6	16	8
合计	95	114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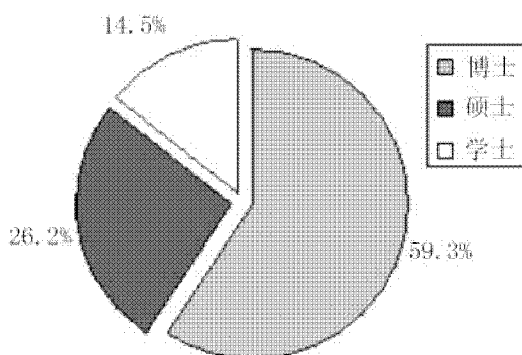


图 3 学位/学历比例图

表4 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学术队伍学位/学历结构统计表

结 构 学 校	学位/学历结构		
	博士	硕士	学士(本科)
合肥工业大学	32	7	2
安徽大学	21	9	3
安徽师范大学	42	18	6
安徽工业大学	9	5	4
安徽农业大学	13	1	7
安徽医科大学	2	5	2
安徽财经大学	6	3	4
淮北师范大学	12	5	0
安徽工程大学	10	12	8
合计	147	65	36

表5 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学术队伍导师规模结构统计表

结 构 学 校	导师规模	
	博导	硕导
合肥工业大学	1	41
安徽大学	9	24
安徽师范大学	18	25
安徽工业大学	0	23
安徽农业大学	0	21
安徽医科大学	0	9
安徽财经大学	0	13
淮北师范大学	0	13
安徽工程大学	0	13
合计	28	182

(四)从凝炼学科研究方向看,学科建设的科研工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各校学科点在学科建设方面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凝炼学科研究方向,在充分总结多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紧密结合。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改革工作的同时,始终牢牢抓住学科的科研工作不放松。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我

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研工作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研究方向上的鲜明特色和优势。如安徽大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向,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相关论文,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初步达到了既凝练了学科方向,又凸显学科特色的目标。

二、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

多年来,各校学科点在学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始终注重将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规定与本地区、本校、本学科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结合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新时期新形势新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工作提供支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的需要。因此,在学科建设中,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各校校级党政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思政理论课建设的认知水平、管理水平和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对本校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主要功能是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学科支撑,所以必须把学科建设的出发点放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基本原则和基本任务。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锻造学科人才梯队,抓好队伍建设

培养和造就一支理论水平高、政治素质强、教学科研能力强的学科队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关键。近年来,各校学科点建设坚持一手抓优秀专家、学术带头人和优秀博士人才引进,一手抓教学科研骨干与青年教师培养,从而建立了一支年龄结构完整、学历层次较高、职称结构合理、性别结构平衡的教学科研队伍,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通过送出去和引进来,高学历高职称

教师所占队伍比例逐年增加,一大批毕业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重点学府、具有博士学位、学术素养较高,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不断充实到队伍中来,同时,教育部、教育厅开展实施的进修培训、项目申报也对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队伍建设给予了专项经费支持,促进了学术队伍的良性发展。

(三)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推进软硬件建设,搭好学术交流平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需要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广泛吸收、借鉴有关学科、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以开放创新的精神,学习其他省市兄弟院校的有益经验。要充分利用党和国家当前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良好机遇,争取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本学科建设的关注和投入,大力加强服务学科建设的各种软硬件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科研基地建设。一方面支持、鼓励省内学者到外省市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培训;另一方面,通过承办重要学术会议等方式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通过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营造了宽松、活跃的学术研究氛围,扩大了学术影响,拓展了本学科的发展空间,推动了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促进研究成果向教学实践的转化

近年来,各校学科点注重深入研究学科的教育教学规律,切实改变传统单一灌输型教学观念,树立双向互动的研究型教学理念,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能力为核心的知识讲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模式。坚持以国情、省情以及本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所出现的种种理论与实际问题为抓手,及时加开和更新符合时代需求和贴近大学生身心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育实践中获得大学生们的广泛好评。注重将教师的教研和科研成果及时加以理论的提炼与升华,用学科专业建设成果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增强其说服力、感染力和亲和力。

三、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它是一项

系统工程,在建设的实践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学科整体性建设存在弱化,整体性研究不足

随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规模迅速扩张,其二级学科点迅速增加,但受原有教师队伍数量、专业、水平等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六个二级专业方向很难在一所高校的一个学科点获得并肩发展,学科的整体性建设推进在一所高校内存在现实困难。各二级学科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地位也有待进一步明晰,六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发展还不平衡。

(二)学科自身体系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之间“两张皮”现象仍较突出

学科研究领域中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现象,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关联度不高,或者无关联性;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没有放在思政课教学科研单位进行建设;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研究生导师没有承担思政课的教学任务;学术队伍中部分教师无学科专业背景或学科背景较单一,一些教师只承担学科建设任务,或者只承担教学任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仍不能满足“一岗双能”、“一身二任”的要求。

(三)学科内涵建设上仍需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科建设也是侧重于学科研究范围,在学科方向凝练上仍显不够。学科点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以及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相脱节,两者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学科建设的成果未能够很好的融入教学中,一些学科点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不科学,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高校近年来扩招使得师生比差距进一步拉大,教师教学负担变得更为沉重,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教研中去,进而影响到学科建设和发展。

(四)学科点研究生培养仍存在不足

近年来,受就业竞争激烈程度加剧等影响,特别是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跨专业报考的考生较多,学科点研究生生源质量在下降。又因导师人数有限,培养经费投入跟不上扩招规模等原因,使该学科研究生学术素养及研究成果整体质量不高;部分研究生对相关理论背景掌握不深、不透,缺乏学术研究习惯;部分研究生在服务社会、解决现实问题等方面能力亟待加强。特别是该学

科研究生就业选择性少,真正在高校从事思政理论课教学和辅导员等“专业对口”的人不多,而“公考”等各类入职考试,在岗位专业设置上给予该学科专业机会很少,造成一些研究生对自身专业认可度不高,这给该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和学科持续发展都带来了难题。

四、改进我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意义重大,但由于它作为一级学科的时间还不长,如何加强这一学科的建设工作是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结合我省高校在学科建设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和问题,我们就如何开展好本学科建设工作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

(一)推进学科内涵发展

提高思想认识,把学科建设的出发点放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上,着力解决好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协同发展。推进凝练学科研究方向,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与研究,又要注重二级学科发展的均衡化、个性化、特色化,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其他优势学科的嫁接和交叉融合。以学位点建设推动学科发展,拓宽支持本学科发展的路径,搭建更高的平台。在重点研究基地申报与建设、社科基金申报、学科建设标准落实、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二级学科本科专业设置、学位点招生规模、举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学术期刊建设等方面给与政策性扶持,确保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二)加大对学科建设支持力度

从国家层面、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上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在政策上的支持引导,项目上的扶持倾斜,资金上的投入保障。为本学科建设发展提供有利的内外环境。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项基金,资助高校举办本学科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资助中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内外高水平大学进修、访学或开展合作研究;设立更多,更加均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点。考虑能否在“985”和“211”高校都应该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博士点。

(三)加强学科队伍建设

强化学科队伍建设,是确保学科建设工作科学发展、稳步推进的关键环节。学科队伍建设应按照“一身二任”,“一岗双能”的原则进行,着力化解“两张皮”矛盾。构建新的学科队伍建设管理机制,这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关键。切实提高高校领导对本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认知水平、管理水平和重视程度,进而促进本校培养和造就一支理论水平高、政治素质强、教学科研能力强的学科队伍。

(四)加强学科建设的督促检查

实施学科的动态管理。定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较差的授权单位按照程度予以限期整改、暂停招生乃至取消授权点处理的退出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申报和审批。学科建设要以质量为生命线,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研究源泉,注重对现实重大理论和问题的回答,在研究生培养上,要以市场为导向,把人才培养同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硕士生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 [1] 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情况简要汇报[R].合肥,2012-06-02.
-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意见(学位〔2012〕17号)[Z].2012-06-02.
- [3] 杨瑞森.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关系的再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9):74-80.
- [4] 课题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30年回顾与展望[J].高校理论战线,2008(12):26-32.
- [5] 罗佳.新时期广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经验与发展趋势[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3):51-54.

[责任编辑:吴晓红]

经济管理类专业《管理学》教学改革探讨

周 峰

(淮南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目前在课程教学上仍存在诸多问题。为培养创新型管理人才,必须对管理学课程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进行革新。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实践,教改可行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

关键词:管理学;教学改革;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2-0106-03

On the teaching reforms of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Scienc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ajor ZHOU 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Management Scienc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ajor, ye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To cultivate the talents of innovative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teaching concept, methods and cont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goal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teaching methods, who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s are effective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is improved.

Key words: Management Science; teaching reform; exploration

《管理学》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可为后续各门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学科基础。其教学改革对培养具有创新型人才、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甚至是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教学质量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明确教学目标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的一门系统研究管理全过程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课程。其课程教学目标是,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管理的基本理论、原理、方法和管理技巧,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培养管理素质,提高学习与实践的综合能力,为专业方向课程学习和未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各有侧重,对课程体系的设置要求也有较大差别。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必须根据专业的性质和课程的作用,区别对待讲授的理论深度和侧重点,在课时安排、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等方面要有所区别^[1],使教学内容与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一致,突出不同专业对课程内容的不同要求。此外,管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在授课内容的安排上既要考虑到学生已有的基础知识,又要为后续专业课程做好铺垫,更加重视整个管理课程体系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因此要对后续课程重复的内容进行整合和选择性删除,对内容进行优化。

管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基础

收稿日期:2012-10-20

基金项目:淮南师范学院2012年教学研究项目(2012HSJY03)

作者简介:周峰(1969-),男,安徽合肥人,讲师,主要从事管理学教学及研究。

课程,同时又是一门发展很快、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实践案例的课程。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与时俱进,结合实践,增加我国企业管理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管理实践,将我国企业管理的发展沿革、经验教训和重大的管理创新等融入课堂教学中。在教材内容的每一章中都需要增加与章节内容相关的管理案例,和学生研讨一些相关现实热点问题(比如近期欧洲陷入经济危机,美国经济衰退)等。选择典型案例,以使学生可以综合运用管理学知识进行分析^[2]。

三、教学基本原则

(一) 注重实践

管理学理论性虽强,但最终还需回归应用,强调实践。因此,《管理学》的教学在重视概念、理论体系学习的同时,强调必须结合丰富的管理实践活动进行讲授,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实现教学目的。比如,在讲解激励理论时,可以与学生讨论一下家长是如何激励他们学习的,哪些激励对他们有用,哪些激励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从而引出有效激励的要素和必经的过程^[3]。开展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到企业、社会参观、调研;设计管理场景,由学生自主设计、讨论并形成管理方案;让学生参与教师研究课题,参与企业实际经营问题的诊断与分析等,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让学生养成从管理理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培养基本的管理技能。比如用激励理论分析学校奖学金的设置、提出教学改革的建议,从管理学角度分析大学校园中的逃课现象及解决途径等,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二) 以学生为中心

突破“教师主导”型教学观,以学生为中心,树立起自主式、探究性的学习理念。从“以教师为主导”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以最大限度激发学习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的效果如何,主体的作用很关键。调动主体学习的积极性,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是使学生对学习本身感兴趣。除以学习内容吸引外,还应使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设计与管理,实现自主学习与自我控制,满足学生的表现欲、成就感,使学习从令学生们痛苦的“负担”转化为使学生们感兴趣的“追求”,构建一种“目标激励+兴趣体验+必要的规范管理”的“快乐学习”体系^[4-5]。

四、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教师尽可能“精讲”,学生“多思”、“多讲”,构

建生动活泼的互动式课堂。以教学手段的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拓展学习空间,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式学习的根本性变革,努力建设“教师精讲-举例与案例-学生发言-师生讨论”的节奏化、生动活泼的现代课堂。经过实践比较,以下几种教学方法很适用于《管理学》的教学。

(一) 案例式教学

案例教学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能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学生在课堂中了解企业运营实际,提高和锻炼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增强管理教学的实务性、应用性。作为地方性本科高校,在授课过程中要尽可能选择地方化的案例来讲解管理学知识。选取规模较大的地方性企业,组织或安排学生深入企业管理第一现场参观、调研,指导学生自己收集、编写案例,对企业实际经营问题进行诊断与分析,锻炼和提高学生查找资料、分析概括、分工合作、组织协调、语言表达、竞争意识等多方面能力及综合素质。进而与一些企业建立学生实习基地,选派学生实习锻炼,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实现高校与企业全方位的产学研合作^[3,6]。

(二) 体验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极大地促进了管理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学习者的体验与在学习过程中的反思。课外搜集素材,将管理实践活动“搬”进课堂。运用角色扮演、即席发言、现场会议等情景模拟形式,让学生扮演各种管理角色,从中学习和运用管理知识及操作艺术,在体验中学会管理,掌握技能,提高学习兴趣。比如员工的招聘:有学生扮演招聘主管,有学生扮演应聘者。扮演招聘主管的学生,面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应聘者,就不能采取统一的应对方法。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为主动学习,在表演过程中轻松地掌握知识,同时培养增强自信心^[7]。

(三) PBL法

PBL法,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要求学生带着问题预习,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实现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转变为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以教师为导向进行启发式教育,把教学内容设计在问题中,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参考书,进行探讨,加深对理论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思维能力。这种教学方法发挥了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改变了学生一味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调动了学生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增进了教学效果。

五、改革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是否合理关系到能否全面检查教师的教学效果和正确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取消传统的期末单一卷面考试考核形式,采用综合考核方法,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考核采用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兼顾学习态度、平时学习表现^[8]。

(一)平时考核

平时考核分值50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课堂纪律,包括考勤、课堂表现等,分值10分;第二,课后作业及随堂阶段性的考核,分值20分;第三,实践报告及案例分析,分值20分。第一次课就让学生明确考核内容和方式,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促进学习。这种考核方式注重对学习过程考核,也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及时对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动态调整,促进教学过程管理。

(二)考试内容的改革

期末考试分值50分。期末考试依据《考试大纲》进行命题,试卷既要体现课程的特点,又能符合教学要求。命题时注重将基础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试卷中增加一定比例的综合素质题目,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管理学知识、原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检查教学效果。成绩评定后,任课教师要对试卷进行全面分析,分析试题难易程度是否适中,是否符合大纲要求,全面总结学生的答题情况,查找教学薄弱环节,以便于整改。

六、教学效果

教改对象:淮南师范学院2010级市场营销专业1班为教改实验班,专业2班为普通班。考试科目为《管理学》,考试试卷共124份。

方法:考试试卷内容按照考试大纲规定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同时对教改实验班和普通班进行考核。根据评卷标准和标准答案,主观题由任课教师采用流水方式进行阅卷,客观题采用计算机阅卷,两次核查,专人统计分数。

结果分析:将教改实验班和普通班每名学生的学号姓名、每题得分、总分录入计算机,采用Excel 2002和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其结果如下表1。

表1 普通班与教改实验班卷面成绩比较

班级	N	$\bar{x} \pm s$	t	p
普通班	61	82.48 ± 6.09	5.31	0.000
实验班	63	76.08 ± 7.26		

两班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5.31, P < 0.01$)。结果表明,通过教学改革以后,实验班的学生成绩明显优于普通班,学生的学习成绩呈增高趋势,教学改革取得一定的效果,此次改革措施是有成效的、可行的。

七、结论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中心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深化教学改革,教学改革是高校改革的永恒主题。《管理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应区别对待,尤其是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来说,应深化教学改革,明确教学目标,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树立起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科学思想,提高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管理理论水平和管理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 [1] 霍彬.《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措施探讨[J].考试周刊,2008(10):7-9.
- [2] 楚金桥.工商管理本科专业管理学教学改革探索[J].新乡学院学报,2009(8):167-168.
- [3] 许华.《管理学》案例教学改革思路[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7):38-40.
- [4] 单凤儒.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教学改革[M].北京:中国管理科学文献,2008:350-351.
- [5] 王涵.高校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世纪桥,2011(13):103-104.
- [6] 马俊苹.管理学案例地方化教学改革的思考[J].龙岩学院学报,2007(4):36-37.
- [7] 王华强,高映红.新形势下的《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高教论坛,2007(6):137-138.
- [8] 杨少梅,卢建昌.《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07(S2):379-380.

[责任编辑:吴晓红]